

目

学术研究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 20 周年•

进一步解放思想 增创广东新优势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 20 周年…………… 于幼军 (5)

联系实际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

——广东社科界举行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20 周年系列座谈活动纪要

…………… 本刊记者 罗 莘 (11)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学风

——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20 周年 …… 梁渭雄 (16)

•哲学•

让哲学思维在领域的体系中熔炼凝聚 …… 赵宋光 (18)

启蒙理性与工具理性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

…………… 王守昌 李伟中 (28)

•经济•

论海外华商网络 …… 龙登高 (33)

营造国企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 …… 李郁芬 (37)

技术资本与发明家型企业家 …… 丁栋虹 (41)

论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与合理配置 …… 刘田喜 (44)

1998 年第 5 期

录

•文学•

- 论中国 40 年代新诗的散文化倾向…………… 龙泉明 47)
- 文学生命谀话 …………… 汤学智 51)
- 王士禛赵执信关系考辨 …………… 彭玉平 55)

•香港研究•

- 回归后的香港中资企业 …………… 雷 强 59)
- 穗港的经济发展与广州话的语用特色
…………… 王健伦 梁道洁 63)
- 一部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著作
——读吴奕新博士《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稳定繁荣》
…………… 丘克军 67)

•历史•

-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 …………… 白 云 69)
- 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 …… 蒋祖缘 75)
- 抗战时期孤岛的社会动态 …………… 魏宏运 79)
- 略论《司马法》的军事思想和历史地位
…………… 徐 勇 黄朴民 84)

•学术动态•

- “金应熙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
…………… 本刊记者 郭秀文 87)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Emacipating Our Mind to Increase Advantages in Guangdong – – Written for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ussion on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a Truth	Yu Youjun (5)
Points from a Series of Symposium Held for the 20th Annivesary of the Discussion on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a Truth	Luo Ping (11)
Relation between the Discussion on Criteria for Certifying a Truth and the Maxist Style of Study	Liang Weixiong (16)
Letting the Philosophic Thinking Refined and Coherented in the System of Its Domain	Zhao Songguang (18)
Rationalities of Enlightenment and Instruments	Wang Shouchang and Li Weizhong (28)
On the Commercial Net among the Oversea Chinese	Long Denggao (33)
Constructing a System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the Entrepreneurs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Li Yufen (37)
Technological Capital and Inventor – type Entrepreneurs	Ding Donghong (41)
On the Short of Entrepreneur’s Resources and Their Suitable Disposition ...	Liu Tianxi (44)
An Essay – style Tendency of the New Chinese Poetry during 1940s	Long Quanming (47)
The Life of Literature	Tang Xuezhzhi (51)
A Textual Study of Wang Shizhen (1634 – 1711) and Zhao Zhixin (1662 – 1744)	Peng Yuping (55)
Chinese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fter Its Sovereignty’s Return to China	Lei Qaing (59)
The Usages of Cantones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of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Wang Jianlun and Liang Daojie (63)
Book Review over PHD. Wu Canxin’s ‘Tow Systems within One Country: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Hong Kong’	Qiu Kejun (67)
Tra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Bai Yun (69)
Absorption of the Westen Culture by the Thirteen Professions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Achievments and Influences	Jiang Zuyuan (75)
Social Upheavel in Shanghai as an Island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Wei Hongyuan (79)
The Military Thought and Historical Statue of ‘Sima’s Law’ (《司马法》)	Xu Yong and Huang Pumin (84)
A Summary of the Points from ‘Symposium on Prof. Jin Yingxi’s Academic Thought’	Guo Xiuwen (87)

进一步解放思想 增创广东新优势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 20 周年

□于幼军

20年前在我国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和我党延安整风以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确定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奏响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突破和大发展的序曲,揭开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序幕。

一、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2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一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大是大非之争,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思想的第一次公开反击。粉碎“四人帮”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段时期,我国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人们痛定思痛,迫切希望我们党认真总结和纠正“文革”的错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那一套“左”的路线非但没有被彻底清算,而且还在继续;以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为核心的“两个凡是”仍在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

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不把人们的思想从“左”倾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就不能前进,就没有希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思想理论界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原理为突破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思想解放浪潮。

真理标准讨论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为确立新时期我党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思想路线的问题,关键是一个用什么样的态度和学风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还是从本本出发,按教条办事。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和把握得好,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就会有大的发展;反之,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遭受重大挫折。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刻意义,就在于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通过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阐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而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思想路线的端正,是拨乱反正的根本,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党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文革”的错误,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使濒临崩溃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党在新时期才能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没有思想路线的端正,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没有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奏响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突破和大发展的序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二、思想解放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弘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着中国20年来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20年来,广东和全国一样,改革发展每前进一步,都是以解放思想开辟道路。

广东的改革最早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不能变的思想阻力。省委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帮助人们摆脱思想束缚,使干部群众消除了疑虑,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全面铺开,长期受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农村改革的突破取得成功,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开始认识到,对那些过去被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只要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可以大胆地去改革。从此,广东人民踏上了向旧体制全面宣战的征途。

在改革初期率先提出创办经济特区,是

广东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大成果。然而,在办特区的过程中却遇到了“恐资病”的思想阻力。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和遇到的问题、阻力,省委先后提出了“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和“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实,排除对兴办特区和引进外资的种种非议,推动人们摆脱姓“社”姓“资”的束缚,大胆走上对外开放之路。继创办经济特区后,经中央批准,我省又先后建立了两个沿海开放城市和四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1个地级市全部实行沿海经济开放区政策,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格局。现在,我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3来自外贸出口,建设资金40%靠利用外资,税收中的30%来自涉外企业税收,外贸出口和创汇占全国的40%。社会主义的广东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迅速发展,实力大大增强。

80年代中期,我省开始了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放开流通领域,进行物价改革。这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说取消计划定价,让产品自由交易,其实就是否定计划经济,等于否定社会主义。许多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党的十二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广东人民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在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商品经济,能不能发展个体经济,能不能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等问题上,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思维定势和“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树立商品经济意识,树立以“生产力标准”为导向的新思想、新观念。从而使广东闯过了价格改革关,把市场机制的运用扩大到了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和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商品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大发展。1988年,广东理论界在全国率先展开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明确提出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模式。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国内政治风波骤起,改革开放面临一次

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些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整个改革开放大局,产生了困惑、动摇,甚至提出责难。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基本政策。省委及时提出“八个不变”,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不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不变;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变;等等,统一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消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保证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推动了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广东乘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东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进一步摆脱姓“社”姓“资”的束缚,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造、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全面推进,大胆突破,迎来了改革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当然,解放思想的任务,并未就此完结。当改革进入新阶段时,姓“社”姓“资”的争论又以姓“公”姓“私”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改革发展的新的思想障碍。实践呼唤着新的思想解放。党的十五大的召开,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热潮。以十五大为起点,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回顾20年历程,广东以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发展,主要有以下体会: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省委要求各级干部善于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不违背中央总精神和总政策的前提下,用好、用足、用活上级的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定、部署,而不是去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

第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改革,鼓励试验。早在80年代初,省委就动员全省人民,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为民造福,要勇于冲破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束缚,“陆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走山路,没有路就披荆斩棘走新路”。广大干部群众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大大焕发出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一时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遍及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率先搞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一些地区的农村在联产承包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股份合作经济的新路;深圳、肇庆、顺德等地率先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深化企业改革等方面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十分注重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首创精神,对各地的改革试验,不急于下结论,不刮风,不搞一刀切,保护干部群众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的积极性。

第三,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求真务实,少说多做,开拓创新。80年代初,我们把有利于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在对外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80年代中后期,我们以生产力标准为武器,打破旧体制的框框,较早起步发展商品经济;90年代以后,我们举起“三个有利于”的“尚方宝剑”,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广大干部群众认定“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事情,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看准了就赶快做,错了就马上改,形成了少说多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风格。

第四,大胆学习、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广东是在对外开放中进行改革和建设的。由于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华侨众多并分布世界各地的人文条件,广东具有开展对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合作的优势。我们在对外交往中,既引进资金、技术,也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既学习市场经济的运作方法,也学习与之相适应的先进观念和思想意识。正是在对外交流合

作中,在内外两种思想文化互相交流中,广东人形成了视野宽广、兼容性强、善于学习、思想解放的特点。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创新优势,阔步迈向 21 世纪

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面向 21 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机遇;党的十五大在理论上的新突破和对跨世纪的战略部署,为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20 年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积累的许多成功经验,为新一轮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广东的进一步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广东要在跨世纪的征途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必须像江泽民总书记所要求和期望的那样:“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最近,李长春同志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认真传达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刻领会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精神为动力,把广东两个文明建设推上新台阶。省委决定围绕总书记提出的“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这一主题,分十个专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力求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新的发展思路 and 对策。这是省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创造性地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重大举措。而要增创改革和发展的新优势,首先需要增创思想解放的新优势。

在新形势下推动新的思想解放,要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五大所达到的新的认识水平、新的理论突破来指导和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在“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在深化改革的许多重大理论上取得了新突破,作出了跨世纪的发展战略部署,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切实贯彻十五大精神,用十五大所达到的新的认识高度来指导和推动新时期的改革,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基本任务。围绕这个任务,当前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更新所有制观念,推动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取得新的理论突破,这对当前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改革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广东在所有制改革方面起步较早,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与十五大所提出的目标和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当前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改革的步伐,关键是要用十五大的精神来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要牢固树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问题上,要克服过去对公有制经济内涵的狭隘认识,树立“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的新观念,大胆发展各种合资、合作、联营等形式的混合经济;克服过去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仅仅理解成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是所有地方和所有行业、领域都必须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片面认识,树立注重公有资产质的提高、注重国有经济控制力增强的新观念,大力推进对公有资产的战略改组和结构调整;克服过去把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同起来的狭隘观念,树立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的新观念,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来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既要消除由于担心所谓的

“私有化”而不敢改的思想顾虑,也要克服因为涉及自身利益的调整而不愿改的思想障碍。

其次,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更新按劳分配内容,创新多种分配形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出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分配上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十五大在分配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和突破。我们要根据十五大的精神,通过更新分配观念,改革和优化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在对按劳分配的理解上要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的框框,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认识到按劳分配不是简单的按劳动时间分配,而是主要按劳动的效率和效益进行分配;另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创新多种分配形式,把按劳分配和按资本、资源、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克服把资本、技术等参与分配视同于剥削的旧观念,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再次,要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更新发展的观念、思路和战略。党的十五大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广东这些年发展速度比较快,走在全国的前面。但目前面临着如何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质量,特别是提高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含量的问题,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城乡建设的优化,整体发展目标的优化等等。为此,要进一步抛弃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相联系的旧的思想观念,牢固树立起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新的发展观念,包括:要摒弃片面追求经济规模扩大和增长速度的经济增长观,确立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增长观;要摒弃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确立“以人为本”,即以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新发展观;要摒弃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旧观念,确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的新观念;要摒弃只顾发展经济,不顾环境和自然

资源保护的旧发展观,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观。

第二,总结20年、超越20年,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广东过去的20年,是以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的20年,是大胆探索、积极开拓、勇于创新、先走一步的20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和较大进步的20年。认真总结和发扬我们在这20年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是今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不能满足于改革开放20年取得的成就,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认识和水平上,更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总结20年,是为了超越20年。我们一定要努力增创新优势,迎接新挑战,争取新的更大的发展。

总结20年,超越20年,是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全国各地出现群雄并起、你追我赶的新局面。一些兄弟省市在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后劲上已呈现强劲的态势。而广东在改革发展中积累的一些问题正逐步显现出来,需要我们正视和认真解决,从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在此形势下,广东要争取在新一轮发展中继续走在前面,就不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一定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探索广东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对策。

总结20年,超越20年,也是思想解放自身规律的内在要求。思想解放是永无止境的。实践发展到新的阶段、新的水平,必然对思想解放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过去20年中形成的许多观念和 experience,随着实践的发展,现在有些已经变得不适应了。如果不更新这些思想观念,就难以适应新阶段发展的要求。因此,新一轮思想解放,既要继续摒弃“左”倾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又要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审视过去20年中形成的、在当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而现在已经不适应改革发展新要求的某些观念和经历,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进行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总之,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超越自我,更新观念,开拓前进,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

第三,面向世界,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进一步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指出:“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 and 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面对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科技全球化的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必须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加快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广东毗邻港澳,处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更要发挥优势,面向世界,开阔视野,牢牢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自觉参与国际经济的交流、合作与竞争。要进一步增强开放的意识,扩大开放的范围和程度,提高对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广东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猛烈冲击并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们关于现代化的观念。

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工业经济正在向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知识经济”转变,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以科技实力、文化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对现代化道路的共识。在这样的形势和挑战面前,广东要在跨世纪的发展中站住脚跟,阔步前进,关键是要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有利机遇,加快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跟上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2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把我们引上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20年来的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的思想有大的解放,我们的事业就会有大的发展;什么时候我们的思想不够解放,我们的发展就会缓慢甚至停滞。展望未来,我们要抢占新世纪发展的制高点,要在全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没有新的、更大的思想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发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起开拓、创新、进取的精神,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把广东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联系实际推动新一轮思想解放

——广东社科界举行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20 周年系列座谈活动纪要

□本刊记者 罗 苹

1978 年,举国上下进行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迎来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为了纪念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讨论,结合广东改革开放的实际,在新的形势下推动新的思想解放,广东哲学学会、广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学术研究》杂志社于近日连续多次举办了“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20 周年座谈会”,广东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张江明、吴群策、刘嵘、黄国平、梁渭雄、高齐云、余少波、叶汝贤、孔庆榕、章海山、梁琼芳、马中柱、李恒瑞、李辛生、邹永图、柯木火、王宏维、陈长畅、王培林、曾广灿、张先贤、陈家义、刘歌德、吴灿新、章岳云等 50 多人出席了会议。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畅谈了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现将他们的发言要点综述如下。

一、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

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是 1977 年开始酝酿的,1978 年展开并形成全国性大讨论,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前后延续了 3 年多。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这次讨论,意义非常重大,集中到一点,就是让人们永远记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现代迷信束缚下解放出来,为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第一,这次讨论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从根本上推动了拨乱反正。“两个凡是”是教条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实质是继续执

行个人崇拜和本本主义。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坚持用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从而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革命家、理论家的崇高历史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真正作用。

第二,这次讨论实质上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次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关系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3 页)这次讨论启动了思想解放的“总闸”,从哲学的解放为发端,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性质,使人们从迷信、依赖、“唯书”、“唯上”的樊笼中解放出来。

第三,这次讨论是恢复、重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导。这次讨论,表面上是关于一个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的斗争。并且从思想路线一步一步延伸到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政治路线和经济建设路线问题。斗争的结局是我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确定邓小平同志为我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彻底解放了受“四人帮”迫害的大批老同志;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开始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第四，这次讨论确立了实践的权威，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是上了“本本”的就是真理，也不是“有权就有真理”。只有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才能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正因为邓小平理论始终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动力，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它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随着改革开放实践不断丰富发展，指导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五，这次讨论改变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以这次思想解放为开端，人们开始脚踏实地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传统模式进行反思，兴利除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真正恢复了生机，使中国走上了富强、民主、文明之路，以崭新的面貌和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流。这次讨论对国际工人运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最直接的社会功效，就是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深刻地反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开拓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到底就是要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及其后果作深刻的反思，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不仅使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

务，走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而且使全党的干部能够理解、领会和贯彻执行这条正确的路线，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今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民经济呈现“高速度低通胀”的态势运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比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文革”期间，不能不叫人叹服这条思想路线的威力。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化和发展不断地给改革开放带来新的转机。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端，20年内我们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中心问题是“实事求是”还是“两个凡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坚决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第二次高潮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中心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此时假左派、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潮重新泛起，主张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宣扬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经过深入的讨论和反复的实践，邓小平同志1992年1月在南方谈话中做了总结，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出现了第三次高潮，中心是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这时突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而改革国有企业，成为任务的焦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并且提出了“控股公司”、“股份合作制”等具体办法。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观点。并明确指出：股份制“资本主

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每一次掀起的思想解放的高潮,都会使人们的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认识到实践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多方面的。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定会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获得新的转机,开创新的局面。

第三,从真理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已拉开了主动型改革的序幕。经过20年的实践,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正在从被动型转向主动型,其特点首先是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性探索转向有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探索;其次是从经济领域的改革转向多领域、全方位的综合改革;三是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修补式改革转向建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制度创新。

三、真理标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起点,其成果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灵魂。

第一,邓小平理论是恢复了创造性的、生机蓬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作为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其解放的关键是人们就此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建立发展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更不可能在马恩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适应时代新特点的过程中更新内容、改变形式的产物。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也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理解与掌握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之所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道理,社会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实践是发展生产力。人们放弃了对什么是社会主

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空洞议论,从“天上”回到地上,转而追索怎样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建设社会主义。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全面、辩证地理解,特别是明确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建设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同时,还要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和方法,主要包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并使社会主义展示其优越性,最根本的就是要形成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社会物质财富才能极大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不断改善。相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第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并自觉地接受实践的检验是邓小平理论强大生命力之所在。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解放思想,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某些观点、论述或片言只语,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针对中国的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历史关头的重大问题,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还在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结合中华民族的特性,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且使之带有中国的特性,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易于实行。

四、世纪之交新一轮的改革发展与新的思想解放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虽已过去20年了,但思想解放是永无止境的。今天我们仍要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以实践为动力和标准,掀起解放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排除新的干扰,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第一,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党的十五大为我

们作出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榜样。它充分地论证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要求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勇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在改革开放中有新的突破。

第二,要深刻领会和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20年来,我们对真理标准的认识是逐步深化和发展的。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对于如何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衡量是非得失,认识是更加明确具体,可操作性是更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认为“三个有利于”仅仅是衡量改革开放中利弊得失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判断是非的真理标准的论断或理解是片面的。我们都清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如果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当是“利弊得失”的价值判断标准,不把实事求是坚持到底,不把社会生产力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承认社会基本规律(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最终要适合社会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就不成其为科学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排除了各种所谓姓“社”姓“资”的无意义的抽象争论,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视觉一新,鼓励了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发展改革事业的革命精神。

第三,要努力为真理的发展创造更良好的社会条件。真理的发展,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它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历史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同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真理要战胜谬误,既要解决以实践标准来正确辨别是非的问题,还要解决如何使真理不受压抑和打击的社会条件问题。

1、改革现行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体制,为解放思想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新的思想解放高潮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

标、方针、政策和具体任务等已经明确,现在的关键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去执行、贯彻。而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是按照单一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要求建立的,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如党政企合一,政治直接干预经济、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更有甚者,某些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的腐败与不正之风,官商结合,权钱交易;还有在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主使下,不择手段去谋取私利,甚至成为黄赌毒与假冒伪劣的保护伞。十五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要真正反对腐败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其他修补、改良的办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是“人民作主”还是“为民作主”?应该围绕这个焦点,掀起一次解放思想的新高潮。在过去,“人民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实际上人民只是作为劳动者具有使用某些生产资料的权利。在原有政治体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和可靠的法律来保证人民实行当家作主的权利与权力。在现实中通行的,不过是“为民作主”。因为在党政机关内,封建主义思想与制度的残余依然存在,体制方面,则有家长制、一言堂、“官本位”制、特权制、单位依附(实质上就是人身依附)、裙带关系等。这样的体制,当然不可能由“人民作主”,而只能由极少数人“为民作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2、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为解放思想提供良好的民主环境。没有一套保证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机制,发展民主就会落空。只有发扬民主,使人民敢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能正确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制订出一套有效保障发扬民主的法制和制度,使民主法制化;也只有发扬民主,人民行使民主的权利得到保证,使人民敢于依法同侵犯他人民主权利的各种违法行为作斗争,而不用担心会受到打击报复的时候,这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得到切实的实施。

3、创造良好的、团结和谐的人际环境和

舆论环境。思想理论上缺乏民主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使理论由于失去实践的依托而暗淡无光,起不到正确指导实践的作用,更重要的,它使革命事业蒙受巨大损失以至失败。真理只有在民主讨论中才能发展。对人民内部的不同认识、不同意见,要坚决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学术民主,继续弘扬在大讨论中恢复和发扬了的良好学风,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注入生机与活力。

五、以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

广东是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比较早的省份之一。这个讨论促进广东干部的思想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广东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促进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创办;促进广东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使广东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当前,在新的形势下,广东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创广东新优势。

1、20年来,广东人民在党中央“先走一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广东的改革开放实践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充分解放思想,“大胆地试”,敢于做前人未做过的事业;充分更新观念,“大胆地闯”,走“新路”、干“新的事业”,以至“杀出一条血路来”!不为僵化思想所束缚,不为非议所动摇,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坚决干,边干边总结;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苦干实干,从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到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统筹珠江三角洲到粤东、粤西、粤北的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正是这样,使广东国民生产总值跃上全国先进行列。广东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4.73亿元猛增到1997年的73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则是由一个广东省变成了13个广东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元到

1997年突破3万元大关,使广东省提前三年实现了翻三番的目标。如果说广东在创办特区的改革开放初期是以“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为“尚方宝剑”,那么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在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转轨过程中,“尚方宝剑”则是以真理标准为基础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它为判断一切矛盾和是非提供了有效和权威准则,使广东和全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思想解放。目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攻关阶段,要求有多方面的改革相配套,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广东要在20年内基本实现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更高的水平,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新的思路、新的思维走势、新的精神状态、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上新台阶。在新形势下进行新的思想解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继续从长期形成的“左”倾思维定势、“左”右摇摆和变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的顽疾中解放出来;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认识和计划经济的习惯势力、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从“小富即安”、“小进则止”、满足现状的小生产、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从缺乏市场意识、竞争观念,在困难面前缺乏信心,意志消沉,只顾保住既得利益,不敢承担竞争风险的消极保守中解放出来。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正确认识和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来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树立大经济、大市场、大改革、大集团的发展思路,致力同国际经济接轨,参加国际市场竞争;树立敢在市场竞争的拼搏中取胜,知难而进的精神,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思想;坚持崇高理想和脚踏实地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求真务实的思想,扫除种种思想障碍,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迈进21世纪。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学风

——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20 周年

□ 梁渭雄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两个凡是”仍然严重地束缚着神州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成为政治上拨乱反正和进行改革发展的严重障碍。

正是 20 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大转折的序幕，成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现代迷信，推动思想大解放的运动，为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同时，这也是从根本上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一次大转折。

我省社会科学理论界在这场大讨论中是走在前列的，其中，哲学界的同志更是得风气之先，率先投入了这场大讨论，并受到了省委领导的表扬。

5 月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并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吹响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广东哲学界积极进行了学习座谈，并于 6、7 月间与《学术研究》编辑部联合举行了座谈会，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研讨真理标准问题。在讨论中，同志们一致认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同一切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划清界线。同志们还指出，来源于实践并经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可以作为人们判断是非的依据，但它只是依据，而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此外，同志们还深入讨论了与真理标准有关的一些问题，如检验真理标准同判断言论是非，辨别香花毒草的准则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区别，逻辑证明与实践检验的关系如何，等等。

在上述座谈讨论的基础上，接着，哲学界的 14 位同志，在省社科联的安排下，集中于广州白云宾馆学术活动室（当时省委批准给省社科联长期租用白云宾馆几个房间作为社科界学术活动场所），用

了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围绕真理标准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和写作。从各个角度写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九篇文章，在《学术研究》1978 年第 3 期开辟了一个篇幅显著的大专栏。这些文章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的 ABC》、《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与接受实践检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不断接受革命实践的检验》、《不能用反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反复的发展过程》、《实践标准的确定和“不确定”的统一》、《判断是非的理论依据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逻辑证明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在斗争中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内容，很有针对性地触及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和回答了当时讨论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想理论问题，在我省的大讨论中确实起了思想理论先导的作用。

紧接哲学界先行一步之后，我省的经济学界、教育学界、历史学界也都陆续投入了这场大讨论。省社科联所属六大学会都积极参与开展了讨论活动。特别是经济学界，密切结合我国解放后 28 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认为，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每当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制定我国、我省的经济建设方针时，经济就上得快；一旦违背实事求是，主观唯心地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时，经济的发展就受损失。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而检验经济理论、政策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同志们还指出，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往往不敢正视这点，不是以客观经济实践为标准，而往往把一些形左实右的理论、政策赞之为真理，而把一些正确的理论、政策贬之为右，为谬误，这种思想方法对我国经济研究和经济建设危害极大。在

讨论中,同志们还敏感地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独立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独特的经济规律?等等。与此同时,我省哲学界继续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教育学界提出的关于教育本质问题以及历史学界提出的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问题,等等,也都是当时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继续深入和展开。这些,对于推动当时的思想理论大解放,推动各项工作的大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期,我们广东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同志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我们经济学界提出“外向型经济”、“混合经济”等等思想理论的新观念,也都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陆续出台的。

事实充分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根本上进行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大大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当然也就从根本上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学风,解除了一切唯书、唯上的思想缰绳,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实践是真理的源泉和标准,真理的发现和发现,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做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工作,不断提高我们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并为改造世界服务,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绝不能脱离实践,一定要坚持以实践为出发点,以实践为归结点,源于实践,服务实践,这是真理标准的根本要求,是党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的根本要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所在。20年来,我们广东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开展的,因而生气盎然,生机勃勃,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研究总结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方面成果丰硕,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究、价格改革研究、金融改革研究、外向型经济研究、特区经济研究、第三产业研究、粤港澳经济关系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等等,都取得了一些全国瞩目的成果,并逐步形成了风闻全国的“团结、务实、开拓”的好风气,推动了思想理论观念的更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对此,北京《望》杂志社还专门前来广东对社科界和社科研究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并作了专题报导。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现在,我们正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实践中,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实践中,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要在这样的新的时代实践基础上进行,而且为新的时代实践服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本要求。新的时代实践有大量的新情况新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研究;特别是当前在我国我省跨世纪的新一轮攻坚性的改革发展实践中,有不少全新的课题,有不少难区、盲区和禁区,迫切需要我们认识、去突破,这就必须坚持和发扬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精神,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深入实践,研究实践,总结实践,认识实践,才能获得新的成果,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为发现、发展真理作出新贡献。最近,中共广东省委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围绕着“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是深入实践认识实践的重大举措,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更应身体力行。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当前仍然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不深入;二是怕深入。不深入,就是缺乏实践根底,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怕深入,就是缺乏勇气,思想上怕出问题,犯错误。特别是对传统观念认为的一些禁区,不敢冲击,不敢突破。这样,就难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统一。中国古人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既要深入,又要勇气的道理。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不朽之作《实践论》中曾借用此话来比喻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真是一针见血,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要取得理论研究成果的道理。我们一定要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为榜样,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为榜样,既要深入社会实践,又要提高理论勇气,就一定能在新的时代实践中取得新的成果,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梁渭雄,广东省社科联研究员
(510050)

责任编辑:冯生

让哲学思维在领域的体系中熔炼凝聚

□ 赵宋光

哲学要得到有活力、无止境的发展,应当按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这学科的体系呢?这体系应当从某一主义的原则推演出来,还是由若干必不可少的领域组成呢?按前一种方式所建立的,是主义的体系,按后一种方式所建立的,则是领域的体系。作为领域的体系而存在的学科,就哲学而言人们颇感生疏,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却为人所熟知。例如物理学,是由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学、磁学……等领域组成的体系;在不同的领域里讲到不同的定律,例如牛顿定律、欧姆定律,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建立了什么牛顿主义、欧姆主义的物理学。物理学的现代发展不断开拓一些新的领域,例如原子结构理论、价键(分子内的电子轨道)理论、非平衡态统计物理理论、原子核结构理论、量子电动力学,但领域的扩展并不推翻领域的体系,物理学的现代化并未呈现为建立什么爱因斯坦主义的、玻尔主义的物理学。物理学之所以能作为一个牢固而不朽的学科持续存在,物理概念的不断变革(在某些历史瞬间人们所惊呼的“危机”)之所以非但不会冲溃这学科的体系,反倒使它一再获得新的活力而成长得越加健壮,在每一次“危机”过后就展现一片“新野”,不正是由于这学科的历代耕耘者从来就不是按主义推演的方式,而是按领域组成的方式来建立它的体系的吗?如此成果丰硕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困惑徘徊的哲学学科耕耘者不是大有教益的吗?

有人会立即以如下理由进行反驳:①)物理学是实证科学,哲学是思辨智慧,两者方法不同;②)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界不依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哲学则还要研究人类的认识、意志、情感活动的本质,两者对象

不同;③)物理学要揭示自然界的必然性,哲学要探究人类的自由本质,两者趋归不同。不错,这三点不但是无可否认的,而且是不容忽视的。但这三点不同就成了哲学不应由领域来组成而只能凭主义来建设的理由吗?实证科学要靠许多时代许多民族的科学家以各自的实验和推导来添砖加瓦,思辨智慧就不需要许多时代许多民族的哲人以各自的概括力和想象力来互补共建而注定只得由个别巨人所提出的主义来包统吗?自然界的规律是否如此如此,有检验其真理性的客观准绳,人类的认识、意志、情感等等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难道就只有个体主观性的现象而没有社会客观性的本质了吗?对人类本质的判断与预测,就没有真伪可言?或者,检验这真伪就没有客观准绳而只能以某种主义为尺度来衡量?自然界的必然性可供人们平等地加以研究,自由比较真伪,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研究就没有学术平等可言了吗?就非得采取由若干主义压倒其余主义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吗?

理顺体系所应包括的领域,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任何主义的学说所发现的具有真理性的原则。批评某些主义的片面性,也并不等于否定这些主义的提倡者所发现的原则的真理性,而是要从滥用、误用中拯救这个真理胞核。在哲学中,由不同的主义所强调的主张,有不少是像自然科学中的定律、原理、定则一样,经过发现、总结、比较、优选而建立的,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原理,具有不可蔑视的真理性,但原则所具有的真理性并不能自行杜绝传播者对它的误解和曲解。回顾半个世纪来的教训,陈晏清和高清海说出了我们许多人今天共同的认识:30年代

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诠释本传播开来的教科书并没有准确地表述马克思自己创立的那个体系,没有很好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实质,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不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质内容,有许多观点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关键在于对马克思所进行的哲学变革的实质认识不清,把握不准确,研究不深刻。如今天众所周知的,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马克思的大量手稿是在死后几十年以后才得以公开问世的,许多手稿译成汉文还不到20年,因此至少在我国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真谛的钻研和领悟至今还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就哲学的主义而言,我确认自己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隐义学派,但我并不能担保自己今天对马克思哲学思想隐秘核心的理解已经完全准确无误,正如今天谁也不能保证,凡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都有一致的理解。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大家都以捍卫真主义的名义进行论战,谁能保证不会在坚持某一观点时不以假冒真,不会在抨击某一观点时不诬真为假呢?如果大家都难免走上这样一步,岂非很容易把真诚的是非之辨变成恼人的善恶之验,而妨碍了对真理性的切实求索?对于这一类事件至今记忆犹新,恐怕是相当普遍的,但未必有很多人从中得出根本性的教训:这些互戕的杀伐都是急于简单地抱定主义的体系,而对体系所应包括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广度深度,对每个领域中领悟真理性的艰难曲折,缺乏清醒估量所必然导致的。从领域着眼进行梳理,就是要在充分估计这些领域的广度深度的前提下慎重地对待它们的内涵,要给前人已经发现的具有真理性的原则、原理找到它们各自应在由领域组成的体系中占据的位置,从而使后人能在这正确的参照系与逻辑联系导引下相继发现一系列相关或互补的原则、原理,逐步充实范畴、原则、原理的网络,使发现真理的漫长过程得以不断延伸。

要使一个学科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必须让互相对立的观点有机会充分地互相争论,就这一点而言,领域的确立好比舞台的

设置。有了一定的舞台,就能让不同的角色尽情表演,形成种种戏剧冲突,以组成一台完整的戏;有了确定的领域,就可以提出一系列共同的课题来使对立的观点互相交锋,在互相切磋中深化对课题的探索。一旦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何必一定要冒那以假冒真或诬真为假的道德风险而自诩为某某主义的代表者呢?就某一领域中的某一课题,我完全可以朴朴实实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只要这观点和主张与前人或他人相比有独到之处,能更胜一筹,不就是我对这学科领域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了吗?多少年来我们向往的百家争鸣之境,该沿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到达呢?不正是必须首先确立学科所应包括的一系列领域,让愿意投身某一领域的争论者人人都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对某一课题的观点,使许许多多一家之言自由地聚首对话,不是唯有这样才能积众多的一家而成百家吗?这样的局面之所以同坚持与发展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毫不抵触,是由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划时代的哲学观点的真理性,必须通过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讨,也必将在无拘束地发挥每个探究者的创造力之后,方可为人们普遍地理解、接受、丰富并发展,这是我长久以来预感和坚信的。

哲学应包括哪些必不可少的领域呢?

首先应包括本体论。我同意黄楠森的看法,本体论,即关于存在的理论,是第一哲学,是哲学的起点,这不能变。但在涉及世界存在与人类存在的关系问题时,在应否承认单纯关于自然界的本体论这一问题上,哲学家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其实可以通过划分领域来解决,考虑到存在及其本质的发展历史的阶段性,可以把存在按时间顺序(请注意,不是按空间位置的差异)划成两段,以从猿到人的过渡期划界,之前是未有人类的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之后是人类诞生后世界的存在与本质发展的过程,与两段对象相应,就有两个领域,前一领域可称为自然本体论,后一领域可称为人类本质论(对分界线的哲学探讨可归入后一领域)。

关于后一领域的必不可少,看来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即便是那些对本体论的提

法持批判态度的哲学教授,也都主张哲学要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要解决人在自己活动中创造的那个世界与本来的那个世界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既然要思考两者的关系,当然必须首先承认两者的存在;而且,按马克思对于人类本质的理解,自然界随着人类的成长就逐渐转变为属人的世界,因而世界的存在就逐渐归属于人类本质的存在。至于有人提出的,对于“人”的哲学思考也必须防止“本体论化”的倾向这一警告,那是出于对本体论的误解:把本体论这一领域跟历史上曾盘据于这领域的稚拙僵化的思维方式混同了,把本体论学科跟还原主义混同了。实际上,按马克思所开创的思路来重新思考人类的本质,仍是在本体论的领地上进行耕耘。可以把这片特殊领地称为“人类本质论”。

但前一领域是否成立却颇有争议了。在当今哲学界,想从哲学学科的整体中砍除自然本体论者,不乏其人。由于素养的偏倾,颇有些哲学家对这领域不感兴趣;我对他们的喜厌可以谅解,也对他们在这领域面前却步不入的自由权利表示尊重。但当他们论证其砍伐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不得不挺身而出,急呼“斧下留根!”举斧的哲学家大概都不反对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既然如此,当你们思考人类存在的历史发展与人类本质的逻辑结构之间的一致时,有没有觉察到,如果把存在的历史拦腰砍断,只要后果不要前因,那末也就无异于毁坏了逻辑的完整性,只截取人类本质结构的顶层,而抛弃了它的底层根基。就存在的时值而言,人类诞生之后这一段只不过几十万年,之前的天体演化史和生物进化史却以亿年计,有什么理由只抓零头而无视大数?有人困于方法论的难点而哀叹:离开人的本体论是没有意义的。方法论的难点毋庸讳言,在探讨未有人类之前的自然界存在时,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一个矛盾:就本体论作为哲学理论而言,是人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就所探讨的那个自然界而言,那里面还不存在人,但这矛盾的不可避免并不是取消这个哲学领域的理由。对于任何个人而言,设想一个还没有

自己的世界曾经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德国民间儿歌所唱到的:“当我的外婆结婚的时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设想一个还没有人类的自然界曾经存在,也决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对理解人类本质从无到有发生之何以可能与何以必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承认这样的自然界曾经存在,人类的根由从哪里去找?况且人类不是从无生命的存在物中起源的,而是有生命的存在物高度发展的结果,可见人类的本质不能在生命的本质之外去寻找,而必须通过追溯生命从无到有的发生来理解生命的本质,再沿着生物进化的漫长阶梯来巡视对原始生命本质的不断超越,才能对人类的超生物本质获得更深的认识。如果无视自然界在人类之先的存在及其发展历程,如果砍掉这意义上的自然本体论,这一系列本质问题的哲学思考不就都被取消了吗?这究竟是哲学理论的进步还是哲学思维能力的萎缩?许多喜爱思辨的民族在自己生产力和科学知识还很嫩弱的童年时代都曾经编造过创世的神话,想象过生命从无到有、人类从无到有的发生过程;与之相对比,在生产力和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当代倒有一批哲学家主张取消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取消这个自古就有的哲学领域,这不能不评为患了思辨力瘫痪症。砍掉自然本体论,必造成世界观的残缺,这样的残缺是健全的头脑所不能容忍的。

对人类的能动性创造活动的不同方面进行抽象的思考,经过长期的积累,有些课题从本体论分化出来,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哲学学科领域。

认识论是其中之一。这个领域是人们最熟悉的,有人甚至以为哲学主要就是认识论。哲学当然必须包括认识论,今后仍有必要就这领域中的许多课题展开热烈的争论,但关于这个领域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有些看法须及早校正。许多人把认识论所探讨的问题归结为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把认识主体归结为意识,把认识的对象归结为存在,又把在这意义上所提出的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看作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这样的看法中,认识主体首先作为实践者这样的物质性个体或群体而存在这一前提就被丢失了,认识主体所使用的、作为肢体与器官之延长的工具手段和符号手段在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全被忽视了,因而在如此理解的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中也找不到人类首先作为实践主体的位置。这里面,既有认识论自身理论框架的残破,又有认识论与本体论领域相互关系摆法上的紊乱,按哲学体系各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来予以校正,认识论本是在人类本质论基础上派生的一翼,从这一翼的角度看,人类仅仅看作认识的主体,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和符号仅仅看作认识的手段,人类周围的世界仅仅看作认识的对象,仅着眼于这样的侧面来观察主体、中介、客体三者的关系。

马克思在确立人类本质论的新观点的同时,还向人们指明了,同认识论相对称的另一领域是哲学学科所必须包括的,他用“实践”来指称这个领域。这领域是在人类本质论基础上派生的更重要的另一翼,从这一翼的角度看,人类看作实践的主体,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和符号看作实践的手段,人类周围的世界看作实践所建造、改造、支配、控制的对象,着眼于这一崭新的意义来重新观察主体、中介、客体三者的关系。这个领域,前人曾涉及过,例如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从道德的视角接触到这个领域;但是在这领域中发现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并把这新发现跟人类本质论领域中的新观点紧相扣结,则是马克思的创造。现在我们怎样称呼这个领域?本来,我们不是不可以照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把这个领域称为“实践论”,但许久以来哲学界用语的实际情况是,“实践论”一词已缩小了它的含义,已被理解为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观点、一个原则,一直没有被用作指称一个学科领域的语词。在这样的语用语义现实面前,为了避免让所确立的学科领域被误解为某种观点,为了鲜明地界定这个领域,我们对它的称呼不得不用另一个词——驾驭论(Cybernology)。通过对实践范畴内涵的分析,今天已有人提出实践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这广义的实践概念也

就是这里所说的驾驭——主体有目的地通过中介输出一定形式的能量或信息以引起物质形态或信息状态发生从不合目的转向合目的的变化。只有在驾驭论领域中,必然与自由这一对对立范畴才得到调解,自由才不是对规律的取消而是对规律的超越,人类的自由本质才寻到了根由。从驾驭着眼,异化概念的哲学内涵才明朗起来:主体的目的性活动及其合目的成果由于某种未被驾驭的必然性又引起了始料所不及的不合目的的后果,这是必然对自由的挑战,主体的回答应是拓远自己的驾驭边界,以更广范围或更高层次的驾驭活动进一步超越必然。为了最终征服异化,必须学会预防异化,探寻根治与预防异化的对策,是驾驭论应包括的课题。在探讨这对策时或许会引起对实践概念的反思:它是否不仅有改造对象那样一面,还应有寻觅、选取、保护、移植生态环境中一切合目的的形式这样一面?由此将能领悟到,借助各种必然规律来保证合目的形式持续长存才是更高水平的驾驭方式。

驾驭论和认识论是两个互相对称的领域。两者都研究主客体关系,但驾驭论侧重于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与技术史关系密切,有些课题被概括为“技术哲学”,而认识论侧重于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与科学史关系密切,有些课题被概括为“科学哲学”。仅仅看到对称性还不够,还应看到彼此的镶嵌关系——驾驭与认识的发展是互为条件、互为成果的,在一定的驾驭水平上才能达到一定的认识水平,反过来也只有认识的深化与正确才能保证驾驭的顺畅与成功。但若因此而否认两者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不让分开进行聚焦探索,却是对各学科领域和哲学体系整体的成长不利的。

除了本体论的先后两段和由人类本质派生的左右两翼,还有没有值得注意的领域?以上四个领域都是对历史和现状的思辨,但现状总是必须超越的,童年时代的人类曾借助占卜星象来猜测未来,每个民族都曾推崇自己的先知,在人类的认识和驾驭能力强劲施展之后,必定会更焦急地关心自己的未来,自问:人类向何处去?马克思曾按

自己的预见回答这问题,每个时代都要按当代的眼界重新回答这问题。因此,在沉思历史与现状的领域之外,还有一个瞩望未来的领域,一个涉及人类的世代传承、素质更新、未来前景、价值追求、目标信念的抽象思辨领域,那就是价值论。

初步划分这五大领域之后,有必要及时作一番根本性的反省。有人提醒我们,恩格斯说过:哲学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了,今天它又相继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从思维科学领域被驱逐,这说明具体的学科领域都是科学的对象,哲学不应进入那里面去跟科学争地盘,哲学只是方法论。这个看法,是非如何?在哲学探讨中重视方法论,无疑是正确的,哲学区别于实验科学的特色在于思维方式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它要求透过特殊把握普遍,透过局部把握总体,在抽象思辨要求下探得的独特方法,是哲学思维的精髓和灵魂,但是否因此哲学就只能跟一切实验科学绝缘,自足于无对象的玄思,变成一团无体可适的游魂呢?仔细看看,那被驱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那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现实联系的黑格尔式的自然哲学。如果因这样的哲学被驱逐就以为任何一种哲学都会被驱逐,那岂不是承认哲学的任务就只是臆造联系不成?哲学家难道没有在近代自然科学史上看见,那些植根于实验方法如春草丛生的具体科学,在驱逐臆造胡编的同时又在不断分泌新的哲学思辨?实验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艺术科学、教育科学)都只能对世界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各自囿于某一门类的局限之内,但整个社会还是要求对这些研究成果作总体性的把握,当各门科学的专家从各自的小天地走到一起进行跨学科的交谈时,常发现由于用语不同、言聆阻隔而对新的研究成果难以彼此沟通,在这样的处境中,如果他们不曾沾染文人相轻、妄自尊大的恶习,就自然会产生寻找普遍概念进行总体协调的渴望,有了抽象思辨的迫切需求,这时来了一个对实验科学既无知又傲视的哲学行家在他们中间卖弄玄学,怎能不被嗤之以鼻?但正如暴君被逐

并不证明社会不需要领袖,傲慢的玄学家遭到冷落并不证明具体科学成果不需要在哲学统率下达到跨学科的总体领悟。举例说,围绕生命起源与本质这一本体论课题,要涉及几十个自然科学学科的知识领域,有志于研究这专题的哲学家若抱住一套自认为普遍有效的方法夸口炫耀一番,重复说什么生命就是蛋白质的功能,哲学思维决不会有丝毫进展,相反,他应当首先拜这几十个自然科学学科的专家为师,向他们请教有关生命问题的最新科研成果,然后才有可能找到其间实际的联系,从他们所说出的各种特殊的学科术语中提炼出普遍的概念,以他们所讲述的许多局部为所凭的材料来构成一幅有关生命科学的总体图景,这才有了抽象思辨的哲学思维用武之地。摒弃无依据的臆造和无对象的玄思,阻止哲学变成傲慢的霸王和无家的游魂,让它复归为好客的领主,也就不会发生跟具体科学争地盘的问题了。有人担忧,众客挤满了我的住处,我岂不又被挤走了;学科领域里塞满了实验科学材料,那还成什么哲学学科呢?这里用得着夏甄陶提出的“层次跃迁”概念。夏甄陶主张,哲学应“既立足于各门具体科学又保持着对于各门具体科学的超越性”。指出:随着各门具体科学的进展,随着人类从不同角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具体侧面的认识在形式上的完善和在程度上的深化,哲学在总结概括各门具体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总体性把握就越显得必要和重要,哲学与具体科学在对象上的层次分化也越加明显。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同一个地盘上可以有不同的楼层。如果哲学思维发现自己在住满宾客的平地上无处可栖,就该及早醒悟,他本该筑楼而居。简言之,哲学学科的每一个领域都应以实验成果为依据而具有立体化的多层次结构。

在此有必要及时作一重要补充。人们讲到哲学的层次超越性质时,通常只跟科学相比较而言,其实,哲学作出层次跃迁并不限于对待科学,对待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哲学思维方式也予以层次超越。例如,在与科学认识相对称的实践意志活动领域,人类

所作的技术规定、法律规定、道德规定等都是特殊局部的规定性,而哲学则要对这些规定性加以抽象思辨,提出高层次的普遍总体的驾驭规定性。又如,在民俗、文化、艺术、教育活动领域,人类所作的愉悦追求、审美追求、神圣追求、人格追求等都是特殊局部的追求,而哲学则要对这些追求加以抽象思辨,提出高层次的普遍总体的价值追求。

关于哲学思维的特点,朱德生强调它指向形而上,这看法在当前我国哲学界是异乎寻常地大胆而深刻的。由哲学思维与形而上对象的相互关系,朱德生得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三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一旦承认了思维对象除了有形而下的层次,还有形而上的层次,那末不但关于存在的思考可以作这样的层次划分(而关于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就构成本体论),而且关于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驾驭关系和价值关系的思考也都可以作这样的层次划分,植根于实验、观察、记载的具体科学以及技术艺术活动等属于形而下层次,对之加以抽象思辨的哲学学科属于形而上层次。这样,就不仅摘除了百余年来误加于形而上学的朽败恶名而还其应有的地位,而且使形而上对象的领域较原先的理解有所扩展,它不是等同于而是大于本体论,连同从本体论分化出来的认识论、驾驭论、价值论这些领域,只要在探讨的思维方式上达到了哲学应有的抽象性、思辨性,逾越了具体科学的特殊与局部的限度而升华到普遍与总体的高层次,那末它们也都会具有形而上的品格。关于两大层次的划分,朱德生的提法是,具体科学的思维是有限思维,是关于有限对象的思维,而哲学思维是无限思维,是关于无限对象的思维。从意向上,我赞同这说法,但对用语,我建议稍作修订。“无限”一词,许多人不是从思辨层次上去理解,而是从量的、数学的意义上去理解的,一讲到“无限”就立刻联想到宇宙的无限浩大,粒子的无限分割。黑格尔曾特地把这种空间直观的、数学思维中的无限称为“坏的无限”(或译作“恶的无限”),以免让它混同于自己所讲的抽象思辨的、哲学思维中的无限。尽管如此,学哲学的学生不幸仍一

再陷入这种误解,把数学所设立的无限大和无限小当作高深的学问津津乐道。这种思路上的岔道看来必得通过修订术语来矫正,我想最好不用“有”“无”来区分这两大层次,而把它们区别为“囿于限下”还是“逾乎限上”,分别称之为“囿限”与“逾限”的思维。层次的跃迁升华并不要求同任何界限都不相涉,只作与世无关的玄想,而是要揪住某种确定的界限来逾越它。正如夏甄陶所说:哲学思维必须以双脚立地并用双手从大地攀摘果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哲学思维过程是从非哲学的对象世界(和主体活动)以及作为其观念表现的各种具体科学知识(和具体规定追求)中抽象概括出哲学问题并加以哲学研究和处理的过程。用“逾限思维”的提法取代“无限思维”的提法,有助于避免把哲学思辨误解为不着边际、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

以“结构”一词的内涵为例,近百年来,它经历了由囿限的具体科学概念升华为逾限的本体论范畴的过程。“结构”一词是有其感性直观起源的,最初来自建筑术,后来用于机械制造,上世纪后半以来,许多学科在借喻的意义上采用了这个词:在化学中谈论分子结构,在社会学中谈论经济结构,在语言学中谈论语法结构,在物理学中谈论原子结构,继而又追究原子核结构与核子结构,在心理学中谈论神经系统结构,在文化人类学中谈论文化心理结构,……到今天,结构已经超越具体学科的界限而在哲学中得到探讨,升华为一个形而上的抽象思辨范畴。在这演化的全过程中,概念经历了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起源于建筑术、机械学时那种没有离开感性操作活动的初级概念,以后上升为在借喻意义上指称一系列具体科学对象的概念,这些概念虽然抽象,仍有感性模型,尚囿于各该学科的界限之下,是囿限概念,最高层次是在哲学中被思考的概念,它所指向的对象由于跨学科而无法再用感性模型来描述,这就是逾乎限上,达到普遍总体高度的抽象思辨概念,是逾限概念。到这个高度,就会提出“什么是结构一般?”这样的形而上问题。

这样的形而上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按照对形而上问题的古老而稚拙的思考方法，就是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去寻找一个孤立的、僵化的、分离于现实的特殊结构之外的观念实体；由于把这种古老的稚拙方法称为“旧形而上学的方法”，导致了世人在长时期内对形而上学的深重误解，以为形而上学注定了同这种幼稚病终身相伴。人类为了医治这幼稚病，曾花费了千年以上哲学争论的代价，康德力图克服经验主义与唯理论主义的两极片面性而把综合与分析统一起来，黑格尔肯定了这一努力而确认“在哲学方法的每一运动里所采取的态度同时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并进而提出“必须在认识的过程中把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是思维形式考察思维形式自身，所以必须由它自身来规定它自身的限度，并揭示它自身的缺陷”。黑格尔正是把这种思维运动称作“辩证法”。但问题在于，在进行这样的“思维自我争辩”时，怎么才能把具有真理性的辩证与谬误的诡辩分辨开来呢？黑格尔由于否认了形而上对象的客观存在，就丧失了辨别两者的客观标准，无法在具有客观效力的辩证思维与只凭主观杜撰的诡辩臆造之间划一条界线。划这条界线的前提是承认形而上对象在客体中的存在，承认“结构一般”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才是分辨真理和谬误的准绳；但困难的是，它既然不像柏拉图所想象的那样在现实世界之外作为“实体”而存在，又该到哪里去寻找这个准绳呢？秘密就在当初的借喻之中。科学家们的借喻是有根据的：直接的依据是各领域科学家的理性的直觉（而不是感性的五官感觉），觉得这个对象（例如分子结构）跟那个对象（例如机械的结构）相似，因此那个词（结构）在这里（描述分子）有可喻性；而藏在这直觉背后的间接依据，就是两者在客观上的某种相同点，不同领域对象之间的形而上的共性。哲学思维的任务就在牢牢抓住许多领域的科学家当初那指向客观共性的理性直觉（在这点上哲学思维具有反思的特征），运用思维形式内部概念对概念互相切磋的方法，使其互相规定又互相

赖以逾越自身，来表述这个客观共性。例如，结构必须与质料相关而言，任何结构的构建是以所凭质料的预先存在为前提的（分子结构以原子存在为前提），结构之为结构，恰恰就是所凭质料之间的相向作用和空间时间布局，一旦建成某个结构，就生成新的质料（特定的分子结构生成特定物质的分子），这结构既是所凭质料的外结构，又是所生质料的内结构，从所凭质料到所生质料的层次进展就是通过这结构从无到有的构建实现的，进入了这样的范畴网络，不但“结构”，而且与它相关相对的“质料”，就都成为超科学的逾限概念。这样的范畴网络是否具有真理性？衡量分辨的直接依据是各领域无数科学家的理性直觉，其间接依据是那直觉所指向的形而上客观对象。这就是探讨形而上对象的新型辩证方法。可以预见，采用这方法将使形而上学获得新生。

经过这一番侧重于方法论问题的反省和清理之后，可以明确哲学思维的抽象思辨特点与哲学对象的形而上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对象而言，形而上层次的达到必须通过形而下层次的递进，必须透过特殊才能达到普遍，必须透过局部才能达到总体。相应地，就方法而言，辩证法并不是什么可以到处套用的现成公式或万灵药方，而是要求从容纳大量具体学科的囿限思维成果做起，对它们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进行以普遍性和总体性为目标的逾限思维，通过概念之间的争辩切磋，提炼出抽象的范畴网络，进而探寻不同领域的范畴网络之间的协调一致而使之联合成思辨的范畴体系。借用形象的语词，可以把这样的层次递进、跃迁、升华过程喻称为“熔炼”。由此看来，方法论与上述五大领域（自然本体论、人类本质论、驾驭论、认识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相并列，而是纵横交叠，因为每一领域内的层次递进、跃迁、升华所需要的辩证法，既有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启发的共性一面，又有受制于领域的现实素材而各不相同的特性一面，而不能另立一种游离于领域之外的封闭自足的方法论。既然如此，承认方法上的总特点与承认五大领域的大体划分就不

相抵触了,正如承认哲学中的原则、原理的真理性与承认哲学体系应由领域组成不相抵触一样。

在迄今为止我国哲学界所耕耘的园地里,被称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大课题,是与两大主义的体系有别的,向来容他性较多而排他性较少,向来习惯于像把矿石投入熔炉那样把大量现代科学所分泌的哲学思维素材容纳进来,其中有的课题涉及自然本体论(例如夸克囚禁问题、耗散结构问题、新达尔文主义与新拉马克主义之争),有的课题涉及认识论(例如库恩与拉卡托什关于科学史的见解、哥本哈根之雾、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的课题涉及驾驭论(例如人机系统、技术史的阶段划分标志、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相互关系)。研究的气氛既如此开放,研究者又大都具有较好的理科素养,对现代科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又有较浓厚的兴趣,本来可以指望能以这类课题为契机逐渐按充实领域的方式来建设哲学学科。可惜由于研究者往往把辩证法看成几条现成的法则,而不认为它是向形而上层次纵深钻探的特效利器,所以这些研究常常满足于在自然科学中为现成法则撷取例证,而不敢提出开创性的假设,不敢根据新发现的事实来矫正陈旧的断语。例如“从量变到质变”这一概括表述,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还处于不完整不确切的认识水平,在化学所发现的同素异构体这样的事实面前早已碰了壁,在现代化学、物理学中早已被“结构决定质”的表述所取代,但有些研究者却还在竭诚尽力为它撷取例证。又例如核子是否可分的问题,由于夸克囚禁现象被发现,已经引起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核子中的几个夸克,既是可分析的,又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核子也许具有可分析与不可分割相统一的本性,但有些研究者还在简单地重复“无限可分”这一不顾实验的断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描绘世界总体图景时,不少人按古代的变易观来理解“对立统一”与“矛盾转化”,把辩证法混同于循环论。人所共知,中国古代的《易经》与《老子》中就有阴阳交合、阴阳对转的思想,并在自然界的昼夜、四季、动植物生命史中

找到无数例证。但这些不息的变化都会周而复始,形成循环,因此在总体上却可以归结为“常道不变”。这种朴素的变易观虽然从形而下的不息变易出发,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形而上的恒常不变。与此相仿,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里我们也发现了任何天体从生成到毁灭的“巨大的循环”。可是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成果却向我们描绘了另一幅世界总体图景:既有结构层次的无限进展,又有结构样态的无限增添。就这种观点的起源而言,是对某个存在物予以解剖拆卸又重新联结组装的机械学方法,但通过主体对客体拆卸组装的能动改造活动却探得了客体结构层次进展的漫长且指向无限的阶梯与枝脉。这种脱胎于形而下的积木器具的机械观竟出人意外地成熟为结构进展与改塑的无止境进化观。以上诘难无意对有关形而上对象的争论作出结论,我提出假设的同时就期待反驳,我正是把相反观点的反复交锋包括在熔炼之中,只有通过充分熔炼,清除杂质,才能达到向真理凝聚。

通过熔炼而向真理凝聚的过程,在人类本质论与价值论两大领域里将会艰难得多,却也壮观得多。

由于人类本质的规定性受制于许多方面、许多因素,也表现于许多侧度、许多层次,不仅表现在各个个人的生理心理结构的许多层次的状态,表现在各个个人的活动与他所支配或服从的工具与符号两层手段体系的交互作用,而且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各种方式,个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或政治、军事等组织中的各种不同的地位,因此,对于人类本质的研究自古以来也由于侧重于不同的方面、因素、侧度、层次而形成许多不同的学派,彼此激烈地论战。古代性善说、性恶说、内因说、外因说,都有自己现代化的后继者。当今,在心理学领域,有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有巴甫洛夫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有格式塔学派和皮亚杰学派,有人本主义思潮,他们的争论激发人们对人性进行新的哲学思考。马克思曾要求从社会关系的总和着眼来考察人的本质,这就形成了着重从人际关系对个人本质的改塑作

用来分析人的本性这种社会学方法；但按照马克思所肯定的“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隐义中又蕴涵着必须重视生产力结构对个人本质的塑造作用这种工艺学方法。由此发展出这样的研究模式：从剖析生产力的结构入手，研究社会分工、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研究人的与生产手段相关的阶级性，分析阶级内的与阶级间的人际关系及其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决定作用。对这类研究的成果进行哲学反思，对某些研究者把外因说推到极端所导致的理论危机与实际危害加以省察，也是逾限熔炼的内涵之一。文化人类学则侧重于语言、文字、图象、记号等及其动态存在所构成的符号体系对于社会个体与群体心理结构的制约作用，也兼顾到每一代人的创造活动对这套体系所施的影响。对这些实证材料的哲学思考，曾以现象学、词义哲学、结构主义神话学等形态出现。各学派的争执之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分外激烈，不仅由于视角之多与分歧之大，而且由于各种观点常反映社会集团自己的现实本质与物质利益，因而当观点遭到批驳时，常不能保持冷静反思。为了克服浅薄的激动对哲学思维的干扰，更有必要明确主张要学会指向形而上对象的逾限思维。

在哲学的五大领域中，价值论成熟得最晚。在许多人对哲学内涵的理解中，没有它的地位；即便是已经认真思考了价值问题的哲学家，也不一定意识到对价值的思考本身就足以构成哲学的一个领域。朱德生在讲到哲学的根本任务时说：“人类的全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人们一旦实现了一种既定的理想之后，他们又会提出新的理想，并为之实现而奋斗。……如果哲学不能指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存在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并指出这种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那末，哲学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这段话结束时，终于提到了哲学存在的价值，这使我们返回去咀嚼上文时领会到那些话都为了说明这价值之所系，哲学的价值正系于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它表现为一种超乎现实、超乎认识、超乎实践的

方向和道路，人们称之为理想，而理想之所以不愧为理想，就在于它具有那种值得为之奋斗的价值，一旦理想丧失了价值，人也就失落了理想。

哲学学科之所以必须把价值问题置于顶冠的位置上进行指向形而上的思考，是由于人类在走向宇宙主宰的历程中，从来都把自己一切活动的归宿落到对永恒价值的执着。这价值，当然不是指经济学所讨论的商品价值、价值规律等术语中的价值概念，它与使用价值、功利价值等语词所指的价值相比，虽有相近之处，但却超越了经济利益的限度而具有道德、审美的内涵，与意志、激情相关，因而分量重得多，意义深得多，层次高得多，容量广得多。这是必须由逾限的思辨加以把握的形而上的价值范畴。价值论的对象之不同于认识论、驾驭论的对象之显著特点在于主客体不相分离。在认识论与驾驭论中，主体与客体是作为互相对峙的双方来建立相互关系的，通过中介，双方得以达到统一；但在价值中，对于对象的令人欣喜的状态的追求与对于主体自身欣喜状态的执着，是不可分的，反转过来，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是同对象化生产性活动不可分的，主体就在对于对象状态的规定行为中实现自我。特别是，当社会性的个体彼此值得互相爱慕崇敬，值得互相关切期待时，作为客体而面对主体存在着的，正是另一主体。人们对价值范畴难以把握，不仅由于它有上述主客体浑一的性质，而且由于，以不同等级、不同品格的价值为轴心的人类活动，展现为极其多样甚至互相排斥的方式，以致人们觉察不到它们指向同一个形而上的对象。在各民族的民间和专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到处弥漫着对故土、亲人、美好事物和美妙瞬间的眷恋、思念，这些价值细胞看来似乎琐细，却何以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主体？那赞颂它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尽管只是一些召唤意象的符号，却又何以值得反复品味，一唱三叹，何以能充溢着如此隽永的魅力？古往今来多少殉职殉情的烈儿烈女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究竟发现了什么，是什么牵住他们以如此热烈的爱来执着它，当它的存在面临威胁

时毅然以生命为代价来守卫和换取？而后世对他们的传诵之久远，何以竟能千百倍于他们的生命所占的时值？

价值追求的强化形式是寻求不朽。在人类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不朽，怎样能不朽之前，就已经苦苦寻求了它几千年，木乃伊、密封棺是最幼稚的方式，编织关于来世、复活、天堂、极乐世界的幻梦，并且当作真的来追求，就导致价值探索历程中巨大的历史曲折。寄托着价值观念的那些幻境虽属虚构，为企达彼境而以戒律约束行为的努力却是真实的。震惊于纵欲招来罪恶引向毁灭的大量事例，使人把欲望看作陷阱，认定只有沿着禁欲之路才能通向不朽之境。当发现科学和技术被用来戕害人类时，又曾有人把认识能力和驾驭能力的壮大同生理心理需要的满足一样列为神圣理想的障碍而压抑它们，这造成广泛的匮乏，必然在陶醉于价值幻影的同时困于价值饥渴。实际上，纵欲与禁欲这两极，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与摧残这两极，都导致价值失落。在极度亏欠之后，存在主义思潮犹如在价值饥渴的煎熬中发出的凄厉呻吟，它从反面强调出，不朽是人类的高层次需要，重视价值论的哲学学派正在重新思考这千古的不朽之谜。

不朽之谜的谜底是什么？谜底的核心可能就在教育，就在按照美的规律对后代进行教育的系统工程。正如DNA的结构是任何生物物种赖以传种接代进化改善的信息依凭，超生物的人类世代传承弃恶臻善的信息依凭则是教育工程的结构，这信息传递使无数个体的创造活动所凝成的价值得以淀积为族类共有的财富而万世长存。固然，科学的教育理论必须以受教育者生理心理发展成长的规律为依据，因而涉及人类本质论，高效率的教学方法必须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和驾驭规律，因而涉及认识论与驾驭论；然而，阐明教育在人类全部活动中的地位和意义的教育哲学主导部分却属于价值

论领域。唯有从价值论的视角，教育家才能认清自己的使命：教育对象并非被动的原料和产品，而是成长中的创造性主体，如果主体不成长到相应的高度，再好的理想蓝图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教育应有能力也有责任使后辈在认识能力驾驭能力的强大程度和人格的完美程度等各方面超过前辈。唯有从价值论的视角，社会成员才可能洞察自我教育与终身教育的重要，使教育的功能深化为对日益丰满高超的人性境界的自我塑造与自觉构建的社会浪潮。在那靠着遵循美的规律的教育之功建立的一代高于一代的无限序列深处，我们才得以窥见自己的不朽永垂。可不可以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美育代宗教”的设想？也许我本不必过早试揭谜底，而应该首先搜罗尽思想史上一切有关价值论的思想材料，投入逾限思维的熔炉，等待它们在充分熔炼中自然凝聚。

借助形象来概括，五大领域组成的哲学体系好比一头丹顶鹤，人类本质论是身体，自然本体论是腿脚，认识论和驾驭论是张开的两翼，而那引项远眺的头部就是价值论。这五个领域相互间的逻辑协调与有机整合，靠的是它们所共有的指向形而上层次，开拓逾限思维、构建范畴、原则、原理网络的辩证方法，它可以比作保证“五体协翔”的经络系统。“五体协翔”这词儿也许叫人联想起少年航空模型，如果是这样，倒使我得到安慰，因为我不但希望新时代的哲学能像航模那样轻巧起飞，而且祝愿哲学的守护者在尽察人类历史的挫折灾祸之后仍然保持而且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巧手童心的放鹤人，且慢，让我们校正一下起飞的时辰：这鹤难免像黑格尔所说的猫头鹰那样只在昏暗中起飞，但不在那黄昏，却要在晨曦前更暗的昏冥中，它的起飞将迎来耀眼的旭日。

作者赵宋光，星海音乐学院教授
(510500)

责任编辑：思 哲

启蒙理性与工具理性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

□王守昌 李伟中

(一)启蒙的概念。“启蒙”,英文是 Enlightenment。从词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阐明、澄清、照亮。它给人启发和启示。演变成专有名词“启蒙运动”时,它的意思是思想解放运动、社会解放运动。在西方,从公元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至16-18世纪的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导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皆属于启蒙运动阶段。所以,启蒙有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遮蔽走向揭示,从愚昧走向智慧的含义。

西方的启蒙运动持续了约400年,形成了两大思潮、两种文化。从近代来说,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他们始终以人和意识为研究对象,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逻辑方法,形成了一种文学文化。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哲学家,以科学和语言为研究对象,运用经验主义的逻辑方法,形成了一种科学文化。这就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由来。一直持续到今天。

西方哲学大师们关于启蒙的论述,更加深我们对“启蒙”含义的理解。

康德说:“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使人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人;……”^①从康德论述看来,启蒙运动第一是摆脱人的不成熟状态,第二就是要摆脱宗教所造成的愚昧,第三,要用人的眼光看人。

从《悲剧的诞生》中间,我们可以发掘尼采关于启蒙的理解。尼采说:“希腊人在他们的日神身上表达了这种经验梦的愉快的必要性。日神,作为一切造型力量之神,同时是预言之神。按照其语源,他是‘发光

者’,是光明之神。”^②由于日神阿波罗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认为它是启蒙之神。尼采强调的是:应该对人民进行启蒙,既要反对宗教,又要反对现存国家。启蒙的任务就在于揭露侯爵和政治家所作的一切都是有意的欺骗。尼采在此是从人文主义立场,来理解和提出启蒙的。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卡西勒指出,启蒙精神是一种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仁慈的上帝交给盲人的一根拐杖。他说:“启蒙运动认为,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复兴的实际道路就是一个具体的、自明的证据,它表明‘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综合不是纯粹的假设,相反,已确立的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一理性是可以实现的。”^③实证和经验在西方是同一意思的,实证精神主要是经验主义。因此,启蒙精神应该在科学上表现出来,而不仅仅表现为人文主义科学上的经验。分析也是启蒙。

以上哲学大师们对启蒙的论述,他们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启蒙精神既可以表现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也可以表现在自然科学、科学方法论方面。但是,他们的论述没有清楚地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启蒙的两重性和内在矛盾。因此,对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比较详尽的展开。

启蒙是有两重性和内在矛盾的。首先是理性和权力的矛盾:它要求理性摆脱权力,却要求自己成为统治权力。当理性发展到极端,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它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压抑力量。成为一种权力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意义的,但发展到极

端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第二是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人是目的，科学是手段。但是后来科学成了目的，人却成了手段。启蒙本来是要确定人的目的和价值的，但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他们通过理性和科学把启蒙变成一种手段，抬高一部分人，压制一部分人，又打击另一部分人。第三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启蒙用科学从神的统治下解放人，但又要人服从科学的统治。在启蒙运动初期，本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有的。科学精神是充满人文内容的。后来，科学精神发展成为科学沙文主义、科学技术统治论。这种科学精神丧失了人文的内容。

持续约 400 年的西方启蒙运动是一个思想解放、社会解放运动的过程。只有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取得胜利时，理性权威才真正确定，西方的启蒙运动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二)工具的含义。“工具”的一般含义是：工具是操作的对象，是我们工作时人体器官的延长；我们也把工具理解为能够生产产品的东西，是控制自然的一种手段。具体地说，工具就是科学技术。它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自然、社会和人。

当我们进一步谈到工具理性时，就要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加深和拓宽，即指出它的人文含义和政治含义是什么？它的人文含义是：工具是反价值即反人的物质手段，工具（指科学技术）不仅统治自然界，而且统治人；当它统治人时，把主体和客体颠倒了，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这样工具成了统治人的工具。它的政治含义是指利用科学技术进行政治统治，把科学技术变成意识形态、非政治化的政治工具。

在拓宽工具的含义后，我们应讲清楚工具理性概念的来源。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 40 年代初，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理性曾作为解放力量，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由于社会的工业化，理性走到了反面，它成了达到实用主义目的的手段，成了统治人、奴役人的工具；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一书中指

出，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是一种通过技术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统治下，人们丧失了历史的、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他说：“当代工业社会趋向于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因为‘极权主义者’不仅是社会令人恐怖的政治调节，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调节，它靠既得利益集团对需要的操作而运转”，“目前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④哈贝马斯也指出，技术与科学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它已成为非政治化的政治工具，具有统治的职能。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担负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因为通过科学技术进入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使之既控制自然界，又控制社会和人。使人服从经济之内的统治，而不是经济之外的政治统治，这样居民可非政治化，统治具有了合法性，居民的抗议反而成为不合理的了。由于工具理性不仅是对自然界而且是对人的控制，它向我们提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在发展高科技、征服自然的时候，是否也应考虑它们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理性的本质和特点。我们从四方面来定义理性，从中可以看到理性的本质。

其一，从逻辑方面来定义。理性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能力。这是相对于感觉、知觉、表象而言的。

其二，从认识论方面来定义。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质、内在联系、全面性的认识能力。属于认识的高级阶段。

第三，从政治学方面来定义。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从逻辑、认识论领域引伸到政治领域，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权力、特权，也即是人权。用它来反封建、反宗教。伏尔泰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在理性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这是根据自然法得出的结论。他指出，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⑤狄德罗认为，认识不仅起源于感觉经验，还要进行理性思考，以便把握事物的本

质和原因。他说：“人们要花一番气力才能觉察到寻求真理的法则多么严格，我们的方法数目多么有限。一切都归结到从感觉回到思考，又从思考回到感觉：不停地重新进入自身，又走出自身。”^⑥所以，恩格斯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⑦

第四，从科学形态方面来定义。理性作为一种科学形态，逻辑、数学和物理等是运用理性思考的典型形式。特别是逻辑，它使得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和科学体系的创立成为可能。巴雷特说：“希腊人发明了逻辑。他的‘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照字面意义讲，便是人是逻辑的动物；……人是能够进行连贯的合乎逻辑的谈话的动物。”^⑧

以上就是我们对理性的形态和本质作的规定。现在我们来谈理性的特点，理性有下面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怀疑。它与宗教信仰和迷信相对立，也与权威相对立，它是科学发现和追求真理的前提。要先怀疑，后相信。对历史和现实，在相信它的思想观点之前，先来一番反驳、诘难、怀疑，看看它在逻辑和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一个理性主义者，在对待科学、对待人类的事务方面，不要轻信，首先应该去怀疑。

二是分析批判。对经验材料和事实进行分析，寻找根据和理由，不轻信，这就是分析批判的基本要求。分析就是划清界线。批判就是辩证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否定一切。一种理论、思想，先去批判它，再相信。看看它是否全面，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否有生命力。进行“扬弃”，在批判中去发展它。

三是证明或证伪的推理思维。证实主义强调证明，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证明了的知识，是从感觉经验归纳出来，并通过感觉经验证明的。但是，从感觉经验得来的知识

只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而且归纳法自身的正确性是不能得到证明的，所以，证伪主义强调假设、猜想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通过理性主义的逻辑方法得来的知识才有必然性。要对科学假设进行不断地反驳，用证据的假，求得命题相对的真。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是在科学哲学的逻辑范围内进行争论。要相信一个理论，要怀疑一个理论，总得不断地寻找证据，不断地反驳，以求得相对的真，才去相信它。这两种方法，在一定范围内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证伪主义的方法更优越。

四)何为启蒙理性？何为工具理性？启蒙理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导，是精神力量、解放力量，它渗透在14世纪至18世纪西方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的著作、言论和行动中。在他们的心目中，启蒙理性是教育人民、批判不合理制度、反封建反宗教的武器。启蒙精神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宗教神学衰落、科学思想确立、寻求合理社会、发现人的时代。以路德、伽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反天主教正统中起了进步作用；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一书，标志着理论自然科学的诞生，随之实用的技术科学也得到发展，人们发现了世界。与此同时产生的人本主义思潮，反对神权、神道、神性，主张人权、人道、人性，表达了他们对一个符合人性社会的追求。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导致社会转型，从中世纪的、封建的、政教合一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为近代的、政教分离的、以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思想革命产生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随之带来经济革命和生产革命。

工具理性是理性的物化、外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它是控制的新形式，有统治作用。过去控制和统治靠国家、军队、警察，现在靠科学技术。它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财富，使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进入了富裕阶层。使社会成为单面社会，人成为单面人，思想成为单面的思想。没有阶级对抗，人没有批判的意识，思想没有否定

性。在政治方面,由于大多数居民享受了这个制度的好处,过着民主的生活,所以,绝大多数居民认为维护这个制度对自己有利。革命的政治根源消逝了,但人民仍然不自由,仍然存在压抑。压抑性表现为攻击性,表现为异化。马尔库塞说:“技术进步扩展到了整个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了这样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调和了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了所有以摆脱劳役和控制的历史前景之名提出的抗议”,“面对该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出来;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⑨

(五)启蒙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别。第一,本质的不同。启蒙理性提倡的是一种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它的口号是“把人当作人”,号召尊重人,讲人性、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解放,批判人的不幸遭遇和状况,反对压抑人、贬低人、摧残人的神道、皇道,争取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

马克思主义充满着人文精神。它的人道主义包含着关于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异化、人的解放学说。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⑩

工具理性是一种科学技术统治,是反人道的,它把人变成了物、工具、机器。工具理性最早见于马克思·韦伯的著作,他将合理性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韦伯认为,科学技术是形式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讲究效率原则,是价值中立的。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合理性不是中立的,它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巩

固现存制度的政治手段。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和政治生活都成了科学的行政管理,统治具有工具理性的性质。他说:“发达的和正在发展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在它成功地发动、组织和开发了工业文明可资应用的技术、科学及机械生产力时,才能维持和保全自己。”^⑪

第二,社会作用不同。启蒙理性是一种解放力量,它把人从封建统治、特别是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的口号是“上帝死了”;人已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工具理性是压抑力量、统治手段,它对人造成一种攻击性,把人变成机器。特别是战争、环境污染把人带到了死亡的边缘。它的后果是“人死了”。弗罗姆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⑫

第三,针对不同的异化而言。启蒙理性是反宗教异化的产物,它要求把神变成人,尼采还要求把人变成超人。因为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的全智、全能、博爱无非是人的理性、意志和心的异化;工具理性是人的技术异化的根源,是不健全社会中人的心理不健全的根源。它使得人丧失了目的价值,缺乏创造性,成为无根的人,无个性的人,没有安全感的人,把爱与性欲等同,只知享乐,毫无否定意识的人。

(六)启蒙的辩证法。从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启蒙的辩证法已经走向反面,即是说,启蒙改变了性质,它已经变成了工具理性。

启蒙理性走向反面的内在逻辑是:启蒙运动曾把反宗教、反封建的理性、征服自然的理性,从神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由于自身的摧毁作用和内在的发展逻辑,它自身也成为了神话。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神话已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学。启蒙理性不仅发展为工具理性,而且导致文化工业的产生,启蒙理性

变成了欺骗群众的理性。总之,由于启蒙理性的越界、越权,使它变质变性,也改变了它的社会作用。

启蒙理性走向反面的外部条件:启蒙理性产生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的理性,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是后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产生的理性。启蒙的辩证法有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一文中指出,自19世纪最后25年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①)对国家事务进行调解的活动已日益频繁起来,这就势必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②)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使科学变成了名列第一位的生产力。而这两种趋势把昔日体制框架的布局和目的合理的基本制度冲得土崩瓦解、分崩离析。于是,当代的技术和科学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在工厂里进行机械化、自动化商品生产的社会,它的明显标志是技术进步,它的特点是“社会控制是一种新意义上的技术控制。”这是一个舒适的、不生硬的、合理、民主的但不自由的社会。发达工业社会有其单面性、压抑性、攻击性。它消除了一切抗议,使它们成为不合理的行动。这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一切现象的关键。

启蒙理性走向反面的后果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实证主义思潮和方法的猖狂,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知识和权力成为同义词,对自然的无限掠夺,加深了人对自然、人与人的异化。在经济生产领域,技术统治使人异化,生活质量下降。在语言领域,语言失去了否定性。它不再发出不同的声音,消除了抗议,加之技术统治使人物化,

变为驯服的工具。在政治领域,导致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横行,理性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在文化领域,产生了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技术,只不过用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对作品的逻辑与社会体系的区别。”“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理性本身。”^⑬

①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31页。

②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页。

③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④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⑤伏尔泰:《哲学辞典》,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

⑥狄德罗:《论解释自然》,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26页。

⑦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页。

⑧巴雷特:《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1页。

⑨马尔库塞:《单面人》,第3、4、7页。

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⑪马尔库塞:《单面人》,第3页。

⑫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⑬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第113页。

作者王守昌、李伟中,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研究所教授、研究生(510631)

责任编辑:思哲

论海外华商网络

□龙登高

华商网络,是指海外华商在非政治化的、形态不同的联系中,凭藉血缘纽带、基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泛商业网。正如80年代日本式企业管理模式曾风靡全球一样,海外华商独特的经营模式,也可能使世纪之交的管理学出现新的变化,其网络化经营尤为引人注目。

一、华商网络的渊源

由不同纽带、不同关系组成的多圈层的华商网络,表现形式多样,它是历史地形成和演进的。①

血缘纽带、地缘纽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粘合剂,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政府往往通过它们行使行政管理,在很多情况甚至就是由它们代行基层政府的职能,如民事仲裁、社会保障、社会协调等等。移民就是在这些纽带的作用下走出国门的,在亲友相携、同乡牵引下,一批批华侨相继来到东南亚和北美等地谋生创业,定居繁衍。如晚清潮州府澄海县陈黄利家族在泰国发迹之后,同乡族人甚至可以免费搭乘其船舶过番,在其公司谋生。这种移民链形成同乡同族聚居同一地区的现象,成为移民的一大特色。如泰国、柬埔寨以潮州人居多,菲律宾以晋江人居多,北美则几乎是来自广府(珠江三角洲)的移民,檀香山以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占多数,温州人多移居法国等西欧国家,毛里求斯3万华人中,广东梅县的客家人就占了2.7万。华侨华人移民链和同乡同族聚居,形成了早期海外华侨的地域性网络。其成员多局限于地域性的华侨方言群体,其作用范围多局限于某些殖民地区域(如英属马来

亚、英属缅甸、荷属印尼、法属印支等)。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期的“叻(新加坡)-港-暹(泰国)-汕”贸易体系,就是潮汕华侨商业网络的具体表现。

亲友相帮共谋生计,同时使得华侨人口的行业分布也带有很强的同乡同族色彩。19世纪以丝、棉对流为主的中缅贸易,一直由旅居缅甸的云南商人所控制,形成了有机的商业网络。②19世纪旧金山的华侨进出口行业全部被广东三邑侨商所垄断,而美国各地的洗衣馆则操纵在广东台山县人手里。③东南亚各国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越南的米业加工、运输与贸易,基本上由潮州人所控制。本世纪前期,新加坡华侨陈嘉庚成为举世闻名的橡胶大王,他的堂侄陈六使、女婿李光前都曾在其企业任职,后来分别自立,继续称雄橡胶业,历久不衰。同乡同族同行业的格局,实际上就是行业性的华商网络。

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组织、同乡会馆、同业行会等民间社团与组织随华侨移殖异邦,并以其灵活性、伸缩性和宽泛性得到强化。因为旅居异国,寄人篱下,生活动荡不安,作为移民,华侨无时不感受到来自所在国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排斥与压力,甚至不时面临反华排华的恶浪,他们唯有凝聚成团,组社结会,互助谋生,维护自身利益。以地缘纽带维系的同乡会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同姓或数姓联宗的宗亲会,以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与商会,以及各种宗教组织甚至秘密社会,普遍存在于每一处华侨聚居区。这些社团的活动能量与社会作用,远远超过它们

在祖国的同类社团,成为华侨华人内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社会组织,华侨的生老病死都与侨团息息相关。这些社团,构成华侨商业网络的中枢。不过它们是分散无序的,具有浓厚的帮派性特征,各族姓的宗亲会之间,各方言群的同乡会之间,相互排斥,甚至争斗不止。东南亚各地,以闽南帮、潮州帮、客家帮、广府帮、海南帮为代表的帮派,在北美,广府各邑之间、各秘密组织之间的派系,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华侨社会,可谓盘根错节,20世纪初期,以帮派性为主要特征的华人社团在经济联系之中出现了整合迹象,各地中华总商会的建立,表明了华商网络由分散无序向联合有序的发展趋势。

华侨华人基于地缘纽带与血缘纽带的人口分布与行业分布特征,使他们在异国他乡艰苦与共的谋生过程中形成了同乡同族之间密切的关系网络。华商以宗乡会馆为纽带建立起商业信用关系,并以此为依托在异国他乡能较为便利地获取资金、劳动力和市场,相互提携,共同发展。具有自助自保自治性质的华侨华人社团,充分发挥了处理和协调华人之间人际关系的社会作用,成为华商网络的实体表现形态。在网络内部,同乡好友,合作伙伴,不时聚会,同乡会馆,定期或不定期商讨会务,共谋发展。一位圈内头面人物的推荐,可以胜过多少资本,胜过契约合同。对于网络之外的商人与企业,欺诈行为甚至恶性竞争则不乏其例。早期华商网络的帮派性,使其生意关系圈又受到血缘、地缘纽带的制约,成为华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华商网络的发展

20世纪后半期,华商网络得到很大发展,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

五六十年代以来,尽管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与角色已发生了重大改变(由落叶归根的中国侨民转变落地生根的所在国华族),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已大不相同,但传统的华商网络仍然延续,并突破地域性、帮派性、行业性而得到发展。各国华人社团进一步走向整合,至90年代初大体完成。在

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与中华大会堂两大全国性团体构成华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主干;在泰国,则以中华总商会和潮州会馆为首的九属会馆为中枢;在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与菲华各宗亲联合总会成为华人社会领导力量;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宗乡总会为华社两大最高代表机构。华人社团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联合,加强了华商网络机制。华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也不深化和扩大。东南亚各国的华商财团往往与港台财团联手,建立以香港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互相参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如郭鹤年在香港开办的酒店、房地产和传媒业,合作伙伴有林绍良、陈弼臣、香港李嘉诚、邵氏家族及中资机构。有的华人通过联姻形成关系网。菲华商巨头杨应琳,其岳父薛敏老是著名律师,与木材大王李清泉合办中兴银行,李清泉之孙彼得现任中兴银行总经理,与杨应琳长女婚配。中兴银行与杨应琳的黎刹银行互相参股、互派董事。泰国的李兴添协成昌集团、陈裕德协联集团,通过姻亲组成混合型企业集团。

七八十年代以来,华商国际化经营加强,东南亚各国华商企业大举展开跨国经营,欧美等地华人数量日增,经济力量开始壮大,中国本土的改革开放也吸引着华商资本前来寻求合作。地域性、行业性的华商网络随之走向国际化,这是华商网络进一步发展的最突出成果。华人社团走向国际联合,形成世界性的同乡、同宗联谊会,名类繁多。世界华商联谊活动则在90年代日趋活跃,由各地中华总商会组织的世界华商大会,一开始就声势不凡,来自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华商精英汇聚一堂,商讨加强世界华商的联系,以华商群体的姿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前三届分别在亚洲的新加坡、香港、曼谷举行,第四届则于1997年8月在北美的温哥华召开,与会的华商人数一届比一届多,第三、第四届达到一千数百人。1995年12月,首届太平洋华商经贸合作会议又在澳门和香港召开。通过这些国际联谊活动,畅述乡谊亲情,交流信息,寻求商务合作,华商网络走向国际化。正如李光耀在第

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题为“建立有效的网络”的报告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不利用华族网络掌握新世界与新时代所提供的种种机会,那将是很不明智的。

有人把世界华商网络形象地比喻为“互联网式电脑网络”,其成员可以无限制增加,不影响成员的独立与自由,网络中没有统一的控制中枢,从任何一点开始联结都可以进入,既便于协作,又强调独立奋斗。④把华商网络称为企业界的互联网,形象而贴切地反映了华商网络的特征。事实上,可操作的华商互联网已经被开发出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1995年12月正式推出了以中文繁体简体和英文为媒介的“国际华商电脑网络”,通过国际网络把成千上万的华商资料,有系统地传达给数以万计的用户,可以在瞬息之间使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联系起来。该网络在1996年就与世界各地16个商业团体签署了合作协议,至1997年初,用户使用次数达300万次。⑤这是华商网络化经营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的进展,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华商之间的联系将更加有效、便捷和扩大。不过它仍只是华商网络的一种表现形式。

90年代华商网络发展的最新迹象是“关联企业群”的出现,这是华商网络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企业群体组合,它也是世界企业经营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势,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学的一场革命,最近备受各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关联企业群是以血缘、姻亲、同乡等关系构成,它不同于高度统合、封闭的企业集团,而是一种松散结合的企业网络,或是一种非正式的联络会,有的不过是核心经营者每月举行一次例会。企业家们利用人际关系网,交流资讯,筹集资金,扩展业务。这种网络具有开放性,可以不断将合作伙伴的范围扩大。⑥台湾施振荣的宏碁电脑集团,是由遍布亚太各地的独立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各企业自主发展,又环环相扣,总公司掌握宏碁的品牌和最好技术的控制权,各自企业的灵活性与集团的整体性、优势都得到充分发挥,其发展势头迅猛,确立了“以21个子分公司上市迎接21世纪的到

来”的目标。西方人士认为,美国的经理为企业繁复的结构所累,施振荣创造的这种形式可能就是解决西方公司问题的答案。⑦美国人将这种网络形象地称为“竹网”、“竹子网络”,竹网中的企业和典型的美国企业根本不同,它们可以是家族所有,可能包括100来个中等规模的家族经营的公司,每一个公司都在其他企业中拥有股份。⑧有的华商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家族企业形成生意圈,如原籍老挝的潮州华人陈氏兄弟,家族企业广布四大洲,它们并非一个统一的企业集团,却形成典型的国际家族商业网。在法国,陈克威、克光的巴黎陈氏百货公司,已跻身法国最大批发业商号之列,在泰国有陈克齐的“世界进出口有限公司”,香港有陈克群的“昆仲和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悉尼有陈氏兄弟贸易公司,在美国洛杉矶有“联亚食品有限公司”,它们都以经营带有中国和东南亚特色的食品和生活用品为主,互为犄角,互相支持。新加坡高效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政府关联企业”的独特模式。

三、华商网络的基础

维系华商网络存在与运作的纽带是人际信用。信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法的信用通过法律强制得以实现,物的信用通过物品的抵押来实现,人的信用则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信誉即道德强制来维系。履信守义是华商的一个优良传统,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华商都把它视为生命线。马来西亚著名华商郭鹤年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荣誉,言而有信,这一切深深印在我心里。”泰国银行家郑午楼一生都恪守父亲郑子彬的教诲:“做生意人,第一要勤俭,第二要忠诚,第三要讲信用。”李嘉诚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其创业成功的关键时说,信誉,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无怪乎有人感慨地说:“李嘉诚的发达靠的是‘诚’,李嘉诚最大的资产也是‘诚’。”印尼巴利多——太平洋集团的创办人彭云鹏说,信誉是做生意的灵魂。华人商业界流行一句谚语:“信用一失,买卖无门”。如果言而无信,见

利忘义,在华商网络中最终将会没有立足之地。

西方商人,法制观念极强,他们在进行商务谈判时常带律师、会计师同席参加,达成交易更应有严格的法律手续。华商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不喜欢事事公开化,不习惯在冷冰冰的法律之下进行交易,在自己的关系圈内,一桩生意无须繁复地请公证、签合同。李嘉诚喜欢在谈笑握手的亲切气氛中完成巨额交易,他的助手马世民说:“在我们进行交易时,我们不喜欢律师群集,没有律师在场的交易会有更多的乐趣。”^⑨华商所处东南亚各地,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市场规范尚未发育,而华商在这种环境下已习以为常,他们在资金运用、企业管理、风险回避等方面已自成一套手段,行之有效。遇到商业纠纷,除非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对簿公堂的,因为那样不仅会耗时费力,而且将使商业秘密、交易运作统统公之于众。他们常常“私了”,由华人社团与侨领出面斡旋仲裁,息事宁人,以免在关系圈有失面子。

强调人情而轻于合同,注重情感而疏于法制,人际信用能够取代法律强制的作用。菲律宾华裔学者吴文焕对此感触颇深。华商之间,只要两厢情愿的生意,在相互信任或信用的基础上,一个电话即可成交,甚至可不用订单,有时连一个纸条都不用。例如套汇,几乎全部是以电话,在一点书面凭据都没有的情况下作业的,所凭的完全是相互间的信任及其信用。在西方的营业中,这是很难想象的。但相比之下,华商的营业效率高得多。信用好,可以多做生意,小本做大生意,甚至无本也可以做生意。不但增加了华商的利润额,也加速了其资金积累。^⑩一种传统的融资手段典型地反映了关系网络之下的人际信用。这种融资手段被称为“合局”、“会”、“搭会”等,新加坡称“票会”,温州人称为“祝会”,世界各地的印支华人则称“月兰会”。由特定社会关系圈内的十数人或数十人约定,各出小股钱财,聚集成一笔资金,定期投标,出息最高者获得这笔款额去做生意。以后依次轮流投标,可以逐个发展。华侨华人互助协作的“会”,在中小型华

商尤其是小本经营者之中普遍存在。其形式多样,或由侨领组织,也可由急需本钱者自己随时发起,主要在各种关系圈内进行。有的只是临时纠合而成,有的则是长期的结合。欧洲有一位温州商人叙述道,他创办企业之初,是由34个同乡商人每人出资5000元,凑成17万,再加上他自己的12万,不用向银行贷款便顺利办起了自己的企业。^⑪当然任何融资手段都不可能排除风险,这种基于人际信用的关系圈内融资途径也不例外。^⑫

人际信用成为华人商业信用的重要基础和依据,诚信实际上成为一种资产、一种保障,道德约束成为法律强制之外的又一重要商业机制。在基于诚信的网络中,人际信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香港东亚银行总裁李国宝说:“如果我违反了商务上的诺言,与华人商业网络有关的人都会知道,那么,我的商业生命也就由此葬送了。”^⑬正因为商业网络是华商赖以合作经营、共同发展的天地,人际信用也就愈显重要。没有关系网络,或者只有狭隘的疏松的网络,人际信用难以稳定和持久;如果缺乏基于诚信的人际信用,这种网络也将难以维系。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香港新天公司总经理郑天宝一语中鹄:“信用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和商务往来的基本道德原则,信誉是构成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基础。”

人际信用它只能运作于华商关系网之内,而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其局限性远不止此,由此也引发华商网络的种种局限。事实上,包括网络化经营在内的华商经营管理方式,都面临着自我改造的挑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何因应急剧的现代变革而寻求自我发展的创新之路,将决定着海外华商在21世纪的命运。

①参见龙登高:《海外华商经营模式的社会学分析》,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②龙登高:《西南丝路华侨经济的历史分析》,载《世界华侨华人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美)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

营造 国企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

□李郁芬

一、政企不分——国企缺乏企业家的制度症结

众所周知,企业家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瓶颈”。考察国企企业家成长的环境,不难发现,政企不分是企业家人才难以顺利成长的制度症结所在。从企业家成长的角度来看,现行国企体制中至少存在以下三种类型的政企不分:

(一)企业制度的政企不分。

正如不少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政企不分是国有企业的必然逻辑。这是因为,“国家所有必然派生出政府代理。集所有权、行政权、调控权于一身的政府代理必定会向企业输入社会偏好的约束原则,而不会仅以盈利目标监控国有资产”。^①然而,同样是政企关系,中国的国企所面临的问题却

比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要复杂得多。其原因在于:第一,西方国家的政企关系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经长期探索形成的,较为成熟、稳定;而我国现有的政企关系则是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而来的,尚在摸索之中。在新旧体制转换、新的政企关系尚未确立的今天,旧的体制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政企双方往往会不自觉地按旧的行为方式行事。从政府方面看,最为典型的是企图用行政手段搞市场经济,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决策。如在企业兼并中违背企业意愿和利益搞“拉郎配”;在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过程中搞额度分配、搞平衡等。从企业方面看,“软预算约束”、企业依赖于政府的情况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第二,西方国家国企的政企关系是建立在完

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26、29、32 页。

④ (美)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 1996 年中译本,第 13 页。

⑤ 新加坡《华商》杂志,1997 年第 1 期。

⑥ 台湾学者称之为“关系企业”,见曾庆辉:《华商企业的中国式经权管理》,载《世界华侨华人经济研究》。

⑦ 美国《今日美国报》1997 年 7 月 31 日。

⑧ 美国《纽约时报》1997 年 5 月 12 日。

⑨ 夏萍:《李嘉诚传》,作家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9 页。

⑩ (菲律宾)吴文焕:《中国传统文化与华人经济》,载《世界华侨华人经济研究》。

⑪ 中央电视台二频道“经济半小时”节目,1997 年 8 月 15 日凌晨 1 点播出。

⑫ 1984 年日本横滨中华街便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连锁“倒会”风波,据《读卖新闻》报道,一个大“会”的会首,将 700 万元会款融资给一家餐馆,不料餐馆倒闭,钱不能回收,会员纷纷倒会,牵连到其他会,受害人达 400 余人,总金额约达 3 亿日元。卷入这场风波的人数与金额如此之多,足见这种融资手段在华人社会的普遍性。

⑬ 《Forbs 资本家》1994 年 7 月 18 日。

作者龙登高,博士,汕头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S15063)

责任编辑:谭湛明

善的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政府依法对国企进行监管。如在美国,每建立一个政府企业,就得由国会通过一个专门法律,有关部门依法对国有企业实行监管。而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还在建设中,很不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也还存在着有法不依等问题。

总之,虽历经十多年的改革,政企关系仍是国企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国有企业对上级行政部门的附属地位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在这样复杂的企业体制下,企业经理人员的身份双重化了:他既是上级行政机关的代理人,又是利益日益独立化的企业的经营者。角色冲突使国企的厂长们不仅要面向市场,更要听命于上级机关。他所作出的经营决策首先必须符合或至少不损害上级主管的利益才能得以实施。常有这样的事:一项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创新或者因上级行政的干预而无法实施;或者需要企业在政府方面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才能得到实施。

政企不分的企业体制使企业厂长经理们受到多方制约,无法自主自如地面对市场进行创新,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二)企业经营者选聘制度的政企不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选聘是通过企业家市场的竞争实现的。董事会选聘企业经理的主要依据是其经营业绩。当企业效益不断增长、企业家经营业绩卓著时,企业的股价不断攀升,企业家的地位由此而得以不断稳固,身价也随之增长。而当企业经理缺乏经营才能或经营失当时,股东们则将采用“用脚投票”等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而董事会的解聘则是对企业经理的最大惩罚。可见,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经理阶层受到来自资本市场、企业家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三重约束。其中,资本市场的竞争约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国国企中,市场机制在企业家选聘上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企业经营者选聘上的政企不分突出表现是:对企业厂长的选拔沿用了政府官员的选拔制度。上级机关对企业经营者的选聘是一种非市场行为。具体而言,包含了如下两方面:其一,国企经

理的来源非市场化。由于把企业经理等同于国家干部并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其任免选拔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在行政干部队伍中或至少是在国企职工中进行的,这就造成国企经理队伍的“进入壁垒”,社会上再有经营才能的人也难以成为国企的厂长经理。其二,企业经理的评判标准非市场倾向。也就是说,上级主管对企业经理的评价标准常常不是市场标准,或至少首先不是市场标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1、廉价投票权问题。说到底,上级主管部门也非国企的出资人,企业盈亏与其并无切身利益关系。此外,种种不正之风的侵蚀,也使得政府在选择经营者时有可能将经济标准放在第二位,而将“是否听话”等标准置于其上,甚至可能根据主管领导的好恶决定企业厂长的升迁与否。2、上级主管部门的利益结构。不必讳言,上级主管部门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结构。在政企不分的体制下,主管部门常通过国企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如让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参与“再就业工程”、安排军队复转人员等社会安定工作等。而要较易做到如上各点,就应找到较好指挥的人当厂长经理。

可见,在政企不分的企业经营者选聘制度下,一些真正有创新才能,按市场规律经营的人上不去;而不少缺乏创新才能、所在企业连年亏损的厂长经理“易地做官”,甚而不能提拔的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游戏规则的非市场化,必然造就一大批眼光向上,在旧体制中如鱼得水,面向市场却手足无措的官员式经理。

(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政企不分。

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创新。如何才能使企业家保持长盛不衰的创新活力和冲动呢?这就要合理设计激励制度。现代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的激励机制逐步向分享制方向演变,即让企业家握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与企业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据有关学者研究,美国目前较先进的激励机制由三部分组成:基本工资与基本福利;效益奖金;与长期盈利能力挂钩的奖励,如经营者持股、购股权计划。其中,购股权

计划由于能激发经营者和员工的最大积极性,其普遍采用已成为美国近几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关键软件。

在我国国企体制下,厂长经理们面对的是政企不分的激励制度:以行政激励为主、经济激励、精神激励为辅。所谓行政激励主要是指行政职务升迁。如某位经理厂长经营得法,企业经济效益上去了,或者在其他方面得到了上级主管的赏识,他就有可能被提拔至上一级行政机关,从而步入仕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企而优则仕”现象。经济利益刺激在国企企业家激励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起不到多少刺激经营者从事创新的作用。不仅如此,企业经理因工资高而被上级主管单位解职的事还时有发生。如被国家医药管理局评定为中国医药50强中第33位的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锐意改革、业绩显著,但却因工资过高(月薪3800元)而被其上级主管单位免职。在以上这样的激励制度下,企业经理一方面承担着巨大的创新风险,另一方面却不能充分享受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问题的另一面是,行政职务的升迁、手中权力的增大,将给经理阶层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精神享受,其中包括各种权力创租所带来灰色收入等。所谓:“有了权就有名、更有利”。可见,“行政权力崇拜”是国企经营者激励制度的核心。

这样的激励制度,必然造成如下结果:一方面,绝大多数国企管理者必然把仕途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将自己看成是国企的“匆匆过客”。他们没有必要去从事风险巨大、收益却无法分享的创新活动,创新才能被极大压抑。这也就是国企内部无法形成职业经理阶层的根本制度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帐面收入低下,企业家个人利益长期被忽视,客观上也促使企业经理阶层对灰色收入的追求,从而使公款消费、甚至受贿等现象屡禁不绝。

二、政企合理分开,为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如前所述,政企不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贯穿于国企的方方面面,制约着企业家人才

的顺利成长。从国企的现实情况出发,怎样才能为企业家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不能不说是国企改革中所面临的一个大难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企业的不同类型,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企业体制的政企分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国有经济规模巨大,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因此,根据企业的所在行业、生产产品的不同性质,可将国企业划分为不同类型,分类处理各自的政企关系。第一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其主要功能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承担社会功能是天经地义的。这类企业是国家独资企业,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政府以企业设立、运行等方面依法进行监管,企业经营者的自主权也较小。西方发达国家国有经济中的很大部分是这类企业,如英国的公共公司等。第二类是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中实行民营化的企业。随着国有经济的退出,这些民营化企业将完全面向市场独立经营、自主运行,原来意义上的政企关系也就不存在了。第三类是介于以上两类企业之间的企业。这些企业无论是处于垄断性行业还是竞争性行业,都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相应的契约关系界定政企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政府不应干预企业的微观决策。

总之,根据企业的不同性质,正确规范政企关系,将进一步明确国企经营者的地位,从而使之在一定的契约关系中按照相应的规则行事。这无疑是企业家顺利成长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二,从企业家来源和评判标准上实现政企分离。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国企企业家的选聘必然与政府的行政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英国就明文规定,政府主管部门的大臣有权任免公共公司的董事会和董事会成员。尽管非公共公司的国有企业与之在程度上有所差别,但国家作为所有者必然对国企经营者的选择保留有相应的权力。在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下,可行的改革方案应包含以下内容:

其一,取消企业经营者的行政级别和待遇,明确企业管理者的非官员身份。这一点

不少地方已在试行。

其二,取消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系统进入壁垒,向全社会招聘,使得国企厂长的来源市场化。来源市场化必然导致企业家评判标准的市场化。

以上做法并不否定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企业家选聘的权利,而是将政府的任免建立在统一的企业家市场之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企业家人才的优胜劣汰作用,依据市场评价选择相应的人选。

第三,从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方面实现政企分开。在取消了企业经营者的行政级别和待遇之后,企业厂长们原有的行政激励机制——由企而官的升迁之路行不通了。那么,如何重塑国企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在此,碰到的难题首先是:国企企业经营者能否握有剩余索取权?如前所述,企业家掌握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由于所有权可以用剩余索取权来定义,承认剩余索取权就意味着国企经营者将随企业的发展而逐步掌握企业的一部分所有权。这是否有侵蚀公有制及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这个问题不解决,重塑国企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就是一句空话。

所谓剩余索取权,是指扣除了各项成本费用后的剩余,即企业利润的拥有权。企业利润从何而来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即利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创新作为一种高级复杂劳动构成活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它与工人的劳动一起,共同创造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享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是合乎逻辑的。从此意义上说,企业家握有的剩余索取权是其人力资本在经济上的实现,并不构成对以物化劳动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的侵蚀。此其一。

其二,资本和劳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代,而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则是不可替代

的。这早已为理论分析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史所证明。同一个企业,同样的机器、厂房、工人,在前任厂长手中可能濒于破产,换了一位厂长则可能起死回生,并获得大发展。青岛海尔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海尔集团的发展史中,除了工人们的贡献外,谁又能否认以张瑞敏为首的企业家群体对企业资产增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巨大贡献呢?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企业家独具慧眼,对市场、对管理、对企业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企业资产不仅不可能增殖,而且还将不断流失。

简言之,企业家享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实现。这种实现将极大激励企业家进行创新的积极性,这不仅不是对企业公有产权的侵蚀,而且将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因此,必须在制度上明确国企企业家握有一定剩余索取权的合法性,将企业家实际掌握的剩余索取权合法化。生产公共产品的“公共公司”是国企中的一个特例:其生产的是公共产品;生产决策主要是一政治过程;公共产品定价不由市场进行;企业经营目标是平衡历年盈亏。这类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较小、市场风险也小。企业经理的报酬宜以年薪制为主,并将年薪及奖金与经营业绩挂起钩来。

承认国企经营者拥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还仅仅是个开始,仍有许多问题未解决。如,在非上市公司、非有限责任公司中如何具体实现这一权利?如何在法律上、制度上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等等,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

①杨瑞龙《论国有经济中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管理世界》1997年第1期。

作者李郁芬,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510632)

责任编辑:谭湛明

技术资本与发明家型企业家

□丁栋虹

一、市场制度的创设与技术资本的形成

技术发明作为现代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广泛接受的观点。可是,在技术发明如何形成一种能够导致工业革命的生产力规模等问题上,大多数的学者却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从事技术发明的交易费用的降低是技术发明的供给能够成长成为一种导致工业革命的生产力规模,也即技术资本形成的基本原因。市场制度的创设,为土地资本与劳动力资本的使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又实现了技术发明从新的生产要素向异质资本的转换,形成技术资本。技术资本的形成,造就了大批发明家型企业家,发明家型企业家发明职能的实现是工业革命的源泉。

技术资本起源于市场机制,后者以一整套(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和制度的形式出现,这些权利和制度给技术发明者带来以往或在欧洲以外从未有过的、更高的收益和更低的费用,结果,技术发明成了一项实实在在的资本,拥有技术发明能力的人就拥有了这种特定的异质资本(丁栋虹、刘志彪1998);市场机制的发展并使技术资本替代土地资本而成为异质资本的主要形式。

技术资本的产生导致了大规模的技术发明。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像产业革命开始时(工业革命阶段)那样被吸引来进行对其祖先来说代价过高的冒险活动。在这种视角下,瓦特的发明不是偶然。这些发明在生产领域得到非常广泛的使用,继它之后又出现一系列类似的发明,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市场化之后,技术发明已从一种新的生产要

素转变成为一种新的异质资本;发明者从事发明创造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在实践具备可行性。

技术发明的浪潮首先是在那些已经具有完全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部门掀起,而像棉纺织业那种部门要迟得多,后者的发明浪潮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上,并在新机器的影响下才出现。技术发明的兴起,开始是节约资源型,逐渐向节约劳动型方向发展。

二、发明家型企业家的兴起

工业革命时期唱主角的企业家是资本型企业家(资本所有者),还是发明型企业家呢?这可是个重大问题(在理论与历史两个方面都是如此)。从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中资本贡献的重视,无论怎么表述也不过分。马克思穷其毕生精力研究资本的实质,不外乎把资本家当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原点。在经济学家演绎出的经济发展三大古典因素里,除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传统的因素外,唯一一个现代的因素就是资本。可是,通观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长河,在工业革命中唱主角的难道真是这种资本型企业家吗?

可以换个角度提问题。如果在工业革命中唱主角的真是这种资本型企业家,那么我国建国以后,通过原始资本积累(其中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业积累了一大笔资本,可是为什么却没有实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到1986年,国有工业资产为8000个亿,可这8000个亿依然全是原始积累,没有增殖。在目前,虽然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对一批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

这些国有企业依然饥不饱食,难以起死回生、走上自我发展的路子。这种情况下,资本的角色如何理解?

在作者的分析结果看来,在工业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资本因素,而是发明因素;发明型企业家的兴起主宰了工业革命的产生。所以,早期的企业家实际上并不是资本大王,而常常是发明大王,这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在工业化早期进程中,最初的资本供给并不是关键性的瓶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资本集中是技术发明的结果,而不是技术发明的原因。早期的技术发明家曾经处在非常贫困的境地,只是由于专利法的产生与施行,才从自己的专利应用中获得了较大的利益。

第二,农业企业家成了发明家革命时期工业企业家的主要来源。工业化早期工业企业家的传记表明,他们中的极大部分出身寒微,而且常常来自庄户人家。如果说企业家革命中极大多数企业家来自农业的背景,那就意味着老资本家阶级在供应资本上只起较小的作用。

第三,16世纪和17世纪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不大,这可以用金融资本积累的地理区域和发明家革命地区作一简单比较来说明这两种类型地区有明显的差异。从国家一级来说,一方面有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另一方面有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两组国家中,工业革命首先取得立足点的国家实际是商业资本积累相对不重要的国家。(奇波拉 1989:396)

发明型企业家的发明职能,使发明型企业企业家与科学家区别开来。第一批发明家决不是科学家,“他们是工匠,由于处在实际问题面前,他们就运用他们的天然智慧以及他们的工业习惯上的工业需要的高深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海斯、克朗普顿、哈格夫斯、达德利、达比、科特等人就是这样。有时,也有些探索者,这些人并未受过科学教育或职业教育,而是凭本能或因好奇心而进行探索的;怀亚特、卡特赖特就是这类的例子。”(芒图 1983:386)作为一个科学家,

不需要具备生产知识与技能;但作为一个发明家型企业企业家,却一定需要具备专业生产知识与技能,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这些发明家型企业企业家不是技术专家,更不是学者,而是即席演奏者。他们不是把创造精神用在革新生产技术上,而是用在对生产技术的应用上。

三、发明型企业企业家的权能结构

发明型企业企业家如何应用技术发明呢?这是通过他所主导下的企业的一定的权能结构来完成的,最大特点是:分工协作。

一方面,分工明确。对于工业化生产组织而言,一个兼数项任务的工作岗位,要有明确的职责界限,这就是分工。设计这样的岗位有许多好处,无论在组织内部或外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掌握这种技能,例如制造汽车,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岗位培训,借助于组织规章,工人和雇员就能通过合作而生产出高质量的汽车。当各个岗位确定下来,而且这些岗位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力市场所具备的条件相一致时,就可以对工作人员进行选择。例如,一般说来,所有具备某种资格的电工都适合于在电气部门工作。这就使人员的补充变得更为容易了,并且这些新招进的人员,只需稍加培训,就能胜任工作。

在一定范围内,进一步分工及专业化可以提高组织的效率,这是亚当·斯密的古典命题。每个工作人员都只完成一项很具体并且不需多少技术的任务。他们经在岗位上培训后,将使技能在一个短时间内达到较高的水平。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过于细致的分工可能会使工人减少兴趣,增加厌烦感,导致旷工、频繁的人员流动及高废品率。可见,分工也要求高度的协作。

另一方面,充分协作。工业化生产要实现充分协作,有如下几种方式:

其一,通过操作程序标准化实现协作。这是一个加强协作的很有效的措施,可以减少互相交流的需要。在标准化情况下,一个人只要照章办事,并不需要了解这些章程所依据的理论原理,而仍然可以高水平地使问题得到解决。例如,一个仓库的职工可以成

功地应用再订购规章,把复杂的再订购公式具体化,但并不需要理解这个公式本身。在操作程序标准化的基础上,可以做到使决策权分散并同时保持上层的控制力。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环境的改变要求对这些规章作出相应修改时,原来的程序还会照旧发生效力。例如,当环境对组织提出新问题时,由于通常的程序已不能有效地予以解决,所以,那些既定的标准操作程序就可能受到批评。但坚持规章又是阻止这类批评的有效手段,结果,标准的操作程序正当需要修改时,却往往被保留下来并被更严格地执行,克罗泽(1964年)称这种效应为官僚主义的逆反。

其二,划分等级的协作。假定一个工业组织的生产线上出了问题——机器出了故障,废品数上升或延迟了交货。起初,工头会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无法解决,他就会找他的上级。这个等级基础上的协作反馈程序使组织能在适当的级别上解决问题。在那个级别层次上,可以考虑到所有相互依靠的组织单位,特大的问题可直接上交组织的首脑处理。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可形成一些新的政策,并把它们应用于整个组织。当然,各个级别层次上的决策者决不是被动地等待问题的出现,他们也未来制定目标并作出规划。在等级制度上,既有反馈,也有前向协调。等级制度是一个很灵活的协作方式。但实行这种方式也需要很高的代价:对管理人员要支付较高的报酬;在同一等级上,要有一些人主要帮助提供信息以利于决策的制定,这样,等级制度就会扩大。等级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式是矩阵体系。这是通过复合指令系统的相互作用来达到协作目的的。例如,在一个具体规划实施过程中,有一个指令体系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同时又有另外一个具有协调功能的计划贯穿其中。

其三,会诊式的协作。这是补充等级制度的另外一种机制。为完成特定的任务,可从不同等级职位上集合起一些专家,交换信息或共同作出决策。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这种结成小组的会诊也是一种有效的协作方式。

发明家型企业家的分工协作型权能构造实现了技术发明者与企业家的主体统一,从而使发明家型企业家作为一种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能,也就是使发明型企业家具有了全力“从事技术发明”的发明职能。与业主型企业家扮演“演员”角色不同,发明职能的行使使得发明家型企业家在经济的大舞台上扮演着“乐器制造师”的角色。正是这种全力“从事技术发明”的发明职能的行使,导致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

在工业革命中,形成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新知识的弹性供给曲线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为本质特点的工业化生产;持续的技术变化成为常态,新能源已用于代替人工,新材料和新物质不断被创造出来并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同时,静态的传统社会已经演变为动态的现代社会;君主政治演变为立宪政治;科学产生了,宗教的统治逐渐让位于科学的统治;乡村社会也逐步过渡到城市化社会。西方社会由此变成一个都市社会,其中所有的事物都与专业化的提高、劳动分工、相互依存和不可避免的外部性相关联。这样,工业革命事实上标志着从静态的农业与商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缓慢的转换(Transformation),从整个的历史时期,它不是一场革命(Revolution),而是一场进化(Evolution)。

作者丁栋虹,南京大学城市学系经济学博士、副教授(210093)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与合理配置

□刘田喜

一、企业家是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第一稀缺资源

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迫切需要建立一支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但从目前我国企业经营者队伍发展的情况看,企业家队伍成长与改革、建设的需要极不相适应,企业家资源日益成为制约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稀缺资源。

(一)从企业家固有的素质规定性看企业家资源的有限性。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素质超群、绩效卓著、敢于承担风险、勇于开拓创新的企业管理专家。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特角色赋予自身以特殊的素质规定性。美国专家认为,企业家有六条必备素质,那就是:健康的身体,超越常人的概括和综合能力;广博的知识并精通本行专业;有很强的自信心,有敢冒风险勇气;公平的人际关系策略,与人和谐相处,依赖下属并善于听取意见;保持安稳、平静的情绪。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家素质结构的不同观点,我认为,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应具备如下五类素质:一是健康成熟的身心素质,二是良好高尚的品格素质,三是广博完善的知识素质,四是积累丰富的经验素质,五是卓越超群的能力素质。企业家的高素质要求首先决定他们不是一群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是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中的“稀有金属”。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绝大多数人无缘受到中高等教育,从而失去自我发展的基础条件,加之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使企业经营者缺乏市场经济的体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更是孤陋寡闻。这些,更造成企业经营者的素质难以达到企业家的素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的迫切需要面前,不可避免地出现企业家资源极其有限的状况。

(二)从经济资源供求的格局看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维持并不断扩大其再生产,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企业生产的扩大,无论是外延的扩大还是内涵的扩大,都将受到企业可以获得的经济资源供给的制约,这些资源包括土地、资本、技术、人力等。作为经济资源,它们都具有绝对的有限性和相对的稀缺性,但相比之下,各种经济资源的供求矛盾又有轻重缓急之分。从目前经济资源供求格局来看,人力资源中的企业家资源供求矛盾尤为突出,成为众多经济资源中的第一稀缺资源,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力资源属于再生周期较长的一种资源,企业家作为特殊的人力资源,有着比一般劳动力更艰难、更长期的孕育、发掘、锻炼成才的过程。它的短缺,一时无法找来其他劳动者作为“替代品”,其他经济资源的丰富供给也同样不具备对企业家资源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是一种能动的资源,是生产要素中的“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企业家更是人力资源中的统率力量。企业家的职能正是组织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实施生产经营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资源是企业全部经济资源抑或生产要素中的灵魂,起到组织、指挥、统率的支配作用。同时,企业家可以通过其非凡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不断捕捉和发现变幻莫测的市场机会,弥补其他经济资源的不足。企业家资源的稀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高过其他经济资源一时短缺对企业的影响。

(三)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看企业家资源的重要性。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中,中央提出将全面建立以公司制为重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十六字方针。从近几年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来看,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成败,企业家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首先,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要依靠企业家去实践。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从西方企业制度由独资企业形式经历合伙企业形式,发展到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制这一历程看,正是由于企业家运用自己的才能去发现通过重新配置资源获得更多收益的机会,并通过组织去改变企业制度框架的旧规则,推动企业制度的成功变迁,最终完成企业“制度装置”的不断改进和创新的“制度革命”。目前,企业制度创新的进程顺利与否,关键之一就是企业家作为改革政策在企业中实施的具体责任者和企业职工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扮演得是否成功。其次,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要依靠企业家担当起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两权分离”割断了传统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脐带”关系,政府已经退守到投资人和宏观经济调节者的位置,不再承担企业最终经营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企业家,全面承担了在市场经济中驾驭企业的责任,而在企业家统率下的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其兴衰成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再次,解决当前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要依靠企业家的睿智和才能。市场经济确立后,国有企业被无情地抛到了市场竞争的漩涡中,管理不善、技术落后、包袱沉重、效益低下的问题立即凸现出来。现代企业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管理科学化,这给企业家提出了现实的考验。这需要企业家以其大智大勇,建立起科学有效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为企业发展提供制度保证;瞄准国内外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大胆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设备改造,为企业发展提供物质技术保证;不断学习、运用和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开拓市场、降低成本,为企业扭亏增盈提供决策保证。

二、创造良好的企业家市场交易条件,促进企业家资源的合理配置

对于企业家资源来讲,要真正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同样必须使其接受市场配置,使企业家能够按照个人意愿、依据自身的能力“级”和专业“场”,以适当的企业家人才价格,实现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在适当的企业找到位置,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边际效益,为企业赢得最佳经济效益。

(一)大力推进企业家职业化,造就独立的企业家市场的供给主体。企业家资源的市场配置,首先要求企业家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企业家要取得自己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独立人格。也就是说,企业家应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它具有职业追求的一贯性,即为谋取这一职业,职业追求者从择业开始,就一心一意投身于围绕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学习、培训和锻炼中;它具有职业目标的一元性,即企业家以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作为实现自己个人满足、个人发展和个人的社会价值实现的目标;它具有职业行为的自主性,即企业家自己不受来自行政命令的束缚,完全能独立决定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和在企业间的去留,对自己的职业行为单独负责。为此,要推进企业家职业化进程,就要改变目前存在的企业家在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两栖状态,用公务员制度和企业经理制度,规范两种职业的发展程序;要加强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逐步消除“官念”对企业家人格的奴化和羁绊;要加快政企分开,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进程,使企业家只依法对企业股东和董事会负责,而不对政府负责;要借助合同等形式,约定企业家在企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为其行为自主提供法律支持。

(二)实行企业经营管理者聘用制,造就合格的企业家人才市场需求主体。供给和需求是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矛盾统一体。企业家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互为前提,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实行企业经营管理者聘用制,加大企业家的需求拉力,对刺激企业家的供给,发挥市场对企业家人才配置作用,推动

企业家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特殊的意义。必须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突破国有企业领导者党政部门任命制,实行因企制宜、因材施教、扩大“才”源、社会招聘的形式,选拔企业的经理人才。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家聘用制度,建立双向选择、竞争上岗的用人机制,使企业家有用武之地。

(三)取消企业家人才价格限制,使其价格形成市场化。企业家人才价格(即劳动报酬)是企业家人才供求力量对比的反映,其涨落起到引导供求调节和资源配置方向的作用。目前,由于政府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劳动工资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劳动人事部门还不同程度地保留工资水平与行政级别挂钩的约束性规定,使企业家人才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其薪酬失去了人才价格显示器的作用,制约了企业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为此,必须大力推行以企业家年薪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家人才的管制,将反映企业家人才价值和供求关系的价格确定权交给市场。这样,可以促进企业家人才市场体系的完善,发挥引导供求和激励企业家的作用。

(四)加强企业家人才市场设施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企业家人才交易载体。在企业家人才的交易条件中,企业家人才市场设施,是包含软、硬部件的必要条件之一。它为企业家人才市场提供物质技术载体依托,为人才交易提供各种服务,能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要重视发展企业家人才市场的中介组织,学习借鉴西方“猎头公司”的运作经验,在现有人事部门人才交流中心实践的基础上,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市场建设;要利用电子计算技术等信息处理手段,建立企业家人才信息中枢,搜集、贮存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事及业绩档案,建立广泛的经理人才信息数据库和供求信息网络;要完善企业家人才市场服务功能,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聘用中介服务、专业咨询服务、职业培训服务和市场交易保障服务;要加强企业家人才市场宏观管理,政府部门应制定人才市场建设的总体规划,明确发展方向和指

导思想,制定市场运作程序,规范中介组织的经营行为。立法部门要配套完善市场主体法律、市场秩序法规、社会保障法规,为企业家人才市场提供系统的法律支持。

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大力保护企业家资源

我国企业家队伍成长的艰辛历程告诉我们,社会对企业家鞭策有加,保护不力,没有形成企业家健康成长所需要的良好社会环境,反过来严重制约了企业家事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家没有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由于人们对企业家的事业追求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企业家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缺乏充分的了解,对企业家经营成败的因素缺乏全面的考察,常常以苛求的眼光看待企业家的行为,嫉妒企业家的事业成功,指责企业家的经营失败。二是企业家难以取得应有的经济地位。尽管企业家也是职工集体的一分子,但他们在企业中所履行的职责和承担的风险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付出远非一般职工可比。他们的劳动是高智慧型的复杂劳动,而且常常作无定时,无论从按劳分配角度,还是从西方经济理论关于企业家才能应得到利润的观点考虑,企业家都应因其巨大的付出而取得较高的回报。但从1995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提供的情况看,企业家对其才能、责任、风险所获“回报”及其经济地位的满意程度偏低,只有3.7%的回答者认“全部获得回报”,28.8%的人回答“基本得不到回报”,而36.7%的人对自己的经济地位不满意。三是企业家个人权益缺乏法律的有效保护。在改革进程中,企业家往往处于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的焦点位置,他们常常成为各方面责难和攻击的对象。

以上情况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企业家队伍有所发展,地位有所提高,工作环境有所改善,但是与他们所承担的时代重任相比较,企业家资源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者刘田喜,湖北省鄂州市市委秘书长(4360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中国40年代新诗的散文文化倾向

□ 龙泉明

朱自清先生在1941年考察中国诗体演变历史的基础上,就较早地确认并肯定“散文化”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以对中国诗歌历史的洞悉为根据论述道:“过去每一种诗体,都依附音乐而起,然后脱离音乐而存在”,由诗而词而曲,无不依循这个规律演变过来。而新诗却是另一番情况:它从诞生之日即“不依附音乐”,完全走着“自力更生”的路,因而它的“自由性格”是天然生成,其“散文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总结了一些新诗人的试验,指出“屡次有人提倡新诗采取民歌(徒歌和乐歌)的形式”,“但效果绝不显著”,原因何在呢?即在于“那种简单的音乐已经不能配合我们现代人复杂的情思。现代是个散文的时代,即使是诗,也得调整自己,多少倾向散文化。”①他从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时代生活的根源两方面论证新诗的“散文”趋向,深刻、有力地说明了这个趋向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诗的散文化趋势,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来了,只是到了抗战以后,人们才真正注意到它的普遍性及其实质意义。除朱自清外,艾青在1939年发表的《诗的散文美》也提出:“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废名在1943年也再次强调他在抗战前的讲稿《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中的观点:“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人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同年,李广田在《论新诗的内容与形式》一文指出:“今日新诗的一种共同特色”就是“诗的散文化”。另外,郭沫若、冯至、何其芳等诗人也都较早地觉察到了新诗散文化的

必然趋势,并明确提出了“散文化”的概念,把诗歌散文化的问题提到了美学的高度。

和新诗与生俱来的“散文化”倾向,在抗战以后成为一股主要的诗歌潮流,实际上是对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在诗坛所造成的“纯诗”风气——“单纯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和空泛、朦胧、幽涩的诗风的矫正,就是要求诗人从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风气中摆脱出来,赋予诗以生机。艾青推崇“散文美”,就是因为“散文的自由性,给文学带来以表现的便利,而那种洗炼的散文,健康的或者柔美的散文之被用于诗人者,就因为它们是形象之表现的最完善的工具”,诗歌只有趋向散文美,才能获得新的生机,才能更好地表现那个时代。②

抗战时期,诗人从书斋走到民众之中,走向反法西斯战场。他们被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来的抗战热情,必然冲破诗歌格律的束缚,使诗向散文化发展。抗战初期最受欢迎的诗人艾青、田间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诗人。艾青是“散文美”的有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自不待言。我们这里只说田间、克家和卞之琳。

田间创造的鼓点诗,表现的时常是“闪电似的感情的突击”,诗的第一节往往就好象“一部剪去了全部的动作,而只留下几个‘特写’几个‘画面’接连着演映起来的电影”。③田间还利用诗句的分行形成急驰的旋律,诗行精而短,有时一个字、一个词就是一行,以诗句的连续反复出现来渲染雄壮的气势:“人民! 人民! 抓出 本厂里 墙角里 泥沟里 我们底 武器 痛击杀人狂!”“人民! 人民! 高高地

举起 我们 被火烤的 被暴风雨淋的 被鞭子抽打的 劳动者的双手 斗争吧！”如此暴风雨般的感情，闪电般的、踊跃式的、急驰的、强烈的节奏，和抗战初期慷慨激昂的时代气氛是十分合拍的。

克家抗战以后的抒情诗有意扬弃了以前过于严谨的格调，追求一种素描式的散文风格。他说：“我不幻想 头顶上落下一顶月桂冠，我只希望自己的诗句 象一阵风，吹上大众的心尖。”（《无名的小屋》）他的抒情诗几乎都是以散文式的笔调娓娓道来的，却精确而有风姿，特别是排比复沓句式的运用，造成了强烈的节奏感和旋律美。例如：
“耕破黑夜，又驰去白日，赴敌千里外，挟一天风沙，兵车向前方开，兵车向前方开。炮口在笑，壮士在高歌，风萧萧，鬃影在风里飘。”（《兵车向前方开》）这种诗，是口语化与审美化的高度统一，是一种近于“赋”的风格。

卞之琳在抗战前的诗就有着平淡中见深沉、精炼中多含蓄的特点。抗战以后，他的诗更加向着口语化发展，显得亲切如话。他那《慰劳信集》的诗歌语言就呈现出了与以前不同的新面目。其诗力求从小事情、小场景的抒写来歌颂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筑机场的工人、闹笑话的新战士、放哨的儿童、抬钢轨的群众等等。诗中洗炼的口语有平实、爽朗、机智、幽默的特点。例如《箭方的枪手》写子弹发出后，战士们看得“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酒窝深起来，孩子们笑了，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这种淡雅的口语、散文的笔法和严肃的题材结合到好处，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型的政治抒情诗。

田间鼓点式的诗，克家颇有赋性的诗和卞之琳这种口语化的诗，对抗战时期诗歌散文化、民间化倾向无疑是一个新的创造与推动。它们在形式上洒脱自由，又有强烈的节奏，证实了朱自清的论断：抗战前的“格律运动实在已经留下了不灭的影响。只看抗战以来的诗，一面虽然趋向散文化，一面却也注意‘匀称’和‘均齐’，不过并不一定使各行的字数相等罢了。”④“所以散文化民间化

同时还促进了格律的发展，这正是所谓矛盾的发展。”⑤

实际上，诗的民间化、朗诵化也是与诗的散文化相联系、相依存的。诗的民间化，实际上就是追求诗的朴素、真实、活泼、清新风格，也就是追求一种自然的现代歌唱形式，因而它必然趋向散文。而“朗诵诗的提倡更是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节目”，⑥因为诗的朗诵化，实际上就是使诗摆脱简单的、形式的音乐的羁缚，独自走自己发展的路。它不注意诗行整齐，可错落有致；不强求韵脚的一致，只要顺口便可，可长可短。又由于它诉之于听众之耳，这就要求它既要浅显易懂，又要诗意盎然；既耐人寻味，又不流于晦涩，因而它必然趋向散文化。有经验的朗诵者，都愿意选择比较散文化的诗作为自己的朗诵节目，而觉得格律化的诗缺少变化，不易得到好效果。吸引听众注意力的，打动他们内心的，也绝不在于诗行排列的整齐、韵脚的一致或对仗的精巧，而在于诗的真实、率直、准确、形象。不过，诗的民间化、朗诵化，并非就不讲究诗的韵律、声调，只不过它们并不着重外在的韵律，而是讲究自身内在的律吕，这并不比格律诗来得容易。

40年代诗歌散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散文化的诗歌摆脱了格律的束缚和单调的形式，更适合抒写新时代生活和情感，它同时代人生更接近了。诗的散文化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表现形式的自由、灵活、多样，而它正好满足了现代生活的这种需求。艾青说：“一个写诗的人，专门写着狭窄得可笑的个人的情感的东西称为那才是‘诗’，疲惫地拖住一种形式，那才是诗的唯一形式，更有甚于此者，竟会自满那种迂腐的见解，说那样的东西才是‘真正文学的诗’，这究竟是可悲的现象。”⑦40年代，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诗人们一反过去诗路狭窄的倾向，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大胆创新，从而形成了诗坛多种自由诗体竞存的格局。我们从当时的报刊、杂志和诗集中可以见到名目繁多的诗歌体式，如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象征诗，长诗、短诗，方言诗、

朗诵诗、街头诗、墙头诗、枪杆诗、名片诗、快板诗、散文诗、史诗、儿童诗、仿民歌体,等等,真可谓诗体大备于时,颇为壮观!但从总体上看,诗人们创作已无心于格律的雕琢,无暇于精美的装饰,不追求固定格式,诗的节奏完全听凭情绪的抒写而形成自然的节奏,诗节内部的行数可多可少,挥洒自如,诗节之间也如散文般自由。诗人无论采用何种体裁,而大都运用自由的形式。正如诗人力扬所说:“在这暴风雨的时代,诗歌必须是自由的形式,才能容纳了我们民族的可歌可泣的内容与万马奔腾似的情绪。所以我以为今日大众所提起的‘诗的民族形式’,主要的应该是‘自由诗’的形式,而只是比‘五四’时代更自由的更发展的形式。”^⑧实际上,抗战以来的新诗的主流正是在这形式下发展着、进步着的。胡风在30年代后期大力提倡自由诗,他是把它作为革命诗歌的主体形式提出来的,认为“这种诗体最能表现最新最先进最深挚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的欲求和感情”。^⑨他在评论抗战诗歌时指出,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的诗在“战后大半消失了”,因为它们“无法表现今天的情绪与现实生活”。“为适应悲壮慷慨激昂的情绪”,“就不能不继承和发展诗史上的革命传统,采取了自由奔放的形式”。他宣称,这是“革命的自由诗的形式”,“它对定型诗是一个有力的反抗”。^⑩自由体诗在中国诗坛上再次崛起,成为40年代诗歌形式的主流。但它已经跨越了初级阶段,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准。它是在受到“格律”诗、“象征”诗、“现代”诗否定之后,总结了自身艺术的得失,吸收了其它诗派艺术的优长,而焕发出新的生机的自由诗。

中国新诗的自由体诗发展至40年代,不但完全成熟,而且为广大读者大众所喜爱、接受。当然,自由诗并不是40年代诗歌唯一的。它和格律诗、现代诗、民间歌谣等互相辉映,互相补充,从而构成这一时代可能存在的诗歌艺术的多种趋向。

2)散文化的诗歌脱离了语言的陈腐、生涩和人工的雕琢,拉近了与读者大众的距离,推动诗歌朝着普及的方向走。新诗的

“语汇”问题,一直是新诗的大众化、民族化、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五四以来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五四时期新诗虽然以白话入诗,但造句用语受欧化影响较重。到二、三十年代,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多搬用西方现代诗歌的怪异、生涩的形式、句法等,在语言上更加欧化了。要加强诗歌的表现力和扩大诗歌在群众中的影响,必须首先解决诗歌的语言问题。于是,从大众中、从生活中获取活的语言,成为大家的共识。朱自清所谓新诗的“散文化”,一个重要的含义即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他说:新诗的语言要“顺口顺耳”,便于“上口”,而“上口”的语言还必须讲究精炼。^⑪艾青也明确表示:“我说的诗的散文美,说的就是口语美”。他认为:“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⑫这都说明,注重口语,诗就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自然、朴素、清新。事实上,40年代诗人的创作“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大都“注重明白晓畅”,他们在词语选择上尽可能地口语化、生活化,注意从大众生活中和民歌民谣中获取活生生的语言;他们不拘泥于语言的雕饰,而求散文美;不追求诗的寻常句法,而喜用散文句式。诗人们以切近生活的自由的、明快的、朴素的语言无拘无束地抒写中国人民的悲愤和喜悦,挫折和反抗,是极其自然,极其得体的。朱自清在1943年说:“近年的诗人已经不爱‘晦涩’,不迷恋文字和技巧,而要求无修饰的平淡的实在感,要求明确的直截的诗。”^⑬这正表明了诗歌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3)诗歌的散文化和诗歌的格律化是诗歌发展中并行的两大潮流,是矛盾的对立面。散文化的诗歌的出现,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美学的要求的,它在形式上同格律的诗歌划清了界限。它离旧诗越来越远,并在反叛中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使得新诗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白话诗兴起至抗战之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而“抗战以来的诗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⑭这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40年代主潮诗歌在艺术上求

得发展,一是走大众化的道路,二是提高诗的表现力。散文化的诗歌,正好把这二者统一起来了。诗歌的散文化趋势,使中国新诗的抒情传统得到进一步加强,与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取得了一致的节拍;它使中国新诗真正活跃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成为大众文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它为开创新诗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新世纪做出了贡献。

然而,40年代诗歌的散文化,有利也有弊。诗歌散文化现象是散文对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影响的结果。但散文化的诗歌的根本是诗,而不是散文,如果用散文代替诗,或把诗写成分行的散文,都偏离了诗这个中心。40年代散文化的诗歌确实存在着过分散文化的倾向。正如李广田当时指出的:

“在内容方面说,有些题材是可以写成散文的,然而作者也把它们写成诗了,在这种情形下,无论这作品是采取了诗的形式,或非诗的形式,这当然还不是诗。在形式方面说,作者无论是把作品分了行也罢,把作品分了节也罢,而这种有见必录,有感必发,以为直接抒写便尽了诗之能事的做法,纵然诗的内容是有的,甚至是好的,但并未用诗的最好形式来表现,我们终以为这终是忽略了诗的艺术。”^⑮朱自清阐明新诗的“散文化趋势”时,并非赞同把诗写成散文。如果把诗等同于散文,也就等于取消了诗,诗与散文有质的不同,二者不能混淆。他认为,诗“比散文经济些”,“却也比散文复沓多些”。“经济和复沓好象相反,其实相成。复沓是诗的节奏的主要的成分”,“复沓是为了要说得少而强烈些”。“诗随时代发展,外在的形式的复沓渐减,内在的意义的复沓渐增,于是乎讲求经济的表现——还是为了说得少而强烈些。”“就是写自由诗,诗行也得短些,紧凑些;而且不宜过分参差,跟散文相混。”^⑯朱自清深明此理,所以他批评过有些新诗写得不经济、强烈,写成了散文的现象。袁可嘉对40年代诗歌散文化的利弊也看得很清楚,

他说:“在艺术媒剂的应用上,绝对肯定日常语言、会话节奏的可用性,但绝对否定目前流行的庸俗浮浅曲解原意的‘散文化’;现代诗人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目的显在二者内著的丰富,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作为创造最大量意识活动的工具;一度以解放自居的散文化及自由诗更不是鼓励无政府状态的诗篇结构或不负责任,逃避工作的借口。”^⑰可以说,40年代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的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诗歌散文化的偏颇造成的。

①①朱自清《新诗杂话·朗诵与诗》,作家书屋1949年版。

②⑦⑫艾青《诗论·诗的散文美》,桂林三户印刷社1941年9月初版。

③茅盾《叙事诗的前途》,《文学》1937年第8卷第二期。

④⑤⑥⑭朱自清《新诗杂话·抗战与诗》,作家书屋1949年版。

⑧力扬《关于诗的民族形式》,《文学月刊》1940年第1卷第三期。

⑨《胡风评论集·后记》,《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⑩胡风《略观抗战以来的诗》,《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⑬朱自清《新诗杂话·诗的趋势》,作家书屋1949年出版。

⑮李广田《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诗的艺术》,开明书店1944年版。

⑯朱自清《新诗杂话·诗的形式》,作家书屋1949年出版。

⑰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作者龙泉明,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430072)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文

学

生

命

谏

话

□ 汤学智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之花，有自己的生命。

一、文学生命之根

一种生命之根，是指这种生命从无到有之所以会发生的那种基本的内在依据和动因。

文学的基因、源头在哪里呢？

文学是人学。人类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一切创造，都根源于人的本质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解开人类创造之谜的关键，便是对人自身秘密的揭示。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课题，它吸引了近代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病理学、文艺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它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例如：哲学主体性理论、发生认识论、人的多层次需求理论、意识结构理论、集体无意识理论、形象思维理论，等等。在这样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背景下，这里着重谈谈自己的看法。

人的本质本性，历史地看，是一个内涵丰厚、不断展开的复杂的巨系统。一般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它的发展形态。它表现为多层次、多姿态，丰富多彩，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对它作出多种界定。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的自然属性（食、色）；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的阶级属性（在阶级社会里）；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的文化属性；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的精神属性（追求自由、创造）；等等。然而，这些还不是人的本质本性的根本的、原始的状态。

人的本质本性的原生态是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物欲、情欲、智欲，可统称为‘原

始三欲”。所谓物欲，即人追求生存、温饱和物质享受的欲求；情欲，即人追求性的生理满足和爱情（情爱、亲爱、友爱）的情感满足的欲求；智欲，即人追求在知与行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和创造的欲求。这三项‘原欲’的界说，从思想资源来讲，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物质、精神——三种生产的理论），又有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食、色），也有现代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借鉴，当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笔者的新思考主要有三点。首先，‘物欲’、‘情欲’是对我国传统概念的一种积极改造。‘物欲’由‘食’而来；‘情欲’由‘色’而来。这种改造表现为内涵的深化与拓展，并不止于‘吃’、‘性’而已。‘物’，包含着衣、食、住、行；‘情’，包含着爱情、亲情、友情，这些正是动物所不具备而为人所特有的，更合乎人的本质本性。

其次，‘智欲’这个新提法，在融汇、综合外来理论中关于人的‘自由本质’论、‘自我实现’论、‘精神生产’论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了人以大脑思维潜能为基础的精神创造本质。正是这个本质，使人得以沿着文明向上的阶梯不断进化，提升。

其三，三个概念中都有一个‘欲’字。这是受马斯洛‘需求’说的启发，但与它又有不同。‘需求’偏于被动，‘欲’求则更趋能动。欲而致动，这表征着原始三欲不是静止状态，而是一种本然的动态结构。

最后，三欲之间不是等量平行的，它们以智欲为中心、为主导，又相互独立，生克互动，造成蕴含强大生命原能的动势场。它通过与外界（自然、社会、人）进行信息能量交换，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生机无限。

从人类的进化史或个体发育史来看，当

人之所以为人一经确立或落地出生,人的原始三欲已然作为一种潜在的本质力量存在于他的生命体中。人类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物质的生产与争夺,政治的建构与厮杀,精神的创造与论辩,生活的悲欢与离合,乃至深层心理的涌动与纠葛,等等,无不由此生发而来。文学作为浸润着人性原汁的精神之花,自然也不例外。

二、文学生命之树

据说,宇宙是从大爆炸开始的。爆炸生宇宙;宇宙生地球;地球生自然;自然生人类;人类生社会、生文化、生科技、生文学……

文学是人性之欲与社会、自然交媾和合的产物。在人性三欲中,与文学最密切的是情欲和智欲。有情欲,就有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有爱,有恨。有智欲,就有对种种复杂情感的品味、体验、认识、积累、升华。同时,智欲本身还会对自然、社会、人生发生形而上的叩问和猜想。情欲智欲交融互动,造成文学生成的内在玄机。这玄机,通过不断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聚合能量(情智一体的结合能),它的“外化”,便有文学的诞生。

文学生命最早的形态是口头文学。那时,人类刚刚揖别动物界,没有贫富、阶级、尊卑、文字,一切都是共享,一切都是口传。口头文学大体有两种体式:那些对天、地、人的叩问和猜想,生成美丽的神话;那些对社会人生喜怒哀乐的品味和体验,化为随口的歌谣。无论神话还是歌谣,都如天籁自鸣,浑朴自然,呈现着人类的童心童趣。这是文学无邪的童年期。

后来,贫富、阶级、尊卑出现了,文字出现了。文字被尊者们独占,成为他们特权的表征。他们依靠剥削,养尊处优,试图寻求自己更为全面的发展。但他们并不轻松,在为权力、金钱、地位、名誉等的争斗中,从另一方面体验着人生的苦辣酸甜。这种情智积累,加上有暇在语言文字和形式上刻意追求,形成以审美载道为主要特征的“雅文学”。这种文学,在反映社会人生的深度和

形式的创新上,是对民间文学的一种超越和发展,但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又不免隔了一层。雅文学的出现,使文学生命之树发生第一次大的分权,形成雅文学与民间文学共生的局面。

再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在贫富之间出现了第三等人。他们于温饱之余,也开始掌握初步的文化。但因为社会地位不同,在思想和艺术情趣上,他们与“尊者”和“卑者”都有所区别。他们所期望的,更多的是人生知识和消闲娱乐。据此,以知识、趣味、逗乐、解闷为宗旨的各种通俗文学应运而生。这样,文学生命之树完成了第二次大的分权,实现了雅、俗、民三元一体的总格局。

三元之间,就受众面来说,民间文学最广,俗文学次之,雅文学又次之。就文学价值而言,雅文学由于得益于文化精英的创造性加工和精神灌注,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更为丰富和成熟的程度,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它的优秀之作,常常成为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就依存关系而言,雅文学需要不断从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汲取生活和民众文化的滋养,民间文学特别是俗文学也需要从雅文学汲取精神、艺术滋养,同时,它们的提高和普及也为雅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三种文学,虽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别,但流贯于深入的民族精神应是一致的,唯其如此,才能共生互补,融为民族文学的统一体。

分别来看,雅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又各有自己的生命,各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其中,俗文学、民间文学,主要适应于知识程度和审美欲求较低的大众需要,它们的发展基本表现为内容的更替,而在艺术形式上一般变化不大。雅文学除了内容需求反映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生活和人生体验,艺术上尤其强调独创性,这是它生命中最本质的内核。其“内核”的人性之根,在“三欲”中的“智能”。智欲具有很强的自我“裂变”功能,自由和创造是它的天性。这种天性,给雅文学注入强大的生机,催动它不断自我创新,自我繁衍,成为发育最充分和多彩多姿的一

族。

最初的雅文学包含两种创作路向：现实主义的（主要从民间歌谣继承而来）；浪漫主义的（主要从远古神话继承而来）。在中国，《诗经》和《楚辞》就是这两种路向中的代表之作。后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两种路向此消彼长。发展到近代，尤其是20世纪，由于创造主体思想精神日益复杂化、个性化、多元化，雅文学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实主义由以往偏重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典型”描写，转向强化心理描写、民俗文化描写以及日常生活描写等，产生了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无边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功能现实主义等等。浪漫主义则沿着想象与幻想方向演化，通过想象、联想、象征、意象、意识流、荒诞……在内容与形式（特别是后者）上更为强调求新，求异，从而造出名目繁多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由于它们过分强调表现人的主观意念、情感，挖掘人的潜意识、非理性，以致同一般读者的审美和情智需求距离越拉越远，终于引出反其道而行的后现代主义。

对于雅文学来说，后现代主义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极端主义的倾向。它在消解“深度模式”，追求“平面化”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意义的探寻，对审美的追求，大多数创作不仅未能更贴近文学的本质，反而相距更远了。这样，尽管它作为一种现代先锋文学不失其价值（尤其在叙事和语言探索方面，但难以在雅文学长期立足。于是便又有现实主义（当然是具有世纪之交时代特征的新现实主义）的“回归”。

雅文学生命的要义，一是关注价值、意义、人性（其表层是现实的社会人生），二是追求审美。它的发展，也只能遵循这样的方向。二者兼备最好，偏重一面也行（或潜入社会、人性的深层，或强化形式的创新），但失去这种追求却不行。规律不可违，新时期以来雅文学创作思潮演变更替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从微观上看，文学生命的基本单元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作品的生命表现为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文学生命整体的一个“全息元”

（体现着文学本质特性），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内容有内容的生命，形式有形式的生命。在内容中，社会有社会的生命，自然有自然的生命，文化有文化的生命，故事有故事的生命，人物有人物的生命，心灵有心灵的生命。在形式中，结构有结构的生命，叙事有叙事的生命，章句有章句的生命，语言有语言的生命。而无论内容的生命，还是形式的生命，又都灌注着作家的生命。从理论上讲，文学作品各层次的生命都是“全息”的。一部成功的作品，正是这三种生命融合的结晶。融合的程度越高，作品的生命能越强，也就越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和美，正体现在它的“丰厚浑圆”。

文学家族中还有另一支：理论批评。从“生命”的角度看，理论批评虽然由文学鉴赏而生，但其发展动力并非来自这一个方向。在原理上，哲学和美学给了它重要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方向，一个自下而上，一个由上而下。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两个方向相向发展，形成双流。一是以作品品评和文学流程（文学史）的考察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应用性的研究（即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领域。一是以一定的哲学、美学原理为指导，开辟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即文学艺术原理）研究领域。二者本质上是一体的。但这一头一足，中间悬空，还不能自如地上下贯通，限制着应用研究的提高，也影响着基础理论的充实，这是理论批评生命发展中必须解决的课题。

到了近代，由于社会、人文科学众多分支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大量新的理论参照，以及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长期积累，这一空缺迅速得以填补，涌现出许多具有中介性的新兴学科：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文艺社会学、文艺批评学、文艺美学、主体论文艺学、文艺现象学、文艺阐释学、文学价值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文艺学以及文体学、叙事学等等。它们属于理论批评的“发展性理论”领域。至此，理论批评也完成了自己健全的“生命链”，即：应用性理论 \leftrightarrow 发展性理论 \leftrightarrow 基础性理论。

这三种理论,上下贯通,呈开放姿态。基础性理论向上,通过美学中介,通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从这里汲取最基本的理论指导;应用性理论向下,同各种具体生动的文学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相连,并从这里获得丰富的现实源泉;技术性理论居于二者之间,既是基础性理论的具体化,又是应用性理论研究的科学升华,也是传统理论与各种有关新理论的结合部,因而是酝酿和推动整个学科理论调整、突破和发展的重要环节。这是一个富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生命系统。

三、文学生命与环境

文学作为人类情智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生命,它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和保持良好有效的环境。这种环境大致包括三个层面。

(一)心理层面。文学作品的胚胎,形成于作家主体的精神心理领域。从生命流程来看,作家心理环境的优劣,是决定作品的方向、质量和命运的首要因素。欲使文学发育正常,文学家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环境基础是:正直、善良、积极、进取,酷爱艺术;进一步,则是能与社会公众心理相沟通。社会公众心理中的情感、思想、愿望,尽管还处在朦胧潜隐状态,但凝聚着公众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传承、感受与思考,可以让人悟察到一个民族情智的趋向和深层的脉搏。文学家如果能够找到与这种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使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和艺术追求与深广的社会内涵相衔接,必将超越个人的小悲欢,为优秀文学的形成提供有效的心理环境。

(二)社会层面。文学生命既经形成,就要寻求生存、传播和发展,这就需要适宜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是政治和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在我

们国家里,政治和文艺政策的正确与否,对文学生命是生死攸关的事。值得庆幸的是,历经磨难之后,人们已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方针,宽松自由而又严肃的艺术政策,文学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的。

广大读者——受众,也是文学生命社会环境的重要部分。文学生命需要经过读者的接受才能显现,才能释放自己的“艺术能”,对社会人生发生作用,同时,读者的欣赏习惯、审美趋向,又反过来影响作家,从而也影响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为此,受众的素质(思想道德境界、知识水准、艺术趣味等),就不是无足轻重的。有鉴于此,关注和培育积极健康的读者群体,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三)文化层面。精神文化有一个庞大的“生命家族”,文学是其中最为鲜艳多姿的一支。文学生命同这个家族息息相关。良好的文化环境,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丰富性、开放性。一个民族,首先要创造条件使本民族各种门类的文化充分发展起来,同时对外开放,将世界其它民族创造的先进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介绍进来。如此,中外文化并存,古今文化同流,主体交叉,和而不同,相容互补,形成强大的文化“共同场”。如果说,心理环境、社会环境,分别为文学生命准备了良种和沃土,那么文化环境则提供了充足的空气和阳光。

此外,在文学系统中,对于创作来说,理论批评也构成了一种环境,可称为“内环境”。严肃认真而又符合艺术规律的理论批评,其影响更为真接、具体亲切。这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汤学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100078)

责任编辑:陶原珂

王士禛、赵执信关系考辨

考察文人间的关系，不啻为了解当时的文学实际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清代的王士禛和赵执信就为我们的这种考察提供了一个机会。

王渔洋和赵执信之间的关系，因赵著《谈龙录》一书而由若隐若现渐趋明朗。赵执信在序中曾直言不讳地说：他与王渔洋“侵见疏薄”的关系其实是长期存在的，但由于王渔洋名位隆盛而一直无由辩白。到康熙己丑年（1709年），王渔洋已76岁了，且已罢官僻居有年。赵执信或许是感到彼此距离近了，应该趁此机会向世人作一个交待，所以他说：“向也匿情避谤，不敢出，今则可矣。”因此，考察王渔洋和赵执信的关系，《谈龙录》应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线索。

王、赵之间原来是血缘较近的戚属，赵执信称王渔洋为“余妻党舅氏”。虽然他们戚谊既深，又同为诗人，却因种种原因成了学术和生活上的对手。王、赵之交恶，主要有下列四事。

其一，据赵执信《谈龙录》称：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芦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称：“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吴门亡友顾小谢宅，漏言及此。客坐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告也，斯则致疏之始耳。

王士禛擢任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时在康熙廿三年（1684年），同年出使南海。《南海集》的编订成集则在康熙廿四年。如果赵执信所言属实，则王、赵之间是从康熙廿四年或此后才“致疏”的。致疏的原因，一是因为赵氏批评王诗无病呻吟，即“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一是讥讽王诗“诗中无人”，

似乎纯粹是学术上的问题。同时，赵执信在此旧话重提，似也意在说明王渔洋学术襟怀之狭窄，容不得别人的微辞。但是，我们在《渔洋诗话》中很少看到王士禛讥评赵执信的话。^①这绝不是说赵执信无可指责。相反，《谈龙录》却一再提到“阮翁素狭”、“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伺寇靳焉”、“王爱好”等近乎人身攻击的话，倒是无形中显出赵执信的心胸也未必有他自诩的宽广。仅就《谈龙录》的记载来看，王渔洋对赵执信还是看重的。当时诗家北人多失黏，吴越又多乡音，常被时人讥为伧父。而王渔洋却对赵执信说：“吾乡若老夫与子与修来，庶免于伧之谓也。”还是把他引为同道的。另据赵执信《冯舍人遗诗序》：“朝士有得诸葛铜鼓者，先生（冯廷樞）与余各赋长歌，于是名辈，自渔洋公而下，莫不敛手。渔洋遂欲哀两人酬唱之篇为《二妙集》行诸世，先生与余并辞，乃止。”可见王渔洋对赵执信原来是未有芥蒂的，且不无奖掖之意。而冯、赵二人因不愿攀附贵要而阻断此事，其意气之争不免矫情，后并将渔洋称道过的《诸葛铜鼓歌》等作品，从自己的诗集中删去，以示“不欲有所依附”，城府之深，同样让人惊讶。《谈龙录》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渔洋有一次刚刚从别人手中得到了《浯溪磨碑》，这是唐代颜真卿所书元结之《大唐中兴颂》刻石，珍贵异常，他的弟子汪蛟门（懋麟）当即写了40韵诗呈上，以表赏爱之心，王渔洋大加赞赏，并把诗递给赵执信看，可是他只看了第一句“杨家姊妹颜妖狐”就“攫掷之地”，“阮翁为之失色者久之”。赵执信记录这件事的意图何在，且不置论，但却无意中显露了他有限的气度与涵养。《四库提要》评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集》述及此事，亦认为赵执信“借懋麟以攻新城，未免操之已蹙”。翁方纲曾评说《谈龙录》“其意在齟齬渔洋而已”，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王渔洋以神韵言诗，赵执信袭吴乔衣钵倡“诗中有人”，本言各有当，不能据己以攻彼。何况神韵本不废性情，有性情岂能无人呢？即此可见

赵执信的为人确乎有点偏执。他所说的“致疏”之由也因此大可怀疑。”

其二，由具体创作观念的不同而引发的心理隔阂。这一王、赵交恶的原因，同样是赵执信自道的，他在《谈龙录》中说：“余曾为先叔祖清止公行实，中间颇有所讳，阮翁为益数行，余自是甘自疏。”赵执信叔祖名赵进美，字韞退，号清止，清初诗人，官至福建按察使，有《清止阁集》传世。赵执信为作的行实之文，具见《岱山文集》卷十。而清止的墓志铭则是王士禛在赵文的基础上增益写定的，增益的内容是：

公少为诗，清真绝俗，得王孟之趣。使江西时，尤刻意二谢。其《敝吟》一卷，皆乐府诗。丁明末造，多悲天悯人之思，顾盼跌宕，不主故常，有邯郸生天人之叹。丙戌后，官京师，与龚芝麓尚书、曹秋岳侍郎诸公唱和，一变而高华，尚声调，然《梨花》、《枫叶》诸篇，风致不减青丘、海叟。《使楚》一集，尤为艺林所贵重。江西以往，浮湛监司者，积三十年。公既倦游，而笔墨亦奇减。早通二氏之说，发未燥，作《瑶台梦》、《立地成佛》诸传奇，论者谓不减张小山、贯酸斋云。

王渔洋的这段话收录在《带经堂集》中的《授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清止赵公墓志铭》一文内。按照赵执信的说法，渔洋此节所论正是他“颇有所讳”之处。赵执信以《春秋》为文章规范，《谈龙录》曾直言：“文章原本《六经》，诗亦文也，余意尤重《春秋》，非《春秋》则取舍乖而体不立矣。昔人所为致‘严于一字’者，取诸《春秋》也。”取《春秋》之义，为尊者、亲者讳，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曹丕《典论·论文》也说过“铭诔尚实”这样的话，则赵文博约温润、王文缕述尚实，也均可并行而不废。赵执信强求创作观念的统一，这本身就不尽合理，如果因此而“甘自疏”，由彼此交恶的责任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实际上，细检渔洋增益的这段文字，其实是本着历史的观念，叙述清止诗风的演变，似并无唐突之处。赵执信“知微见著”，反对王渔洋将赵清止在明末“顾盼跌宕，不主故常”的一段颓废浪漫生活，及其写作的未必雅洁的《瑶台梦》与《立地成佛》等传奇写入墓志铭中，有损尊者的形象。则赵在文学观念上的局限，以及情感上的脆弱，当也是览者无余了。沈德潜《清诗别裁》评说赵执信著

《谈龙录》“责人斯无难，未必服渔洋之心”，当是持平之论。这也反映出赵的为人确有峭峻偏衷的一面，以此衡鉴其言论的虚实，不能不付以格外的谨严。朱庭珍《篋园诗话》认为：“秋谷好恶拂人之性，其议诚不足辩矣”，看来并不是苛论。

其三，由声律问题引起的矛盾。赵执信说：“闻古诗别有律调，往请问，司寇靳焉。余宛转窃得之，司寇大惊异。”②又说：“阮翁律调，盖有所受之，而终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尽也。有始从之学者，既得名，转以其说骄人，而不知己之有失调也。余既窃得之，阮翁曰：‘子毋妄语人。’”③其中有多少可信成分，难以确断，特别是前因后果是否真的如赵执信所言，就更得打个问号。但声律问题可能确实是王、赵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至少对赵执信来说是如此。王士禛有《律诗定体》、《古诗平仄论》传世，赵执信则有《声调三谱》流布于今。据说《声调三谱》就是赵执信在向王士禛请教声律之说而遭婉拒后，遍览唐人诸集，排比钩稽而成的。显然，赵执信对司寇之“靳”是耿耿于心的，所以《谈龙录》中屡次提到“司寇靳焉”、“其以授人，又不肯尽也”、“子毋妄语人”等等。而他自己虽然“罕见信者”，但却是“语人无隐”的。又讥笑渔洋门人“不知己之有失调也”，情绪颇不平静。事实上，赵执信的话也不免讲得太绝对了，譬如说渔洋声律“终身不言所自”，而《渔洋诗话》卷上却明白地说他自己受之于其先大父：“先大余方伯赠尚书，年八十余，亲教诸孙，颇及声律之学。”惠栋《剡声调谱序》也说：“士禛律调之学，得自吴伟业。”故识者自有明察，何须一一具告？又，明人诗歌注重格调，对声调之说也粗有所得，此是人所共知之事。然渔洋声调所自，何以执信如此多疑呢？又如说，渔洋之“靳”，不肯悉教于人，而在《师友诗传录》答问各条中，渔洋其实也已粗发其凡了。其它如《渔洋诗话》、《然灯记闻》中亦有所见，如：“古诗要辨音节。音节须响，万不可入律句，且不可说尽，象书札语。”“韵有阴阳。阳起者阴接，阴起者阳接，不可纯入阴阳，令字句不亮。”等等，不一而足。可见王渔洋并不是把声律之学矜为独得之秘的。他的两部声律著作《律诗定体》、《古诗平仄论》都还是寥寥数则，很难说已自成体系，其不愿尽授于人，或许这也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我同意姚范的看法：“阮亭属勿语人，或示学人以陋，而赵讥其矜秘，未可信。”如果固步自封，作诗的时候心里横亘着平仄阴阳的条条框框，

而于性情、神韵不顾,可谓舍本逐末了,海洋何尝愿意见到如此?所以,他的“靳”不是毫无道理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王士禛看来确实不愿对赵执信讲声律问题。然而,他在其它场合却不是讳莫如深的,有时竟是侃侃而谈。这一点赵执信不会不知道,所以在声律问题上,王士禛刺痛了他的心。其中牵涉到的方面很多,暂不置论。

其四,上列三事是赵执信自道的,而自道之不可信,已辩驳如上。此外,知情的人还有另一种说法,如《精史列传·文苑传》说:“执信诗自写性真,力去浮靡。生平服膺常熟冯班,遗书称私淑弟子。娶王士禛甥女,初犹相重,以求作《观海集》诗序,士禛屡失其期,遂相诟厉。”《四库提要》也有类似记载,并说两人因此而“仇隙终身”。这事件,赵执信从未提起,是否属实,需要有材料来证明。《渊阁四库全书》收有赵执信的《因园集》,内按时间先后分并门、闲斋、还山、观海、鼓榭、涓流等13集。《还山集》有《酬王阮亭先生见寄三首》,语语深情。④另外,《西城别墅十三咏为阮亭侍郎作》更是对王氏新建的石帆亭、樵唱轩、半偈阁等13处景点一一咏过,誉辞甚多,未见不和谐的地方,这大概是他们处于“初犹相重”的时期吧。而从《观海集》之后,有些涉及阮亭的诗,词气就不太平和了,如《鼓榭集》中《渡江》一诗已有“只应羨诗老,持节问岷源”的句子,并自注:“谓阮翁”。而《悼吴孝廉文炜山带》中“渔洋未识名先著,谢客相知意最亲”的诗句就更给人以不太温和的感觉。此外,《浮家集》中《钝吟冯先生宅感怀二绝句》也是公开将王士禛作为讽刺对象,绝句其一说:“间世钟期强听琴,潜依流水写微音。敝庐未解相料理,枉被名卿妒范金。”自注:“阮亭司寇谓余尊奉先生,几欲范金事之为不可解。”以《观海集》为界,从赵执信前后态度不同来判断王、赵之间的隔阂生于作《观海集》时,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然而,疑问还是有的。王渔洋对赵执信求作《观海集》序“屡失其期”,最后竟不了了之,而王渔洋诗文中替人作序的却不少,如《鬲津草堂诗集序》、《西山唱和集序》、《使粤集序》就分别是为田子益、宋牧仲和乔子静而作的。他为别人写的跋也很多,如《跋王仲山集》、《跋边习诗集二则》、《跋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等等。一些同人如宋荔裳、施愚山、孙豹人等的诗文集,也是他编订的。可见王士禛并非如一般名士的清高自傲。而且,他自己的

诗文集也有请别人作序的,如《论诗绝句四十首》的序就是出自南昌陈士业的手笔,而《后白门集》的序则由汪琬执笔。王士禛好提携后学,奖掖士子,这在当时声誉广被,薄州吴天章、成都费密等都是因为受到王士禛的称赏而在当时“名声大噪”的。杨际昌的《国朝诗话》卷一曾说:“国初海内士子至京师者,先以所作呈龚芝麓,次必谒王阮亭、汪钝翁、刘公勇,汪辄诋、王辄赞、刘辄置不远。”虽然“王辄赞”并不完全可取,但比照“汪辄诋”和“刘辄置不远”来说,毕竟能给后学以信心,鼓动着他们作诗的热情。王门弟子一时称盛,这与王士禛的不吝奖饰也不无关系。王士禛的许多特别举措只是针对特别的赵执信而言的,而赵执信则显然把这一本于个人恩怨的行为放大了许多倍,并且处处昭示于人。在这种不懈的诋毁下,赵执信自身的形象也必然会日渐模糊起来,这是很令人深思的。

从对上列四事的考辨来看,王、赵关系的恶化,既有在审美趣味、创作观念上的分歧,也受到一些性情气质与生活琐事的影响。其中恩恩怨怨,难以厘说清楚。故略作辩解,以引起有关清诗和清代文学批评研究者的注意。

王渔洋是位早熟的诗人,在他15岁那年,他的第一个诗集《蓑笠堂初稿》就由其兄王士禄序而付梓了。但真正为人所知的,则是在顺治四年(1657年)他24岁时,因在济南大明湖赋《秋柳》四章,一时不胫而走,和者纷起。不仅一些诗坛名宿如汪琬、程可则、彭羨门等有唱和之作,甚至一些僧寺女尼也不例外,王渔洋很快名声大噪。后来接着就是考中进士,从任扬州推官到礼部主事,顺利踏上仕途。在这期间,王士禛的诗名已经达于禁中,远播海内,并且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宋荦《西陂类稿》卷三十一《资政大夫刑部尚书王公士禛暨配张宜人墓志铭》说:“时上留意古学,特诏公懋勤殿试诗,称旨。次日传谕:‘王某诗文兼优,着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讲,旋转侍读。本朝由部曹改词臣由公始,实异数也。”康熙的这一传谕不仅使他官运亨通,从入值南书房到迁国子监祭酒,又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最后官至刑部尚书;而且也使他的诗名达到极巅。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也即王士禛70岁之前,他的诗坛霸主的地位由于政治上的庇护而无人望其项背。赵翼《瓠北诗话》卷十:“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王阮亭。”所以一时间门庭若市,士子名流趋之若鹜,大

有踏破门槛之势。但是树大招风,在王渔洋诗名辉煌的同时,一场无形的“倒王”运动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有的在结交不成后倒戈一击,有的在荒江虚市中指桑骂槐,有的干脆就不分深浅大放厥词,有的则遮遮掩掩细吐微辞。所以就有了吴乔的“清秀李于鳞”之讥、施愚山的“华严楼阁”之喻和汪琬的“西川锦匠”之戒。此外,顾小谢、冯舒、冯班、贺裳、庞垲、何焯等也不甘寂寞,褒贬任声,抑扬过实,而赵执信就走得更远了。这里再举个吴乔的例子,与赵执信的“至尖极冷,下笔如刀”(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一样,吴乔的《钱录》对钱谦益的诗文指责不遗余力。其《围炉诗话》对明代前后七子及明末诸家,也是挑筋剔骨,诟谮万端。而独以冯班诗为600年来所无,奉为一代宗匠,历史已证明其为虚妄之论。不过,这种偏衷崇己的性格是与赵执信不谋而合的,所以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从“人以群分”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同声共气的实质:“吴乔)持论与秋谷同符,故秋谷隐宗明祖,欲援吴以振其军。盖性情谿刻,笔锋犀利,伸臆说以乱公论,阿私好以排异己。二人同病,所以投契如是。”吴乔从禅宗答问中悟出的“诗中须有人在”,曾被赵执信作为一块招牌,频频攻击王士禛。而事实上,王士禛的“神韵”说与吴乔的“诗中有人”说并不矛盾,神韵说要求诗歌情灵摇荡,意境飘忽。吴乔也说:“诗有境有情,自有人在。”^⑤可见,他们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赵执信只知其异而不见其同,或许是误解了其师的意思,或许是别有深意。

吴乔另有《答万季野诗问》行世,当有人问他:“今人忽尚宋诗如何?”吴乔回答说:“为此说者,其人极负重名,而实是清秀李于鳞,无得于唐。唐诗如父母然,岂有能识父母更认他人者乎?”这个回答多少有点让人吃惊,因为里面看不到一点平等的学术讨论的意味,却有发泄宿怨的嫌疑。倒王派的言论常不免于意气用事,有失分寸,经不起斟酌,难怪

四库馆臣也要批评吴乔:“气质嚣浮,欲以毒詈狂谈劫俗耳”。^⑥这大概也是倒王而王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王士禛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和嘲讽,基本上是平静的,处惊而不乱,不失大家风度。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说:“汪钝翁官京师,与王阮亭齐名,阮亭诗所云‘姓氏惭龙腹,文章忝雁行’也。汪姓狷急,与时多忤,交游鲜善终者。退居尧峰后,与阮亭也不免齟齬。及卒,阮亭有‘知交满海内,议论根柢,终谁此君’之语,未始不重之也。”这说明王士禛至少是能把论人与衡文区别开来的。这和倒王派的由文及人,连带推倒的做法,就很不同了。

①现在可考见的王渔洋批评赵执信的言论,仅《带经堂诗话》卷二有一条,其文转录自《古夫于亭杂录》曰:“常熟冯班定远,著《钝吟杂录》,多拾钱宗伯牙慧,……乃有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何也?”张宗柟据《谈龙录自序》:“弱冠入京师,……得常熟冯定远先生遗书,心爱好之,学之,不复至于他人。”而加按语曰:“此条末数语,盖谓赵氏也。”

②《谈龙录序》。

③《谈龙录》。

④《酬王阮亭先生见寄二首》其一曰:“生长山水窟,新归似乍经。书来羨岩瀑,梦去畏山灵,醉遣池鱼见,吟教谷鸟听。追游失仙侣,怅望向晨星。”其二曰:“何事中朝旧,他年愿卜邻。乘时朱虎让,失意绮黄亲。斜日依台柏,惊风荡塞尘。请公树奇绩,容我乐芳春。”

⑤《围炉诗话》。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诗文评》。

作者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5102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回归后的香港中资企业

□雷 强

香港“中资企业”是指来自内地的国有资本在香港注册经营的独资或控股公司,包括上市及非上市公司。作为中资企业,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由来自内地的国有资本控股,但不包括内地私营、个体企业在港设立的公司;第二,要在香港注册经营,不包括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国企(即通常称为H股国企);第三,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直接外在表现:企业每年要向直属政府机构或内地总公司缴纳一定数额的利润(亏损企业除外);企业的最高领导实质上要由主管机构(上级政府或公司)任命。

一、“九七”前后中资的新动态

香港回归前中资的动向非常引人注目,从目前的一些资料分析,中资经营更趋积极进取,反映中资更加注重吸收专业人才,更大程度上融入香港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去。尤其随主权移交,部分英资撤出香港,在不少行业涌现了商业机会,中资正是抓住这一历史性契机,成为历史上业务发展最快的时期。

①充分运用资产经营手段,扩大在港收购的领域及数量。中资在香港十多年的运作中逐渐学会了“上市、集资、收购、分拆上市、集资、再收购”的滚雪球式的资本经营方式,自1994年以来,各大中资企业频频开展回国内及香港作上市公司的收购活动,并使整个公司的经营朝实业化、内部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目前,中资在香港的收购已从90年代初的“买壳上市”为主要目的,转向获得专业技术、营销人才、网络,获得筹资渠道为主要目的的收购。

随着中资收购的扩展,其经营领域几乎涉及到香港的所有行业,尤其作为香港五大经济支柱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航运业、贸易业,不时传出中资的收购消息。当然,在贸易业中的收购比较少,因为中资原本大多是贸易公司起家的,已有营销网络。

②注重开拓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作为香港的重要产业,以往中资一直慎于参与。但随着经营观念的改革,逐步开始意识到这一领域的开拓价值。而且中资原有不少地产,加以充分利用、开发,经济与社会效益都不错。中远在香港物业投资项目总值约40多亿元,全部房地产项目约60亿元,共持有14家与房地产有关的附属公司,仅1996年5月,中远购入上环永乐街重建商厦的15层楼面及命名权“中远广场”作为新总部,耗资达29亿元。为此,张大春为扩展房地产业务,决定入股顺成国际30%股权(由中远置业购入),成为第二大股东。1997年2月26日又收购了31%的股权,合共61%,完全控制了顺成,而顺成的股价亦从0.30港元升为5.6港元。另外,其他中资也积极开拓房地产市场,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回报。

③改革经营机制,调整人事领导,进行标准化认证,强调法制廉洁。中资在香港贯彻“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原则中,一直受缚于经营机制的滞后及不完善。主要的弊端在于:经营自主权受行政干预较多;外派干部轮换频密,不利于业务的稳定;领导选拔的“任命制”;财务监管体制不完善,漏洞太多等等。因此导致经营效率低下,效益不高,出现贪污现象。

1995年以来,在新华社、中纪委的大力整顿下,中资企业有了较大的改善。首先,选拔了一批年轻的、甚至是本地化的专业人才出任中资领导,如广南行业的黄晓江、粤海集团投资的许皓明、中远太平洋的张大春、中旅的朱悦宁等等,这些年轻化的专业领导颇具开拓实干精神。同时,许多中资开始ISO7000系列认证工作,在这与惯例接轨的过程中使中资的经营趋于规范化、程序化。

鉴于1994年出现的几宗大的经济案件(焯北方收赂800万美元等)中资强调了内部的财务等方面的监管。因为“九七”后,许多港人都担心中资中存在的官商作风及贪污行为会影响整个香港形象及整体竞争力。这种担心是值得重视的。两年来,中资在这方面作了较大的努力,整肃了不少腐败人员,并强调了法制观念。

二、当前中资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997年,中国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一是香港回归祖国,二是十五大隆重召开,都为香港中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香港顺利回归,海内外人士普遍看好香港及内地经济的发展前景,看好香港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作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这将有利于香港吸引海外资本到港投资,从而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继续繁荣,为中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经营条件。

在挑战方面,主要有两个:

1、在香港回归后,驻港中资企业能否适应新形势下自身任务的转变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继续有所作为、有所发展。

在香港回归后,香港中资企业的性质地位、任务作用以及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一国两制”的要求及国家的有关政策,中资企业有如下的变与不变。在性质地位方面:企业已从原来的驻境外企业变成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企业,但国有企业的性质未变,在内地投资及开展经营活动等同外资的待遇不变,在香港不谋求特权,依法参与平等竞争的地位不变;在任务与作用方

面:中资企业为内地发展经济服务,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服务没有改变,但更加突出了中资企业同样要进一步落实“一国两制”,认真执行基本法。从外部环境看,香港的市场已从境外市场变成中国整体市场的一部分,但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不变。而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并没有因为回归而趋于缓和,商场依然如战场。中资企业只有锐意改革,融入香港,按香港市场游戏规则运作,才能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否则仍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近期中资企业在香港各种经营活动中,尤其是上市公司股票在股市中的大起大落,可以看出残酷竞争的市场是不会给任何中资企业留面子的,具体数据可参见表1。从1997年最高价与10月份最低价及10月31日收市价对比,可见港股在几个月及一个月内的升跌有如“过山车”般惊心动魄。

表1 主要红筹股份股价表现

代号	股票名称	全年最高	10月份最低	升跌幅(%) 和最高比较	10月31日 收市价	升跌幅(%) 和10月份最低比较
0031	航天科技	7.1	1.91	-73.2%	3.0	57.9%
0119	新海康	10.5	3.1	-70.5%	4.1	32.3%
0123	越秀投资	4.8	1.4	-70.8%	1.9	35.7%
0135	中国香港石油	6.1	2.0	-67.2%	3.2	60.0%
0144	招商局国际	26.7	6.9	-74.2%	11.2	62.3%
0183	嘉华银行	24.2	8.2	-66.1%	11.3	37.8%
0256	光大科技	6.2	1.4	-77.4%	2.0	42.9%
0257	光大国际	9.1	1.9	-79.1%	2.9	52.6%
0267	中信泰富	52.8	28.3	-46.4%	37.0	30.7%
0268	鹏利国际	4.6	1.4	-69.6%	2.0	42.9%
0270	粤海投资	12.3	3.5	-71.5%	5.0	41.7%
0291	华润创业	39.1	11.4	-70.8%	21.2	86.0%
0308	香港中旅	6.4	2.3	-64.1%	3.2	39.1%
0318	五丰行	13.8	4.2	-69.6%	7.3	73.8%
0363	上海实业	59.9	15.4	-74.3%	34.4	123.4%
0392	北京控股	65.0	15.6	-76.0%	25.9	66.0%
0517	中远国际	14.3	2.9	-79.7%	4.7	62.1%
0604	深业投资	12.2	4.6	-62.3%	4.6	0.0%
0655	华人银行	15.2	4.3	-71.7%	6.0	39.5%
0688	中国海外	6.7	2.0	-70.1%	2.7	35.0%
0697	首长国际	2.7	0.7	-74.1%	1.0	42.9%
0730	首长四方	3.3	0.9	-72.7%	1.2	33.3%
1199	中远太平洋	19.1	6.3	-67.0%	9.0	42.9%
1203	广南(集团)	13.6	4.9	-64.0%	7.1	44.9%

资料来源:香港《壹周刊》1997年10月31日第45页。

现实证明,中资企业通过资产经营来壮大自身实力,路子是走对了,但是今后仍然要非常重视产品经营,注意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目前香港股市低迷之时,扎扎实实地打下产品经营的基础,为今后资产经营更上一层楼奠定坚实的基础。

2、十五大以后,内地国企的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发展速度将加快,中资企业如果不紧跟形势,加快改革发展步伐,很可能被内地国企甩在后头,丧失在内地的发展机遇。

一般人认为,中资企业在港澳及外国较为成熟的市场环境下经营,其改制改革一定会比内地国企做得好。其实不然,能否深化改革关键要看自身的努力,尤其是领导班子的责任感与魄力,也要看内地主管部门领导的支持。中资虽在香港经营,但常有改革步伐不如内地国企大,发展速度不如内地国企快的感觉。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内地国企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勇于开拓,无论改革与发展都取得显著成效。从稍为长远一点的观点来看,中资企业在内地的经营,也将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享受外资企业优惠待遇的好处并不可能持久,因为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经济与世界接轨,对外资给予国民待遇势在必行,外商、港商及中资企业,在内地的优惠会逐渐减少以至消失。因此,中资企业要在内地获得并保持优势,进一步发展,必须看到这种趋势,未雨绸缪,根本点是要靠深化改革、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靠改革创新焕发出来的竞争力去占领与扩大市场,否则就不能保持优势,很好地完成国家交给的“两个服务”的任务。

中资企业到香港,其实是中国企业迈向国际化的一个开端,80年代至今,有不少驻港中资在跨国经营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和尝试,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初步开拓了一条以香港为基地开展跨国经营的路子;但同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如香港粤海(集团)过去先后在美、加、欧、澳洲及东南亚等地办了10多家子公司。其中较有规模的投资有巴黎中国城、波兰分拨中心、曼谷一些酒店地产等,积累了不少探索跨国经营的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办得并不成功,几乎全部亏本。这几年他们主要结合广南(集团)公司的实际,初步总结出几点办海外企业较深刻的体会:①要有一定的投资规模和投入力度,不办“夫妻店”,不搞“接待站”式的企业;②要有自己能够控制、生产、能适应不同国际市场的拳头产品,并实施“一

条龙”式的综合经营;以粤海集团在巴黎的贸易经营为例,过去由巴黎中国城属下的贸易公司主管,要自己去香港、国内组织货源,人手不足而致亏本,后来此项业务交由广南公司管理,由于它在香港、国内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购销网络和手段,又能在香港融资,在产、供、售、融资及成本核算等方面有自己的统一协调机制,这不仅保证及时供货,还节省了费用,获得了纵向合作经营的效益,从而使粤海巴黎中国城的贸易很快扭亏为盈;③选准市场,量力而为,稳步发展。因为发达国家税率高,市场要求严格,集团在这些国家办企业,由于经营与竞争能力不足,经营普遍困难。不如收缩一些发达国家的点,使力量相对集中,而且注意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效益有了提高。加上,选好有责任心、有开拓精神的海外企业领导和骨干,建立起一套适合海外市场需要的发展策略与经营方式,开展跨国经营便有了切实的保证。所以近期,一部分中资企业以利润为核心目标撤销了一些投资大、风险高、收益少的跨国经营项目和海外企业(尤其是“夫妻店”、“接待站”式的小企业)。有人担心这是中资企业在跨国经营方面的一个倒退。其实,这样的做法更符合市场规律。相信经过一段新的调整期,吸收了更多的经验、教训,积累了足够的人才、资金、技术等后,驻港中资企业对外投资跨国经营将会健康地发展,真正探索出一条以香港为基地,中资大集团企业发展跨国经营、建立跨国公司的经验,带动和促进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和建立中国式跨国公司。

三、“九七”后中资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香港顺利回归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下,事实证明,香港回归是顺利的,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并且,中资企业将发挥更大的更积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领域:

第一,在垄断性行业中,中资将逐步扩大比重,并将逐渐取得控制性地位,这不仅体现了主权的变更,也是客观上的经济主导角色的更替。香港的公用事业行业一直由

英资的“专营”、“专利权”的形式垄断,回归后英资的特殊地位将逐渐消退,中资逐渐取而代之。但在这并不算短的过程中,中资由于资金、人才、技术的条件限制无法很快控制这些行业。如中华电力、太古集团等均是市值千亿港元的巨型公司,中资会采取先入股、逐步扩大股份,最终控制的渐进路子。现在,中信泰富已入股中华电力 20%、国泰航空 25%,邮电部香港公司也入股香港电讯,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第二,对香港传统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依然会保质保量。这对增强香港整体竞争力,减轻通胀压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五丰行、广南公司都积极投资国内的优质食品生产基地。广南在广州、东莞投资 1.6 亿元进行年产 300 万头瘦肉型猪基地建设,五丰行也在华东收购了大型猪场(目前每年供港猪配额 220 万头左右),中国海外公司拟参与东江水长途地下管道输送香港的计划。这些生活必需品在港的销售价格都受中资的宏观控制,并且均以成本微利原则定价,这对稳定 600 万港人的生活水准,减轻生活负担,控制通胀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在扩大香港广义交易额上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由于中资在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日益壮大,中资在收购、融资、信息咨询、培训等方面的交易费用将扩大香港的广义交易额,对于维持及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及信息中心的地位有极大的促进,并且亦会对转型时期的香港服务业创造广阔的需求空间,诸如律师、会计师、测量师、秘书等等专业人才的需求。中资有内地的广大市场作依托,香港成为一个高密集的交易中心,资金及信息由此流入各中资部门。

第四,在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集中体现在资金与经营体制的影响力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今后经济改革的关键,而这些企业的政策前提在于资金的投入及经营机制的改革。

内地“九五”期间有宏大的资金需求,并要保持 8% 的增长速度,这为香港中资提供了众多投资机会。香港上市中资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收购、兼并改组国有企业。在企业收购后的经营管理上香港中资企业通过引入香港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明晰企业产权,完善董事会决策制度,强调法制管理,通过存量资产和人才的流动和重组,重塑企业的微观基础。

第五,中资在港台经贸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为防止内地资金进入台湾,台湾通过“台港澳关系条例(草案)”。尽管台湾当局出于不必要的政治担忧而限制有中资背景的企业赴台投资,但台湾企业界及民间却对此持欢迎态度。其实,中资经营的经济性质日益明确,政治色彩日渐淡化。它们对台湾的经贸往来亦是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的商业行为,台湾当局大可不必紧张。也许,三五年内,中资在沟通中港台三地经贸关系及政治方面会发挥日趋积极的作用。

第六,进一步扩大政治上的影响。中资企业在 1995 年以来积极参与香港的政治活动。在 1995 年和立法局选举中,中银系统曾有 4 位资深人士参与立法局角逐,但不幸无功而返。但可以预料,回归后,中资企业在香港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定会更加活跃。其他方面,诸如“公益金百万行”、“春节烟花”慈善捐赠等方面,中资亦充分利用可以扩大宣传的机会树立形象。中资不会谋求“九七”后的特权地位,但会形成竞争中的某些优势。

总之,“九七”之后,中资企业在香港地位日益重要,而且将为落实“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促进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关资料来源:香港粤海(集团)有限公司。

作者雷强,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谭湛明

穗港的经济发展与广州话的语用特色

□王健伦 梁道洁

社会语用习惯形成、发展的依据,首要的是经济发展状况与要求。比如唐代,在100多年强盛的年代中,汉语言文字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而影响到各个邻邦;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清朝满族人掌握政权,他们都不推广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是努力学习汉语,原因就是汉族的经济文化比他们发达。可见,民族语言的发展,必然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靠拢,并因此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条语言发展的规律。

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十多年来,广州话显然广泛地受到了香港语用习惯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穗港广州话处于一种交融状况,从基本法的制定到整个后过渡期,直至香港回归后的今天,广州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对香港有强大的影响力,其中经济的交流合作最密切,这是穗港方言交融,社会语用习惯趋于基本一致的重要基础。

穗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穗港方言及其社会语用的影响,要求语言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为之服务。这种要求表现为:①)信息传达必须高速度;②)商贸活动要有良好的公共关系;③)国际贸易对各国语言文字的使用必须准确理解,使交流畅通;④)适应高效率、高享受、生活节奏快的需要;⑤)适应市场经济观念更新的需要;⑥)使文化风尚既保留汉民族传统又能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切,促使广州话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产生出一系列新词①、新语和新的语法构造,形成了一整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语用习惯。

二

研究社会语用就要把语言放在动态的使用中,从语用环境和使用者的要求方面来观察语言的各种结构和功能。

我们所说“新词、新语、新的语法现象”

的“新”，就是指过去没有现在有；或者过去也许别的地方曾经有过，现在广州地区重新被起用或首先流行。穗港两地整个语言的大环境纷繁多变、异彩纷呈。广州话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一整套有着乡土特色的语用习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下面我们试从社会功能来看看广州话的若干新语用特色。

(一)突出所传达的信息的重点

高科技、高生产率都与信息的高速传递分不开。语言是信息的载体，为实现高速传递，需要浓缩语言信息，为此，穗港人突破常规，形成了一些新语法格式，其中最突出的是词性的种种变化。为了突出信息重点，往往让名词活用作形容词，副词活用作形容词，名词活用作动词，等等。例如：

①(他)思想传统，不能接受未婚妈妈……(香港××报1995年10月11日)

②永远的广州(广州2210周年城庆大型歌舞节目)

③啤一啤啦！

词性新变现象在穗港人的口语里及报刊上到处可见，绝大部分用得很好，它利用词汇意义上的联系来突出语意的重点。如例①的名词“传统”活用作形容词；例②突出广州的历史源远流长；例③的“啤”本是英语beer(啤酒)的译音，本是名词，现在广州话把“啤”这个名词性语素用作动词，“啤一啤”就是“喝点啤酒”之意，更简明而有生活情趣。

词性新变化的另一种形式是名词直接受副词修饰。这在穗港也十分流行。例如：“他的水平好业余”、“呢种发型好女性架”、“呢的系好私人既问题遮！”。由于名词已活用作形容词，所以就可以和副词结合，以突出被修饰者的特性，简洁明朗。

此外，穗港还流行一种词语新配搭的习惯，故意把原来不配搭的词语结合起来，使人注意其特殊含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

“食”本来只可以与食物之类结合，但今有“食政策、食装修、食床板”等说法。

“炒”本来是一种烹调方法，但今有“炒股、炒名气、炒信用”等等。

“靓”本来多用于形容人或少部分具体事物，但今使用广泛，如“心情靓、靓歌”等等说法。

(二)化干戈为玉帛，以适应公关的需要。

公共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是商贸活动成败的因素之一，因而适应公关要求的新词、新语、新句式应运而生。

甲、否定的新句式——委婉的否定

1、否定+肯定(唔系系吗?!)

①)呢件事仲交界你做?唔系系吗?!
实际意思是“万万不能交给你做”)

②)几个都请晒假去旅游?唔系系吗?!
实际意思是“不可能吧”)

2、动词+疑问代词(睇下点)

①)老主顾啦，呢批货就七折畀我啦！

——睇下点，要我蚀本就唔行架。

②)你找数(结帐)罗。——睇下点！

这种句式表面上是商量的口吻，实际上是委婉的否定，避免了正面的拒绝。

3、肯定与否定相叠+动词短语(冇搞错啊)

①)而家十点半啦，你先置返工?冇搞错啊！

②)唔戴安全帽?冇搞错！

这种句式表面上是商量口吻，实际上表示完全的否定，因较委婉和缓，不致伤感情。

乙、避免矛盾激化的习惯语

1、“你好野！”

呢次你衰梗啦！——你好野！

“你好野”的正面意思是赞扬，但在穗港还有另一新义：表示不跟你争，但你别得意，走着瞧。这似乎显示了败方的高姿态，不致于使矛盾激化，又不会被置于灰溜溜的下场。

2、“你讲野呀？”

我使钱都系为你咋！——你讲野呀。

“你讲野呀”直译为普通话是“你不正在讲话吗？”实为反语：“你说的是什么废话？”既否定了对方，表明了分歧，但气氛却比较和缓，不会使矛盾激化。

广州话这类口头禅、习惯语很多,人们用它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营造安宁平和的社会气氛。

(三)简约、明快,适应快节奏的生活。

穗港的社会语用深受高效率、快节奏的社会生活的制约,因而很多新词、新语、新句式都是十分简约明快的。

新词如:特首(特区首长)、直选(直接选举)、推介、折现(把礼物折换成现钱送人)等等,新语(习惯语、口头禅、新成语等)例如:湿湿碎(特指经济价值小得不被放在眼内)、扮野(谓“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充阔气”之类)、坐直通车(港)特指港英政府立法局议员在港特区政府继续留任)、二人世界(谓恋人或夫妻避开外界干扰而快乐地一起生活)。

(四)满足顾客心理以促进销售。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一切商贸活动都离不开宣传工作,努力把自己的商品推向市场,社会语用就自然要为这种社会需求服务。在穗港有一些新词新语很鲜明地显示出它的这种非凡的社会功能。最突出的是对外来词的“美好音译法”。本来对外来词的音译只须着眼于语音的相近,但在穗港有些外来词的音译除了音近外,还千方百计选择带有美好义的词,如选择一些预示幸福、吉祥,对商品表示推崇、赞美的字眼来译音,以此满足消费者的愿望,提高其消费的欲望与积极性。例如:

乐百氏(Robust,一种滋补的口服液)、万事达(Master,一种信用卡)、爱立信(Ericsson,一电讯公司名)、万利(Montere,一种香烟牌子)、奔驰(Benz,一种汽车牌子)。

此外,穗港人有不少口头语,习惯语也同样具有这种特殊的功能,例如:“小钱唔出,大钱唔入”和“用钱 钱”等,反映了穗港人让钱增值的手法,有时还特指一种以钱开路的做法,反映了社会上的某种不正之风。

(五)反映新观念、新时尚。

成语、谚语、习惯语、口头禅等等,往往都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反映那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风尚、乡土习俗的特点。穗

港两地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州话产生了大量的新成语、新习惯语。如上所述,它多角度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们思想的变化,新的观念,新时尚都在语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

“生仔好听,生女好命。”(指女性能给家庭父母更多的关怀体贴。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有所突破。)

“讲心唔讲金。”(送咗幸运星,乜都有得倾(有商量)。)“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反映了当今社会青年男女重视感情世界的享受,追求浪漫潇洒的生活情调,追求温馨甜蜜的爱情生活,哪怕是短暂的也感到满足。)

“唔搏 奥托(小汽车)。”“有钱唔系万能, 钱万万不能。”“有权唔用,过期作废。”

反映了物质生活的享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上的一切都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不尚空谈,有些人人为此甚至做出越轨行为。)

以上种种用语,广泛流行于穗港人之中,足见广州话社会用语自成一格,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形成,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而广泛流传,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也有力地为穗港以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经济发展服务。如霍英东先生所言,香港广州同声同气,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香港商人就由于善于利用穗港两地同声同气,地理、人文环境有天然的联系而捷足先登,在广州以至珠江三角洲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就是许多世界性的大财团、大公司准备进军中国市场时,首先选择了广州,往往也是看中了穗港之间的同声同气。由此可见,穗港的社会语用系统有着不可忽视、不容贬低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功能。

三

每一种民族语言、方言及其社会语用在发展过程中都必然有一个不断加工提炼、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穗港的社会用

语也是如此。当前穗港的社会用语面临着积极建设的问题,即需要对其积极的方面加以肯定、扶持;对其消极因素加以指正、引导,使其向着健康、纯洁的方向发展。

当前广州话社会用语中的负面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崇尚西方,追赶时髦;一是喜好猎奇,但求随意。这些负面因素,主要来自商界和文化层次较低的人士。好端端的汉语汉字不用,满口“波士”(老板)、“畸士”(案件、任务)、“多士”(烤面包片)等等。商店名称也以用音译词或洋名为时尚,更有甚者就是连党政机关办的大报也有滥用英文代汉字为时尚的,例如:

《青年就是 Go》(××××报 1997 年 4 月 10 日的文章标题)

《李默然 de 戏剧人生》(××××报 1997 年 6 月 10 日的文章标题)。

穗港社会用语的另一突出倾向是喜好猎奇,所谓“搞笑”极受欢迎。有些传媒为了迎合人们的这种需要,不顾语言规范、不顾文化传统,滥改成语、习惯语,例如:

“加’无宁日”(香港电视《开心华之里》的剧目之一,意欲风趣地讽刺香港巴士滥加价之弊。)

“一锁在手,别无‘锁’求。”(广州固力锁广告)

“丐(盖)世英雄”(香港电视剧名)

对于以上种种情况,我们科学分析,积极引导,促进广大群众提高语言文化素质。所谓科学分析,就是要对广州话用语的发展大势有全面的认识,首先要分清主次,看准哪些是主流,正确估计其社会价值与经济意义;对其消极因素,要分析它的社会根源,有的放矢地给以引导指正。例如,穗港广泛使用音译词问题,就要具体分析,对那些能补充汉语不足,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如“美好音译法”之类)就应该肯定,而对那些

放着现成的词语不用,滥用音译词和制造语言混乱的混合语则应否定。科学分析还包括对社会用语中的某些弊病,既要消除它的负面影响,又要坚信它和语言的其它因素一样是可变的,可以改进的。例如对于崇尚西方,追赶潮流思想的影响下滥用外来语(中英混合语)问题,随着英国统治香港历史的结束,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也随着香港回归后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更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推广,那些热衷滥用外来词、混合语的潮流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自然也就逐步清除。当然,这里面少不了要加强宣传和引导。

至于基于喜好猎奇、乱套成语、乱用词语和方言词语等等,我们认为主要是人的文化素质问题。穗港用语中的消极因素,多半来自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或素质不高的商业从业人员和一些追赶时髦的青少年等。他们受文化水平所限,同时也缺乏语言规范观念,讲话只求顺口、开心。所以要消除这类社会用语的弊病,就必须从根本上提高群众的语言文化素质,加强其纯洁语言和语言规范的意识。这工作必须由政府部门带头行动起来才能奏效。影视、广播、报刊等传媒,对市民影响最深,在语用建设中能起重大的作用,所以它们理应义不容辞地积极承担起推动社会用语健康发展的责任,造成纯洁祖国语言的社会气氛,社会用语自然会健康而又富有特色地向前发展。

①参见《穗港新词试析》,《中国语文》1992 年第二期;《试论穗港新词》,香港《语文教育学院学报》1991 年第八期。

②见《广州日报》1997 年 6 月 8 日。

作者王健伦、梁道洁,广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一部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著作

——读吴奕新博士《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稳定繁荣》

□ 丘克军

~~~~~

过两个月,就是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了。香港回归后近一年的日子里,香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充分地证明了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治港实践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和保证。近日读了吴奕新博士的新著《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稳定繁荣》(广东经济出版社),又从理论上印证了“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的伟大意义。

《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稳定繁荣》一书,以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依据,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如何保持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构想。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谈到香港问题的7篇文章中,有6篇谈到“一国两制”问题,其中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要点,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专题文章,阐明了“一国两制”的含义:“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构想经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经大会通过,成为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的一种国策。

吴奕新的《一国两制与香港稳定繁荣》一书,对“一国两制”的理论意义作了充分的探讨,认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是富有

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

1.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关于国家总体结构和社会广泛组合的新构想、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2.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给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的理论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3.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

4.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人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共处的理论。

二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已快一年时间了。从近一年香港回归后的经济社会情况来看,“一国两制”的确是香港稳定繁荣的基础。1997年7月,香港刚一回归,就经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但香港经济未受到大的影响,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没有动摇。吴奕新在《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稳定繁荣》一书中,对“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稳定繁荣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首先,吴奕新在书中论证了“一国两制”是香港稳定的基础。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保持香港“九七”回归祖国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且“五十年不变”。这一构想

的实施,从以下几方面有利于香港的稳定:

①)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社会稳定;②)有利于香港的人心稳定;③)有利于保持中英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④)有利于保持香港同国际间的经贸合作;⑤)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

吴奕新在书中还提出了保持香港长期稳定的对策。他认为,香港回归祖国后,保持香港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保持香港持续繁荣的前提条件。保持香港社会的长期稳定,必须重视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依靠港人治港。这包括:①)维护现行的香港公务员及其架构;②)充分发挥香港公务员的作用;③)坚持循序渐进创造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政制;④)克服“左”的思想影响。

二是积极稳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这包括:①)增强香港经济竞争力,解决香港就业问题;②)解决住房问题;③)改善医疗保健系统及现行医疗制度;④)加快中小学校的校舍建设。

三是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其次,吴奕新在书中论证了“一国两制”是香港繁荣的保障。

作者认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与其自身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政策优势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回归后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将继续实行自由港和自由经济政策,保持全球最少税种和最低税率的优势,并有强大的祖国作为经济后盾,其经济将继续保持繁荣,其经济发展主流不会逆转。

作者还在书中提出了保持香港经济繁荣的策略,就是保持优势、再创优势和强化优势。

在目前众多的有关香港问题的研究著作中,吴奕新的《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稳定繁荣》可谓独树一帜,在理论上、研究领域上均有所突破。随着香港的顺利回归,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由构想成为我国政府的基本国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动指南,并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如何保持香港回归后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如何继续保持香港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和优势,继续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更好地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已成了香港同胞、全国人民、海外侨胞、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作者选择了“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稳定繁荣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在研究“一国两制”的理论意义的同时,重点结合港情进行研究。该书结合香港的历史、过渡期的特殊背景及回归后的稳定和繁荣,分析和探讨了“一国两制”提出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以及实施这一基本国策的必然性。

二、在对香港过渡时期研究的同时,也重点研究香港回归祖国后的香港未来发展,提出了保持香港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对策,以及香港回归后的机遇和挑战。

三、在研究香港回归后的经济繁荣问题的同时,也对香港回归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各种关系进行了研究。像“一国两制”下香港若干社会关系分析,包括香港特区的社会内部关系、香港特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香港特区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等,还对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关系进行了专题探讨。

作者丘克军,广东经济出版社(510070)  
责任编辑:冯生

#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

□白 云

史学批评,是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包括对史学现象与史学思潮、史家与史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本身的反思与审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领域。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作一概要勾勒,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并对推动史学批评研究有所助益。

## 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萌芽:先秦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及史学批评的萌芽创始时期,开山之祖是孔子。《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攻卫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对史官及其书法的评判。孔子评价“六经”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礼》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sup>①</sup>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史籍的评论。孔子整理过“六经”,其中《春秋》最能体现孔子的微言大义,又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因此倍受人们重视,学习、研究、传释、评

论《春秋》蔚然成风,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发展,如:左丘明评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辞。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sup>②</sup>“《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sup>③</sup>其后孟子提出要从事、文、义等范畴把握《春秋》,“晋之《乘》、楚之《铸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sup>④</sup>还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sup>⑤</sup>这从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家撰史的社会目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后世评论《春秋》的基本走向。

从孔子言论和《春秋》、左丘明《左传》和孟子言论中,大致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人们的史学意识,“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滋生史学批评的思想”。<sup>⑥</sup>当然,先秦史学批评还仅是些只言片语的无意识活动,尚处于萌芽状态之中,其特点和成就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史学功用上,提出了“鉴戒得失”、“惩恶劝善”、“施政治国”、“修身养德”的观点。

二是在史家修养上提出了“书法不隐”、“博学多识”的基本要求。对史家提出“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要求,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把“博学多识”视为“良史”之

基本要求。

三是在史书编撰上,提出了“事、文、义”的基本要素。“事”指撰史之前要收集材料、弄清基本史实。“文”是指撰史时的文字表达要求,文质论成为了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义”是撰史的指导思想 and 原则,为史著之灵魂,孔孟尤为重视,他们都把理论观点视为历史撰述的核心,所以,章学诚说:“史所贵者,义也”。<sup>⑦</sup>

总之,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还处于萌芽状态之中,还不具备独立意识。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成就和特点,却明显地影响了后世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和特点,某些概念和范畴甚至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始终。

## 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定:两汉

两汉时期,《史记》、《汉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也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发展,并促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两汉最终确立起来。

综观两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就和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史学批评独立意识日渐增强。司马谈撰有《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学术作了概要性总结,他的史学批评已掺杂了一定的自觉意识,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特征,奠定了此后学术评论和分类的基础。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意识较其父更明朗,他在回答上大夫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对《春秋》主旨和特征作了全面的阐释,并表明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撰写《史记》的原因、经过、体例、观点也都作了阐发,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

司马迁之后,刘向、刘歆父子奉命典校秘府藏书,每校毕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要指,录而奏之”,<sup>⑧</sup>分别编成了《别录》和《七略》,内容包括:介绍评论作者、思想要旨、学术流别以及校订说明,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的史学批评文献。

真正具有初步通论意识的史学批评专

文,当推东汉班彪所撰《史记后论》。文中充分肯定了《史记》在中国学史上的地位,又认为《史记》有“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及“条例不经”、“刊落不尽”等缺陷,<sup>⑨</sup>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以史学为研究对象和评论对象的专文,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正式确立。

班彪之子班固,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班彪的史学批评意识,撰成不朽史著《汉书》,对古代史学进行了多次总结、回顾和评议,尤其《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序”叙述历代史籍撰述、流传情况,肯定了孔子、左丘明的史学贡献,发展了目录题解式的史学批评。《司马迁传》专为史家司马迁立传评论,特别是在“赞”中对司马迁的史学进行了集中的评议,开创了传赞式的史学批评,谓《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sup>⑩</sup>是中国古代“实录崇《史记》”的评判标尺产生的源头。

第二,史学批评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加深拓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论史学性质作用的深化。司马谈提出史官要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是对先秦“惩恶劝善”的具体化和深化。司马迁提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识见。东汉刘毅提出以史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以史配合施政的主张。<sup>⑪</sup>荀悦更是全面论证了史学的政治作用,把史学与封建政治系统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将封建史学和“赏罚”、“法教”结合起来,前无古人。《汉纪》认为史学中蕴含着治国纲要和政治方略,因此提出“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sup>⑫</sup>把完善修史制度视为辅助朝政的工具。

二是对史学正统观的强化。先秦之时,儒学对史学批评影响极大,但尚未形成严格的封建正统史学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封建正统思想日益控制了史学。司马迁强调《春秋》的主旨是“明道”,

《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阐明了《史记》“五体”的立意，正符合封建国家等级结构，体现了封建正统史学观的端倪。班固把贯通五经义旨作为《汉书》的编写方针，而且在《汉书·艺文志》中首列儒家经典（六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儒家代表人物分列于上圣、上位，反映了班固具有较强烈的封建正统史学观。可见，从司马迁开始，中经班固的发展，封建正统史学观在不断加强，对史学批评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是关于史家和著史态度。两汉史学批评，已经把对史家及其著史态度的评价由先秦孔子的“书法不隐”为“良史”说，发展为“实录”、“文直事核”为“良史之材”说，成为后世史学批评所沿用的基本概念，确立起“实录崇《史记》”的史学批评标尺。

四是关于史学内容体例、编纂原则。司马迁《史记》始以“自序”的形式来阐明本书内容体例和编纂方法等，为史学批评开创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班固《汉书》承迁而作，也用“序”的形式来论本书、评前代史学研究的得失，后世史家竞相仿效，大大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发展。特别是东汉荀悦，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史书的编纂原则，说“失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sup>⑬</sup>荀悦还首次提出了史书选录史事的“十六条”标准，曰：“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介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sup>⑭</sup>毫无疑问，荀悦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有功之臣。

综上，两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获得了长足发展，史学批评已经由先秦的无意识状态进入了有自觉意识的状态，已经由先秦只言片语的批评发展到了有专篇专文的通论性质的批评，史学批评的形式在不断发展和日渐丰富，史学批评的深度和广度较先秦有显著加深和拓展，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规模已初步具备，为后世史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获得了飞跃发展，史学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处境，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得了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这一切推动了史学批评不断向前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西晋的傅玄、杜预、张辅、东晋的干宝、南梁的刘勰等都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张辅《论班马之优劣》一文首次从史著文辞的烦与约、采撰的去与就、褒贬的得与失、体例的创与循、文采的华与实等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作了比较评析，拓展了史学批评的视野，丰富了史学批评的范畴，强化了比较法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东晋干宝突破了过去评论《左传》重在肯定其解“经”功用的局限，开始推崇《左传》文辞简炼，从此逐步确立了“简要宗《左传》”这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标尺。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史评作品，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批评思想，包括论史学功用的“端正世风说”和“彰明制度说”；论著史态度的“文疑则阙”和“析理居正”说；论史著编撰的三步走；论史学评论的比较归纳法，并概评了历代史家和史著等等，提出了“彰善贬恶，直归南董”、“析理居正，文疑则阙”、“宗经矩圣，复古开新”、“善恶偕总，腾褒载贬”、“辞尚体要，务去浮风”等重要论点。<sup>⑮</sup>还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古代“是非据《春秋》”的史学批评标尺。刘勰堪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大师。

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两大特点和成就：

第一，史学批评形式多样化。

1. 专著。如晋人何琦《论三国志》九卷，王涛《三国志叙评》三卷，刘宝《汉书驳议》二卷，徐众《三国志评》等。<sup>⑯</sup>

2. 专文。其中有专门讨论某一专题的史学批评论文，如张辅的《班马优劣论》；有综论性质的史学批评专篇论文，如刘勰《文

心雕龙·史传》篇等。

3. 序录。序录始于两汉迁、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为习用,序录一般论及撰述原由、本书内容、观点、体例,甚至著者生平、经历等,是值得珍视的史学批评材料。如:三国韦昭《国语解叙》,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以及北魏酈道元为《水经》作注等。纪传体史书中的“序录”更是篇幅大内容多,值得重视。

4. 论赞。即正史的史家传后所附的论赞,是对史家传主的分析和评价,表达了许多史学批评见解,如:范曄《后汉书·班固传》后有一论一赞,对司马迁和班氏父子进行了比较评论,观点鲜明、见解独到。

5. 奏表。由于史学地位的上升和史学影响的扩大,一些大臣在章奏疏表中常有谈到对史学的看法、对本朝修史的意见、对某些史官、史家及史著的评论等。史官和史家的表文,更是集中表达了史学意见、观点,是值得重视的重要的史评材料。

6. 史注。即史注式的史学批评,始创于南宋裴松之,他于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受诏为陈寿《三国志》作注,打破了以往为史书作注侧重于音义、名物、地理、典故等诠释的局面,开始注重史事的增补、史实的考辨、史家的评论、史书的总结以及见解的发表等等,蕴含着裴氏丰富的史学批评见解,推动了史注和史学批评的发展。

第二,史学批评内容趋于系统化。主要表现是:

1. 评论史学的性质功用更深入。所谓“失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宏敷王道”<sup>①7</sup>“彰善贬恶,树之风声”,“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sup>①8</sup>等等。

2. 评论史学研究的范围更广阔。此时期在原有史学批评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地志的研究评论、关于谱学的研究评论、关于佛教的研究评论等等。

3. 评论史家更深微。有综论史家标准、著史态度的;有专论某一特定史家的著史态

度、治史特点的。甚至由评论史家而追至评论史学世家,由评论史家的著史态度进而考察撰史中的“虚妄”问题等等,都是史学批评进步的表现。尤其对孔子、司马迁、班固等史家的评论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全面。

4. 评论史书更全面。一方面是对史书的评论增多,评论的自觉性目的性增强;另一方面是考察史书的角度增多,评论新颖。尤其是关于史书的文辞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受到了普遍注意,对辞与义、文与质、华与美等问题都有所探讨;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体例的探讨不断加强,多是史家以“序”的方式在书中说明自己的撰写方法、体例、并兼评前人著作方法体例之得失等。尤需提及的是杜预较早对《春秋》、《左传》的书法体例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探讨,于《春秋》,指出有“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淤,惩恶而劝善(此本于《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对《左传》,则提出“发凡言例”、“起新变例”、“归趣非例”之说,并作了具体阐发,在史学批评史上影响很大。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熟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历经先秦的萌发、两汉的确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获得了巨大发展,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已经逐步形成,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贍重《汉书》这四大批评标尺已经逐步确立,为隋唐以后史学批评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

#### 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繁荣兴盛:隋唐宋元明清

隋唐以来,随着史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出现了官修史书制度化、修史程式化的格局,使越来越多的史家、学者将史学兴趣转移到对传统史学的总结和反思之上,带来了史学批评的春天,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步入了繁荣兴盛时期。一方面史学批评名家辈出、论著层出不穷,刘知几、柳冕、杜佑、皇甫湜、柳宗元、王钦若、欧阳修、曾巩、司马

光、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王鸣盛、纪昀、章学诚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名家，都为史学批评作出过重要贡献。刘知几《史通》、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总序》、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王夫之《读通鉴论》、章学诚《文史通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名著。

另一方面“史评”类目正式确立。“史评”一词始见于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之前在梁昭明太子萧统《昭明文选》中立有“史论”一目，收入九篇史论。晁公武首立“史评”类目，树立了史学批评的楷模，由此而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叙”云：“《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而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鹭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翻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阐明了“史评”的概念和所包括的内容，分析了史学批评著作少的根本原因。表明此时人们已开始从理论高度去认识史学批评活动和总结史学批评的成果。

随唐宋元明清时期，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史学批评的系统理论体系，规范了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现以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大家及其代表为例略作剖析。

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成就包括史学方法、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家修养、史学源流、修史常识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总结和评论。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

第一，详细论列了史籍体例。刘知几在《史通》的“六家”、“二体”、“本纪”、“世家”、

“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题目”、“断限”、“称谓”、“载文”、“书事”诸篇，对唐以前的各种史体进行了总体把握，尤其是对当时最流行的纪传体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判，得出“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提出“失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序例》）。

第二，全面论述了历史编纂学。在“编次”、“采撰”、“叙事”、“浮辞”、“模拟”、“言语”、“人物”、“杂述”、“烦省”诸篇中，刘知几论述了一系列的史学方法，自成体系，见解独具。

第三，提出了史家应具备的史学修养和作史态度。在“直书”、“曲笔”、“鉴识”、“核才”、“辨职”、“忤时”诸篇，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家的必备条件，即“史学三长”论：史才、史学、史识，并深刻论证了三者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

第四，论述了史学的功用。在“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尤其是在“辨职”中，刘知几提出了史学的三大功用，即“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编次勒成，郁为不朽”、“高才博学，各重一时”，充分显示了刘知几的史学价值观。

在《史通》中，刘知几还着重论列和提出了文与质、文与史、直与曲、简与烦、创与循、名与实等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刘知几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批评家。《史通》的问世，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郑樵的史学批评思想集中体现在《通志·总序》中，他推崇“会通”，扬史迁而贬班固；倡导直笔实录，憎恨任意褒贬，提出史家必须“平心直道”。此外，郑樵还着重提出并亲自实践了考信传疑、区分类例、核实索象、考镜源流等许多历史编纂方法，对当时及后世史学界均影响至深。

王夫之也是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大家，其思想在《读通鉴论》的四篇《叙论》中有较集中的反映。王夫之认为史学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即史学研究应该关注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



得失经验,以启迪后人。在史书编撰上,他主张“直笔求实”和“言、义、事”相结合,认为这是史学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保证(《叙论》三)。王夫之还提出了史学批评的十二字原则,即“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叙论》二)。十二字原则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又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能与刘知几相提并论的史学批评大师是清代的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校讎通义》,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均有重大建树。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史学批评史上的杰出贡献主要表现为:

第一,扩大了史学范围。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易教上》),甚至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报孙渊如书》)。

第二,提出了“文德”作为史学批评的方法论原则。即“临文必敬”、“论古必恕”,要求“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认为“不知古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文德》)。换言之,就是要求史学批评要历史地、逻辑地对待史家及其史著,考虑史家及其史著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史家个人际遇的影响,做到“知人论世,知势论人”。这是对王夫之“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十二字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提出了“史德”作为史家必备的重要条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德者何谓?著书之心术也”(《史德》)。他认为史家修史必须“心术”纯正,“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否则“心术”不正,才、学、识再高也难以写出“信史”。“繁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史德》)。

第四,提出了“史法”与“史意”的区别,并推重“史意”。他认为:“史法”探讨历史撰述之形式和内容,而“史意”探讨历史撰述中的思想,突出史学著作的个性和史学主体意识。章学诚强调“史意”,特别重视史家的“心裁别识”,“独断于一心”,认为:“世士以

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谓史学,则未之闻矣”;“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有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

第五,提出了“撰述”与“记注”的区别,并将古今史著按性质和作用区分为撰述(独断之学)和记注(资料汇编)两大类。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最后一位大师。此后不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特别是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传入,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史学批评在内的传统史学走向了终结,中国史学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

① 《礼记·经解》。

②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③ 《左传·成公十四年》。

④ 《孟子·离娄下》。

⑤ 《孟子·滕文公下》。

⑥ 瞿林东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页。

⑦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⑧ 班固《汉书·艺文志序》。

⑨ 范曄《后汉书·班彪传》。

⑩ 《汉书·司马迁传赞》。

⑪ 《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国史部·记注》。

⑫ 《后汉书·荀淑传附荀悦传》。

⑬ 荀悦《汉纪》卷一。

⑭ 《汉纪·序》。

⑮⑯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⑰ 参见《隋书·经籍志》。

⑱ 袁宏《后汉纪·序》。

作者白云,云南省蒙自师专历史系副教授 661100)

责任编辑:郭秀文

# 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

## 成就与影响

□蒋祖缘

清初实行海禁政策,广州的对外贸易曾一度陷于停顿。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粤海关,允许开海贸易。从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这150多年间,设在广州西关的十三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独揽了广州的外贸,还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只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贸易的80余年间,总揽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十三行成为我国独特的商贸团体,西关成为我国唯一合法的外贸区。

明初,广州的对外贸易大多只与亚洲南洋诸国和地区进行,明中期开始才有与西方国家葡萄牙的贸易。清代转向以西方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我国外贸史上一大显著变化,在文化交流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本文试就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及其影响作些探讨。

### 一、行商的文化素质

广州和广州西关在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人们比较开阔的视野、识见和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十三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具有良好的环境。而行商本身也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在商务活动中还刻苦自学,不忘充实,更便于他们开展商务活动。

关于行商的文化素质,尽管难窥其全貌,但从一些记载中可见一斑。如潘振承在没有充任行商之前,曾往返马尼拉(在今菲律宾)三次,贩运丝茶,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还“在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①后开设同文洋行。行商是子承父业(出于某种原因除外)。潘振承之子潘有度有《松堂遗稿》,自然不乏文化修养。有度之子正炜,“幼勤学,善书法”,尤精于小楷,入县学为“附贡

生”,②后顶替其父为同文行行商。又如天宝行行商梁经国,原系“冯氏洋行伙伴,因得冯氏信任,遂充当司事”,且“以行务托之者十余年”,③后自设行承商。他每天稍有空闲,便读古人格言和地理、医学诸书。其子纶枢,“少读书,深自刻苦,年二十补县学生”。④迨后经国年老多病,便由他接办行务。纶枢之兄纶勋,“敏悟好学”,弟同新还由举人成进士。又如怡和行商伍秉鉴,“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货利枢机者数十年”。其子荣曜,入校读书,为县廩生,⑤后继父业,充怡和行商。再如张殿铨,年稍长,由曾伯祖(任广州故衣街瑞成、达亨两洋货店经理)“挈之学习,即留心洋务”。同孚茶行“闻其名罗致而倚任之”。他还与皖、浙茶商共同研习制茶技术,并由他发明一种新的制茶法,使皖、浙茶倍有名声。此后“在城西十三行自设隆记茶行”。⑥其子凤华,“少承父业”,尤重发展桑蚕,“箸有种园植树等书”。这些记载表明一些行商原来就是儒学生员、贡生,或者是在商务活动中学习文化,并通晓外国语。

行商的文化素质,不限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而是从时代与商务的需要,兼收并蓄,吸纳融合,使之更能贴近现实与生活。因此,他们有与外商打交道的本领,并注重商品信息,重视商业信用,还能根据外贸市场的需求与变化,求新,求美,以扩大商品出口与增加新品种。为此,行商还在广州河南创办了“附属于洋行的瓷器彩绘作坊”,“每个彩绘作坊大约有80到100名工匠,其中有年老而技艺卓绝的技师”。⑦继而又由茶商在广州河南创建手工制茶工场,生产有花香味的薰花茶新品种。还有行商

在番禺“批筑田地数百顷”，种桑养蚕，“同时并举”，<sup>⑧</sup>以扩大生丝出口，从而在对外贸易中开创了一种贸工结合的新形式。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是随着商业的交往而开展的。行商的文化素质和具体的环境与条件，使他们在从事商务活动的同时，重视和有能力吸纳西方文化。

当然，他们的文化素质毕竟受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制约，有着中国封建社会商人文化素质的一些突出弱点，但它已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 二、吸纳西方文化

商业贸易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伴随西方商船而来的还有艺术家、科学家、传教士、医生。这些人或者出于商业的需要，或者慕名前来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和了解民情风俗，或者出于传教，或者披着宗教的外衣，搜集情报和实现文化侵略。他们有的住在澳门，平时来往于澳门与广州西关；有的居住在外商住的十三商馆（当时称十三夷馆）。他们还可以游览规定的游览区。因此，行商也不乏机会吸纳西方文化。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方面：

### 1、西方语文

行商为了便于开展商贸业务，不仅自己学习西方语文，而且一些佐理人员也需要学习，并有专门从事语言文字的翻译。通过这些人 和广州人及西方人的接触，使更多的广州人懂得了西方的语言文字，就连广州河南 附属于行商的瓷器彩绘作坊的画工、匠师们也能正确书写英、法等国的字母和名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广东英语”，这“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sup>⑨</sup>尽管这种“广东英语”在初创时还不成熟，但毕竟是“交际媒介”的工具。

又由于行商拥有从事翻译的人，所以连朝廷接到有关的外国公文也交行商派人译出。如嘉庆年间，英国政府派官员到北京呈递公文，清政府命洋商译出汉文。也是在嘉庆年间，英国贡船已抵天津，嘉庆皇帝催令洋商赶快选派熟悉英语的翻译生二人，兼程赶赴京城礼部衙门报到，“以备翻译之用。”

<sup>⑩</sup>就连道光二年（1822），两广总督阮元收到英国大班用英文书写的公文，同样也要交行商通事译出。这种具有翻译能力的人，自然不限于行商的翻译人员。因此，道光十九年（1839），当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决定在广州设立译馆，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籍、报刊的时候，并没有在物色翻译人员时捉襟见肘。

### 2、绘画

行商在这方面的突出功绩，就是把传来的欧洲绘画，诸如素描、水彩画、铜版面、肖像画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的出口瓷器上。他们在广州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雇请一批画工和画匠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并请西方艺术家给予指导，在景德镇运来的素胎瓷器上装饰欧洲的绘画，开炉烘染，制成彩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广彩”。因瓷器彩绘作坊设在珠江南岸之河南，所以又称河南彩。嘉庆、道光间最为盛行。

行商因业务需要而造就了一批从事西方绘画艺术的人才，同时西方绘画的传入，也影响另一些人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丰富了不同风格的绘画。特别是嘉庆年间，南海人关作霖“附海舶遍游欧美各国，喜见油相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sup>⑪</sup>他成为我国赴欧美学习油画的第一人。

### 3、医学

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是英国医生的发明。嘉庆十年（1805），英国商人将此方携至粤。行商郑崇谦将它翻译成中文，命名为《种痘奇书》予以刊出。这是我国最早译出西方种痘术的医学著作。但是，这一新生事物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敢贸然相信，不让儿童接种牛痘，于是“其种遂失传”。嘉庆十五年（1810），“蕃商刺佛复由小吕宋载小儿传其种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卢欢恒，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属邱、谭二人传种之，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以资，活婴无算。”<sup>⑫</sup>这种既不勉强别人而又积极推广的做法，使愿意接受种牛痘的人愈来愈多。邱熹还根据自己接种牛痘的经验，撰写成《引痘略》一卷。该书有嘉庆二十二年

刊本,道光九年重刊本,同治元年重刊本。

道光十五年(1835),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创办一所“眼科医局”,由行商伍怡和等在新豆栏街租部分房间作为医院。这表明伯驾办的眼科医院,得到行商的支持。这是广州最早的眼科医院,也是广州人学习西方医术之始。

#### 4、仿制欧美船只和水雷

广州人民对英商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深为愤懑。清朝政府也多次下令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商人不仅没有改弦易辙,反而由英国政府出面用武力保护英商的鸦片走私,并对中国进行战争恫吓和武装挑衅。因此,水师提督关天培在道光十五年(1835)初,就准备在虎门要塞添铸大炮40门,增修炮台,修理垛墙和铸造炮子,共需银52000两,由行商认捐。<sup>⑬</sup>尽管有极少数的行商对西方鸦片商走私鸦片有“徇隐”不举报甚至参与走私的不法行为,但多数行商则是从事正常对外贸易,而当关天培筹建虎门海防工程时,多数行商便有认捐义举。

道光十九年(1839)春,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又得到多数行商的积极支持。林则徐等上奏说:“广东查办鸦片,驱逐夷船,亟应筹措经费。现据洋商伍绍荣等呈请,将茶叶一项应得行用银两,捐缴三年。按卯解库,听候提用……。”<sup>⑭</sup>在筹集经费的同时,林则徐出于备战的需要,还下令仿造西方的夹板船,并全力抗击英军的入侵。

虽然林则徐在第二年便被道光皇帝撤职,但是一些行商还是继续捐资制造洋枪、洋火药和修建炮台,特别是看到英国侵略军舰坚炮利和可能受到林则徐仿造夹板船的启示,他们更重视购买、仿制英美兵船和仿制破坏兵船的水雷,冀图改变广东水师的装备,增强作战能力。

例一,洋商伍敦元购买美利坚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驾驶灵便。”<sup>⑮</sup>这两艘似均为夹板船。

例二,潘仕成“自觅良匠,照战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监制战船一只,船底船身,用铜铁包裹,布列炮眼,作为样式,以期坚固。”<sup>⑯</sup>潘仕成制成的这艘战船,似亦为夹板船,

经试验“足以御敌”。于是道光皇帝一方面命祁埏等将此船拨归水师旗营,交提督吴建勋督饬水师认真操练;另一方面又规定以后制造船只,即由潘仕成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插手,仍致草率偷减。”<sup>⑰</sup>另外,他还“仿照美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只。”

上述三行商购买、仿制的夹板船是在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41~1842)间。这是我国最早购买和仿制外国夹板船的一大创举,且能仿照西方国家的兵船,自行绘制图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些行商购买、仿制夹板船的同时,行商潘世荣已在“雇觅夷匠”仿制火轮船(即蒸汽轮船)。潘世荣在鸦片战争中,曾与义勇陈棠、吴濯泉等在附城左近擒斩英军“大兵头一名”,<sup>⑱</sup>又捐银二万余两购制枪械和修筑炮台,<sup>⑲</sup>继又寻求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但此事被道光皇帝扼杀在摇篮中。

此外,潘仕成还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捐资雇觅美利坚国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药,制造水雷。”历时九个月,水雷制造成功。经广东官府派员在珠江河面反复演试,“计时入水半刻许,水雷即行轰起水面二丈有奇。又于坚重木排之下试加演放,木排亦被轰断碎,似颇得力。”<sup>⑳</sup>潘仕成雇请美国人制造水雷的时候,还派有生员李光铨等跟他学习,并掌握了制造水雷的技术。试演成功之后,潘仕成便缮绘《水雷图说》一册和将已制好的水雷20具,由李光铨等送往京城。后由天津方面试演,亦是轰击有力,但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认为,没有人能将水雷送入船底,“亦未见为适用”,又暂搁下来。

仿制火轮船和水雷,不仅是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更是最早在行动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体现出他们的爱国热忱。

#### 三、产生的影响

行商吸收的西方文化,并没有局限在广州西关,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广东和全国不少地方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光八年(1828),潘仕成在自置的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闾邑会馆设牛痘局,由广东人余心谷负责牛痘接种工作。北京的医生

争相学习此项技术,互相推广,然后扩展到全国各地。①有些精通天文、历法、数学或医学的传教士经广州西关而进入内地的亦不乏其人。如巴新修士精医术,于乾隆三十三年(1765)进入广州,粤督不许逗留,但京师的传教士已闻讯,碰巧乾隆皇帝第五子患病,“征教士以西法治,西士乃以巴新进于帝。”②最后还是把他召入京师,在宫廷内供职,直至他去世。

西方的绘画作品通过广州西关而流传到景德镇,西方画家也有从广州西关进入景德镇的,这对景德镇的瓷器也产生了影响。中国的一些画家也在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此外,西方式的建筑,也从十三行的房屋“结构与洋画同”流传到内地各省许多地方,如扬州的建筑亦“效其制”。③此外,“广东英语”在鸦片战争后,亦流行于上海的洋泾浜,并称之为“洋泾浜英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行商仿制火轮船和水雷这一创举所产生的影响尤为重大。如魏源在《海国图志》里谈到“议守”之策说:“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击之。”④是克敌制胜的办法之一。在谈到“议战”时,他更提出“宜师夷长技以制夷”,⑤并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他主张在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建造船厂和火器局各一所,请美国、法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舵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为了说明按外国船式样造船所费并不太多,他还举例:“现在广东义士,请弥利坚人造二桅兵船,果仅费银万九千两。”魏源所谈按外国船式造船,包括夹板船和火轮船。可以说,十三行行商仿制西方夹板船、火轮船和水雷,不仅引起了魏源的关注和重视,而且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理论的提出,是在总结了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广州的行商的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些,就不难看出广州西关无形文化的作用,那就是解除人们的思想禁锢,促进人们的观念更新。如道光《广东通志》的编者在《物产》栏介绍西

方国家生产的自鸣钟、风琴、玻璃镜、千里镜等多种产品之后,加了这样的按语:“大西洋设奇器科取士,所以器用精巧,不可殚述。”这个按语已经初步触及到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反映出广东一些有识之士已萌发出对中国旧的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的怀疑与动摇,及对西方教育制度和取才之法的赞赏。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有识之士已看出英国水军具有船坚炮利的优势。于是魏源在《海国图志》里就说:清政府取武生、武举人、武进士的考试,只有专试弓马技勇的陆师科,没有水师科,而“西洋则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因此,他认为“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船火轮船,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这比道光二年(1822)《广东通志》所说的“大西洋设奇器科取士”,但还没有涉及到西洋的船炮和没有提出设水师科取士这方面来说,魏源的主张确是有了进步。

正是由于观念更新,广东一些读书人和学者的学风也在开始丕变。邹伯奇在鸦片战争前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已有较好的造诣,因而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中国第一部摄影机,咸丰四年(1854)再制成天球仪,成为近代广东第一位科学家。著名的学者朱次琦、陈澧都倡导经世致用,而他们的学生也受到这种主张的熏陶,对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鸦片战争前广东人的观念更新,还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掀起较大的波澜。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一次又一次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丧权辱国,一些志士才深感必须图新图变。

---

①③⑤⑩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94页,229页,235页,270-271页。

②④⑧民国《番禺县续志》卷十九,卷二十一。

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87页。

⑦朱培初编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第114页。

# 抗战时期孤岛的社会动态

□ 魏宏运

上海旧称十里洋场,是外国人心目中的“冒险家乐园”。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英法租界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英法租界,孤岛不复存在。孤岛这个词,不知何人首先提出,从华军撤退后,就广泛使用起来,报纸上经常出现孤岛通讯、孤岛杂讯、孤岛见闻、孤岛文化、孤岛教育、孤岛遐想、孤岛天堂等标题。人们在通信和文章中,也使用这个词。

租界向来被视为永远安全的乐土。事实上,既不安全,也不是乐土。

租界当局宣称自己是中立的,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顺从日本的意旨。对日本的各种要求,虽也有所不满,但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

1937年11月13日,英文《泰晤士报》就刊出租界工部局总裁费信的谈话说,“工部局当以全力维护租界之中立地位;同时,吾人亦须将激烈团体使之入优美之秩序,其中尤以各种反日宣传品为尤甚”。随后工部局发出布告说,凡是妨害武装军队(指日军)的人,都要移交给被妨害的武装军队,以此来保护日军的横行,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文化界是日军首先注意的对象。日军曾开出40余人的黑名单,要工部局加以逮捕。工部局屈从日方,屡次警告华文报纸,称此时此地不应刺激日人过甚,否则将给予停刊一星期或一个月,乃至吊销执照处分。

1937年12月13日晚,日方报道部即直接发出通知,一方面,从12月15日起,未

⑨(美)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46页。

⑩道光《南海县志》卷四十四。

⑪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一。

⑬⑭⑮⑰《宣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五,卷三百三十四,卷三百八十三,卷三百八十一。

⑯⑰⑱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第249-250页,107页,262页,195-196页。

⑲黄启臣:《痘的西传与牛痘的东渐》,载《岭峤春秋》论文集(二)。

⑳㉑方豪:《中西交通史》(四),第127-128页,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㉒㉓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

作者蒋祖缘,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郭秀文

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许刊登；另一方面，各报要与检查所合作，替日方推行新闻政策。上海日报公会接到通知，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一致决定不送报去日方检查，如果因此而被施加压力，便一致停刊对付之。《大公报》、《申报》于12月15日毅然停刊，移其事业于内地。《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停刊了。浦东出版的《新浦东》、《浦东星报》、《浦东评论》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大公报》在最后一天发表了停刊宣言，题为《暂别上海读者》，全文正气凛然，其中讲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上不允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称是我们为上海三百万同胞服务到了暂时的最后一天。……”<sup>①</sup>可是，《新闻报》、《时报》破坏了日报公会的决议案，每天送两份报纸去接受检查。该报的进步记者陆诒在“八一三”后就脱离该报，赴前线采访；老编辑郭步陶等愤而辞职，宁愿失业而保持了民族气节。而该报经理汪伯奇兄弟二人，却认为各报停刊，《新闻报》独出可以盈利百倍。但是，《新闻报》却为人们所唾弃，由销数6万余份骤降为3万份左右。1938年1月28日，该报馆还尝到了炸弹的警告。

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及其驻上海总领事三浦访问工部局时，向总董樊克令提出，要肃清公共租界内的抗日分子，扩充工部局日警势力，在租界内实行大检查。日军还要求搜查各书局，禁止升中华民国国旗，保护汉奸组织等。这些工部局都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工部局特别探员、政治探员会同日方便衣队人员10余人，分头在四马路各书店及杂志公司搜阅各种书籍。上海杂志公司等店代售《日本间谍》一书，全数被搜去，其它各种杂志则各取一二本。由谢晋元率领的四行孤军撤至租界时原先租界答应停留十日左右，但后来对其加以种种限制，等于扣留起来。孤军400余人每天坚持高升国旗，英国人带着几卡车白俄巡警，包围营房，冲进升旗现场，要将旗杆锯掉，双方展开搏斗，互有伤亡，但国旗从此不能升了。至于汉奸组织则利用租界为据点大摇大摆地展

开他们的卖国活动。

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包围，孤岛的生活也很困难，吃和住成了最大的问题。“八一三”之后，四方人口麇集于租界，外埠沦陷区的商人，亦多来沪开设新店。后来犹太人在欧洲遭到希特勒迫害，也移民于此。这使孤岛人口骤增至420余万之众。原先空闲多年的房屋，这时都住满了人。新涌进来的江浙难民，许多人就露宿街头。房地产由此也热了起来。

由于缺米，米价大涨，贩运米粮的商家因此大发其财。而绝大多数人生活极为困难。许许多多的难民都是以上海为暂时的避难处。他们不从事任何一业的生产，因战争延长，他们的财力随着每天生活的支出，渐渐地拮据起来，最后的出路就是典当东西。上海的一般市民也都在穷困中挣扎着。他们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变卖，以维持生计。故孤岛的典当业畸形发展起来。1938年11月有350家当铺，日本人和俄国人也开设了几家当铺。

人们的正常生活脱离了轨道，一些反常现象出现了。租界内的旅馆业、饮食业、跳舞厅和其它娱乐场所特别繁荣，舞厅原来不过10家，猛然增到27家，其中22家在公共租界，其余在法租界。幻瓜在《今日上海》一文中讲：“电影院和舞场又兴旺起来，一部分的人们大概忘记了‘国难’两字了”。<sup>②</sup>京戏院的生意也好到了极点，越剧也是这时在孤岛崛起的。以电影院所公演的电影来说，荒谬的“神怪”、无稽的“鬼魂”、低级的淫欲，可以说占主导地位。舞场则通宵达旦，纸醉金迷，有青春少年，也有龙钟老者，蹀躞婆娑其中。

人们的思想是很混乱的，日本人、汉奸、亲日派大造谣言，散布中国必败的谬论。一些无耻的文人，也出来为敌人颂扬功德，如刘敏中的《平宋录》，公开为日军唱赞歌。也有的人抗战开始时曾站在抗战营垒，南京失守后，即摇身一变，为虎作伥。街头巷尾似乎都有政论家，他们发出许多奇想，有的已超出敌人的阴谋之上。要想对中日战争进程获得正确的了解已不可能。内地的报纸

刊物都是违禁品，一旦搜出，便凶多吉少。汉口出版的《大公报》和汉口、香港出版的《申报》，如进入孤岛，就成为珍品。人们小心翼翼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日本军部办了《新申报》，一切为日方张目；《生活日报》、《神州日报》、《鬲报》等报的基调是“宣传和亲善”，主张“亲善”，反对再作“无谓的牺牲”，以悲天悯人的腔调，唱着投降的曲子”。<sup>③</sup>唯一能报导真实情况的是英文《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因不受检查，销路大增。1937年12月22日，《大美晚报》揭发了日军在南京的兽行后，更是得到大众的拥护。隔了两天，《字林西报》也不得不登载了同样的消息，《泰晤士报》则始终一字不提。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1937年9月从陕北到达上海协助工作的刘长胜，很快恢复并重建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们二人在上海团结一切进步团体和个人，殚精竭虑地筹划如何积蓄力量，如何开展斗争。

文化思想方面是当时的主要阵地。由孙冶方领导的文委成立了，孙冶方和梅益、王任叔、林淡秋等研究如何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左联时期的梅益一直和上海进步的出版界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长姜椿芳1936年到达上海，也通过夏衍接上了组织关系。他们商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开办有自己的言论和新闻的公开报刊根本不可能，就决定把外国通讯社和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材料翻译出版，这样既可冲破新闻封锁，又可不负政治责任。经过短时间的筹备，《译报》在上海出现了。但

《译报》出版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停刊。他们又采取由英国人经营的方式，以英商孙特司、裴士的名义在租界登记，改名为《每日译报》于1938年1月21日继续出版。《每日译报》不是完全刊登译文的报纸，它有自己的社论、新闻、专稿，还有名为“大家谈”的副刊，王任叔为主编。还出版丛书，每旬出1册，每册约4万至6万字。如华北官僚群像、女战士丁玲、中国西北新社会、中共抗战战略检讨、托洛斯基派的国际活动等。毛泽

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两部书，也作为时论丛刊由其出版。因其宣传抗日，为日方所忌，屡遭敌伪掷弹警告。但该报报格坚贞，不为威武所屈，照常出版。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也创刊了。这是沪宁、沪杭两铁路局的一批职员创办的，带头的是江苏吴江人严宝礼。他们旗帜鲜明，报道了抗日战争的真实消息，不断抨击汉奸卖国贼的罪行，深得人民的拥护。特别是柯灵主持的副刊《世纪风》，唐弢、周黎庵、文载道、周木斋、巴人等为主要的作者，他们运用各种短小精悍的文艺形式，把投枪向日军袭去。<sup>④</sup>1938年10月10日，《申报》用美商哥伦比亚公司阿乐满名义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注册，也复刊了。复刊申明“仍以正义为依归，作中国人民之喉舌，并一本以往不屈之主张，与难苦环境相奋斗”。

1938年4月，梅益等以外商名义出版《导报》，重要新闻的标题排成红色，颇引人注目。

当时，华文报纸找一个外国人出面为报馆的老板，向工部局注册，改称英商或美商报就可以不受日方的检查，这是孤岛时期的特殊现象。日军曾向工部局提出，日文报也载出狂论，要求取缔洋商报纸，而报界不受恫吓。

具有爱国思想的报纸销路都很好，《新申报》、《神州日报》等汉奸报纸几乎无人过问。

到了1939年5月，租界当局和敌伪串通一气，以“宣传抗日，言论激烈”为由，扼杀了《文汇报》、《每日译报》、《导报》、《大美晚报》。此后，挂着美商招牌的报纸继续出版。它们是《申报》、《大美晚报》，还有一张由“CC”分子主办的《中美日报》，后来国民党地下市党部还创办了《证言报》。这几家报纸一直出版到孤岛沦陷。<sup>⑤</sup>

孤岛时期，内容比较充实而纯正的刊物有《华美周刊》、《现实报周刊》、《孤岛》、《西风月刊》、《青年学生》、《时代生活》、《青年大众》、《杂志》、《少年读物》等。胡愈之创办了一份刊物，名叫《集纳》，是摘译外国人的中文杂志，由国光印刷所出版。梅益创办了



《讨论丛刊》，由新知书店王益负责出版，第一期是从延安《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上选摘的。阿英和李之华创办的风雨书屋，编印出版《文献》月刊，举凡抗战建国、忠勇壮烈、国际动态、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群众运动、沦陷区域及汉奸傀儡等各种史料，搜集无遗。1938年10月10日创刊号的内容有，蒋介石抗战言论特辑、八路军朱德总指挥论第三期抗战及陕北抗战教育生活特辑、保卫大武汉、被牺牲之捷克、九月的沦陷区、甲午之战与中国文学，以及剧作家于伶的最近创作《花溅泪》等。风雨书屋还出版了《西行漫画》，这是黄镇在长征途中的25幅速写。巴人创办了《鲁迅风》。

在出版事业中，值得提出的一是1938年《鲁迅全集》的出版，一是翻译工作特别发达。每份报纸杂志，几乎都有翻译的作品。在有些刊物上，译文的质量很好，而单行本的书中，译本比一般的创作还要畅销。斯诺的《西行漫记》、勃脱兰的《华北战线》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是脍炙人口的；李健吾重译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也颇有现实意义。胡愈之组织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影响更大。

“八一三”抗战后，胡愈之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中成立了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任务是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了解，以及对中国的同情和友好。他因此结识了不少中外进步记者，其中一位就是伦敦《每日先驱报》在远东的首席记者埃德加·斯诺。1938年春，斯诺将其由伦敦戈兰茨公司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交给胡愈之。胡和王任叔、梅益以及他的两个弟弟胡仲持、胡学恕在两个月内翻译完成，用复社的名义出版。该书第一版印了1000册，很快售完，接着又印了几版，成为最畅销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影响极大。许许多多的人是读了这部书认识并崇拜中国共产党，从而走向革命的。

上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力量，留在孤岛的文化人，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活动。他们用联谊会、俱乐部、读书会、同学会等组织形

式，在租界内取得合法地位，成立了歌咏队、剧艺社、诗歌会，举办文化补习班、职业夜校、消费合作社、互助储金会、图书馆等，来灌输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觉悟和民族自尊心。如王任叔负责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在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鼓励爱国热情。中法联谊会戏剧组主办的上海剧艺社，演出吴祖光的《正气歌》，中旅上演魏如晦的《洪宣娇》，天风演出《恩与仇》（此剧原名《红粉喋血记》，是于伶原作，由吴琛改编）等等。这些话剧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抗日的大旗下，许多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都走上了抗战、团结、进步的道路。当时很活跃的一支力量是胡愈之组织的星期一聚餐会。它包括了各界爱国人士，文化界有刘湛恩、韦恂、郑振铎；新闻界有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工商界有陈己生、孙瑞璜、肖宗俊；海关有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银行界有徐新六、胡宗淇；宗教界有吴耀宗、沈华兰；妇女界有王国秀。当时，在工部局工作的陈鹤琴和严景耀，国难教育社的张宗麟，也是聚餐会的成员。他们每星期一聚会一次，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上海地方情况，研究如何开展地方工作，如何维持士气，增强抗战信心等问题。座谈会最初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主持，刘遇难后由胡愈之主持。

聚餐会解决了沦陷后的上海一部分青年学习问题，把原来李公朴在上海办的量才补习学校，改名为上海业余补习学校，推卢广绵为校长，招收中学程度的青年，还办了一些社会科学的夜大学，由梁士纯、郑振铎负责。

孤岛人民的斗争是多方面的。除了少数汉奸腴颜事仇以取荣禄，为日军铺道外，绝大多数人蔑视敌人。日军组织了所谓“大道政府”，但其“威信”所及，万民“摇头”。日报组织了一个市民协会，说是商办的。沪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教育会、农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各中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一二特区及沪南、闸北、沪东、沪西各区市民联合会留沪负责人员于1937年12月31日召开联席会议，一致认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劝

告全市人民勿与该组织合作，忠告报载的参加分子，责以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并成立了各团体联合办事处，与敌人进行斗争。1938年春，日伪企图“接管海关”，广大职员和海关上层人士一致反对，影响遍及租界，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护关、护邮、护院（法院）运动。日军以其侵略行为到处受阻，便从本国派遣了不少文化人士到上海，找他们旧日的中国同学，用极平淡的经济、政治、文化各学术部门的研究的名义，招致文化界名士，从而进行文化侵略的间谍工作。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陷入圈套。

在反对日伪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就是其中之一。抗战开始后，刘湛恩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理事和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积极从事救亡工作。1938年初，汉奸温宗尧为了拼凑“维新政府”，以“教育部长”为诱饵，拉刘下水，遭到严词拒绝。日伪恼羞成怒，指使暴徒将其杀害。许多报人经常接到恐吓信，并附有“人手”之类的“礼物”，但他们依然保持着民族气节，在自己的笔下放射出民族的朝气。上海当时许多除奸队出现了。北满抗日联军京沪特务团的组织曾发出通告。《大美晚报》说，“彼等决将南京伪共和政府领袖梁鸿志、温宗尧等汉奸处死，又主张继续抵抗日军”。⑥在诛杀了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录后，所有伪机关中之大小傀儡无不到处躲躲闪闪，慌慌张张，虽至亲好友间亦多不敢露面。有的爱国团体对那些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甘心附敌的奸商则予以严惩，如烧毁了公共租界法华路上的硝皮厂，因该厂主将货品卖与日人；对法租界协大祥棉布庄投掷炸弹，因该庄战

前以推销仇货改头换面为营业中心，战后为敌大量倾销，直接予敌以援助。

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成为抗战的一种动力。上海市《牧羊会》的成立宣言，也说明了这一事实：孤岛上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以及各地魔窟中的儿女们，我们目前的生活，固然万分惨苦，但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计，为了我们的子孙生存计，我们唯有艰苦忍耐，努力挣扎。苏武留胡十九年，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移，宁可在风雪中牧羊以全节，这是我们目前生活最好的榜样。因此，为纪念先烈这种全节不屈的精神，以鼓励我们继续奋斗的勇气计，我们乃有此牧羊会的组织。深望我们处于魔域中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大家携起手来，死力挣扎，挣扎以待光明的重临。”⑦宣言最后号召：决不出卖灵魂，去做为虎作伥的无耻汉奸，继续努力奋斗，来完成民族革命的大业。

孤岛中正直的中国人，没有迷失方向，他们心中充满着战斗的气概。

---

① 《大公报》1937年12月15日。

② 《大公报》，1938年1月21日。

③徐铸成：《报海旧闻》，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巴人杂文选》，第45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见徐铸成：《报海旧闻》，第272页。

⑥《申报》（香港），1938年4月2日。

⑦《申报》（香港），1938年3月11日。

作者魏宏运，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300071）

责任编辑：郭秀文

# 略论《司马法》的军事思想和历史地位

□徐 勇 黄朴民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之一，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对其主要内容及军事思想、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进行评价。

## 一、《司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军事思想

今本《司马法》虽然只有五篇，但其内容却弥足珍贵，反映了非常丰富的军事思想。

### 1、“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战争观

在战争问题上，《司马法》明确提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sup>①</sup>并进一步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sup>②</sup>《司马法》根据具体情况，将战争划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大类，指出正义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对这类战争应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司马法》提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sup>③</sup>我们认为，《司马法》这种既立足于“仁”、“义”，致力于避免战争，又正视战争存在的客观实际、肯定正义性战争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反映出该书在战争问题上的辩证认识和理论深度。

### 2、慎战与备战并重的国防思想

一味好战，到头来必定会自食苦果、走向失败，但是苟且偷安、懈怠战备将同样导致丧师辱国、葬送社稷。因此，如何处理好慎战与备战的关系，对于建设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司马法》对此问题作了十分精彩的回答：“敌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sup>④</sup>

### 3、把握军队自身特点的治军思想

《司马法》中有一句名言：“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sup>⑤</sup>围绕着这一认识，该书在把握军队建设自身特点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整套治军思想。其主要特点是，严格区分了治军与治国两者之间的差异，指出：“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sup>⑥</sup>因此，治国的一套方法不能用于治理军队，而治军的一套方法同样不适用于治理国家。

### 4、“相为轻重”的用兵方略

《司马法》认为，战争就是敌对双方兵力的较量：“敌战相为轻重。”<sup>⑦</sup>作为军事指挥家，一定要“筹以轻重”。<sup>⑧</sup>在具体的用兵方面，它强调遵循正确使用兵力的原则：“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sup>⑨</sup>这实际上就是集中兵力，以强击弱。《司马法》同时还提出，即使以优势兵力对付劣势之敌，也不能一次性投入全部兵力：“重进勿尽，几尽危。”<sup>⑩</sup>而应留有预备部队，机动应敌。

### 5、“智”、“勇”、“巧”三者结合的作战思想

对于战争中的指挥者，《司马法》提出了“智”、“勇”、“巧”三者有机结合的作战思想：“凡战，智也；斗，勇也；陈，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sup>⑪</sup>同时主张随机应变，因敌制胜：“舍谨甲兵，行慎行列，战谨进止。”<sup>⑫</sup>“因欲而事，蹈敌制地”。<sup>⑬</sup>它还强调示形动敌，观察敌情，掌握全局，从容应对，即“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sup>⑭</sup>《司马法》的这些作战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合理的意义。

### 6、以“六德”为核心的军事教育思想

《司马法》十分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sup>⑮</sup>在教育内容上，它主张简明扼要：“教极省。”<sup>⑯</sup>并提倡以“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为核心来教育和培养军队：“六德以时合教。”<sup>⑰</sup>《司马法》还要求将帅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谦，率则服。”<sup>⑱</sup>同时应该做到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将帅必须“无忘其众”，<sup>⑲</sup>荣辱与共。

### 7、改良武器装备的有关论述

《司马法》对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视，认为军队“以甲固，以兵胜”，<sup>⑳</sup>“甲以重固，兵以轻胜”；<sup>㉑</sup>指出如果注意改良武器装备，往往可以使己方的实力由弱转强：“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sup>㉒</sup>它特别强调当发现敌人使用新式兵器时，应尽快地仿效研制，以保证在

武器装备方面与敌至少达到平衡：“见物与侔，是谓两之。”<sup>②</sup>对于在作战中如何适宜地配置各种兵器，《司马法》中也有详细的阐述：“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sup>④</sup>指出各类兵器都有其不同的功用，不可替代。“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sup>⑤</sup>《司马法》关于改良武器装备的这些论述，为先秦其他兵书中所少见。

## 8、丰富多彩的古军礼内容

在《司马法》中，包含有数量可观的古军礼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军赋、军制、出师、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献捷、军中禁令、军威、赏罚等等。这些可以说是我们所见较为系统的早期军礼（法）内容，它为后世军队法律条令的建构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响。

## 二、《司马法》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我们认为，只有将《司马法》置放到整个古代兵学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加以深入的考察，才能真正揭示此书的重大学术价值及其特殊地位与历史意义。

如果将《司马法》与《左传》、《国语》、《周礼》等先秦典籍互相参照印证，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法》中所涉及的军礼内容、作战方式、军事制度以及战争观念等，往往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为我们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我国古代战争、军事思想特别是齐国军事文化传统发展历史的嬗递轨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该书作成及流传的特殊经历有关，而最为珍贵的是原“古者《司马兵法》”所保留的部分春秋中期以前的内容，其中体现的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尤应加以重点阐述。

1、在战争观念上，“古者《司马兵法》”反映了早期的历史特征。它认为，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即所谓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sup>⑥</sup>而《左传·文公十三年》所说的：“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这也是本宗“礼”、“仁”的意思。因为征伐要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sup>⑦</sup>成为展开对敌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之一。覆按有关史书，可知《司马法》这一主张是于史可征的古“军礼”原则。

《左传·襄公四年》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襄公十九年》载：“晋士丐侵齐及谷，闻丧而还，礼也。”

2、在战争目的上，古“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说：“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体现在“古者《司马兵法》”中，即主张“兴甲兵以讨不义”。<sup>⑧</sup>更具体地说，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sup>⑨</sup>“贼贤害民”、<sup>⑩</sup>“暴内凌外”、<sup>⑪</sup>“野荒民散”、<sup>⑫</sup>“负固不服”、<sup>⑬</sup>“贼杀其亲”、<sup>⑭</sup>“放杀其君”、<sup>⑮</sup>“犯令陵政”、<sup>⑯</sup>“外内乱、禽兽行”<sup>⑰</sup>这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会之以发禁者九”。<sup>⑱</sup>而《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中有关正邦国的“九伐之法”，所叙内容与“古者《司马兵法》”完全相同。

3、在战场规定方面，在“古者《司马兵法》”中有非常具体的反映，且经得起历史史实和有关文献记载的勘合。其云：“戍列而鼓，所以明其信也。”<sup>⑲</sup>宋襄公则说过：“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sup>⑳</sup>其又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sup>㉑</sup>“见其老幼，奉归勿伤；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sup>㉒</sup>在宋襄公那里，则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sup>㉓</sup>我们认为，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司马法》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视为他们对古典军礼的申明。因为，《谷梁传·隐公五年》中就曾有“战不逐奔，诛不填服”的说法。尽管有些论调在今天看来非常迂腐可笑，但这些现象和理论毕竟是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是我们了解古代战争逻辑演进轨迹的重要依据。

4、在处理战后事宜方面，“古者《司马兵法》”认为，在“既诛有罪”、<sup>㉔</sup>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下一步应该是“王及诸侯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sup>㉕</sup>其实，这也不是它的发明，而仅仅是对古军礼中有关战争善后原则的具体申明而已。参之于史，信而有征。公元前529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吴，归于陈，礼也。”<sup>㉖</sup>这段史料可以看作是对《司马法》上述一段话的有力注脚。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sup>㉗</sup>的真切含义，也终于可以凭借“古者《司马兵法》”之言而昭白于今了。

5、在军事训练方面，“古者《司马兵法》”所描述

的内容和方式,不外乎“春蒐秋狝”、④“诸侯春振旅,秋治兵”④诸项。这正与《左传》、《国语》、《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等古籍的记载相一致。《左传·隐公五年》有云:“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国语·齐语》亦云:“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春秋中期以前的这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通常在农闲时以田猎的方式进行。而到了战国时代,上述军事训练方式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的新式训练法所取代。《晏子·治兵》云:“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在《左传·犬韬·教战》和《尉缭子·勒卒令》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种新的训练不再与“田猎”相结合,而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了。它恰好从反面证明,“古者《司马兵法》”所述的军事训练方式具有早期原始性。

6、在兴师程序问题上,“古者《司马兵法》”有很具体的描绘:“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⑤它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有关史书一一得到印证。《周礼·春官宗伯·大祝》郑玄注有一段文字除个别处外,与上述“古者《司马兵法》”的话基本一致。在可能晚出的《礼记·王制》中,也有“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的说法。这表明,春秋以前的兴师程序业已为先秦典籍所普遍记载。

7、在战场纪律方面,“古者《司马兵法》”的有关论述也体现了早期军事活动的特色:“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⑥这与其他古文献的有关记载非常接近,《尚书·费誓》即云:“无敢伤牝。牝

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无敢越逐,祇复之,我商责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牛马,诱臣妾,汝则有常刑。”而战国期间的情况则有很大变化,一般公认写成于战国时代的《墨子·非攻》记述:“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战国兵书《尉缭子·武议》也谴责了作战中“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强盗行为。这种残酷的战争场景与上述“古者《司马兵法》”的文字相较,实在是霄壤之别。

通过以上若干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司马兵法》一书的重要性并不仅仅由于它在历史上的身价和荣誉,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所保存的部分内容反映了春秋中期以前有关军事制度以及军事思想的概貌和特点,从而使我们能够通过该书梳理抉剔古代特别是先秦齐国军事思想逻辑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环节。

---

①②③④⑪⑭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②④⑤⑥⑧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仁本第一》。

⑤⑥⑬⑭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天子之义第二》。

⑦⑧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严位第四》。

⑪⑬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定爵第三》。

⑭ 《相众第五》。

⑳⑳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④⑥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④① 《论语·尧曰》。

作者徐勇,天津历史教学社副编审;黄朴民,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300074)

责任编辑:郭秀文

# “金应熙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

□本刊记者 郭秀文

1997年12月24日,由广东省历史学会主办、中山大学历史系协办的“金应熙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来自广东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金先生的弟子、家属等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山大学历史系胡守为教授主持。与会者围绕金先生的史学思想、治学方法及品格道德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金先生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兹把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 一、治学风格和方法

金应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他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香港史、台湾史到西洋史、亚洲史,从民族史、社会史、工运史到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史学理论等都有所涉猎并多有创获,受到海内外学者的一致推崇。姜伯勤教授认为金先生的治学风格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蔡鸿生教授在题为《从一本书看历史研究的学术战略》的发言中指出,金先生的《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以下简称《述评》)不仅仅引进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动态,更体现了金氏的学术战略。它启发我们,面对21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必须“开门造车”,这样才能走向世界,才能有所作为。李玉梅则通过金应熙对美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有关明史研究的评述揭示出其研究方法及特点。她认为,金先生介绍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固然是因为当时中国史学界忽视国外史学动态,以致图书资料配置畸型、研究课题与国外学者相重复,甚至造成误会,闹出学术笑话等而欲补该段之空白;但另一方面,在引介过程中他的态度却是不亢不卑,

有着一种民族文化尊严的。如金先生说到“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一定的长处,亦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在研究的路子方面,我们亦具有特点”,不可妄自菲薄等。陈春声、刘志伟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读金应熙述评》的一点感想》中指出,所谓开放的心态首先需要真正领悟王国维所谓学问无新旧中西之别的真谛,不能把学问人为地划分为中、西、我们、他们,进而限制了自己思想的自由和眼界的开阔。对于不同的学术见解,不论出于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我们都需持一种平等的态度,展开平等的对话。而金先生的著作,已体现了这种以开放心态面对外国学术研究成果的精神。杨万秀在《学习金应熙教授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中指出,他对金先生感受最深的是“他坚持唯物史观”。金先生认为从事历史研究要掌握大量的古今中外材料,尊重历史事实,凭事实说话。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何肇发教授在回忆了国外学者对金先生的评价后,认为金先生刻苦用功,学术视野非常宽广,对历史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精神尤其值得提倡。赵立人则认为金先生的《述评》虽以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但也有很多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的卓见,对当前加强学术规范、重建史学辉煌仍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 二、史学思想

关于金先生的史学思想,大多数论者都是围绕《述评》一书而展开的。金雨雁认为,这本专著体现了金应熙教授的学术思想,即历史科学是一门立体的,多层次的综合性学问,研究中国史,应当从其作为世界史组成部分的角度来进行。除了政治史以外,还有

文化史(包括宗教史)、民族史、经济史等许许多多的领域,因此必须运用比较研究、地域研究,计量学、结构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去探索。洗剑民在《走向世界的史学研究潮流——从〈述评〉看金应熙的史学思想》中指出,金先生总结了历史经验,拨乱反正,为新时期的史学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认为金先生的史学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只有把中国历史置身于世界的历史范围内研究,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放眼世界,博纳广收,注重历史的科学性。三、正确对待国外有关中国史研究成果,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四、倡导取长补短,中西融合的治史方法。李冠乾认为,金先生一向重视史学理论,注意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因而他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原则,来全面评析国内外几十年来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吸收其精华,排除其糟粕,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做出了贡献。鲍彦邦在《一部有特色高水平的述评》中对《述评》一书作了较全面的评价,认为金先生正确指明了了解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目的、意义与基本原则,对培养高素质的新一代历史学家有启迪意义。

### 三、师承关系

师承关系和学术传统乃是学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金冬雁在书面发言中提出,金先生一生的学术和人生道路受许地山先生的影响至深至远,同时,他对陈寅恪及其他先生的学问也有所继承。尽管金应熙与陈寅恪在世界观和史学观上有差别,但他一向十分珍视与陈先生的师承关系。虽然在50年代末的复杂历史环境下,他们曾有一段短暂的不愉快经历,但金应熙作为历史系领导,竭尽所能,在政治上保护、在生活上照顾陈先生,其功不可没。在金应熙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如既往,以其彻底的奉献

精神,悉心指导香港大学李玉梅博士从事陈寅恪专项研究,他完全不愧为陈寅恪先生的优秀弟子。对时下广为流传的一本传记中不顾当时的客观历史情况,对金、陈矛盾大肆渲染,有意贬低金先生人格的做法,与会者一致提出了批评。

### 四、道德品格

与会者一致认为,金应熙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学者,值得我们景仰与学习。胡守为教授认为,如果要概括金师的道德品质,爱祖国,忠诚党的事业,助人为乐便是他最突出的表现。他本有志于宗教史的研究,但后来又转向中国现代史和党史、中国职工运动史、东南亚史、香港史等多个学术领域。这些方向转变完全是出于忠诚党的事业,他总是把国家前途和理想放在第一位,将服从党的安排作为行动的准则,爱国精神始终贯彻于他的学术研究之中。曾有人认为金先生没有成为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是因为他博而不专和心有旁骛,是一大遗憾。黄彦却认为,这二者正反映了金先生立身处世的态度。数十年来,金先生的工作岗位变动频繁,执教高校的课程和任职研究机构的课题也经常更换,或由于组织安排,或出自工作需要。他对每一次变动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实在是由他本人的道德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为金先生要做一名有益于人民、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这一价值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秀品质。他总是有求必应,宁肯放下自己的事,急人所急;他一生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人和扶掖后学。钟卓安、曾庆榴等人亦回忆了自己与金先生的交往经历,高度赞扬了金先生刻苦治学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此外,在整理金应熙遗稿方面,与会者也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如姜伯勤教授认为应整理出版金氏关于古代印度佛教教派的遗稿,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叶显恩则提出了整理金氏其他著作的想法。